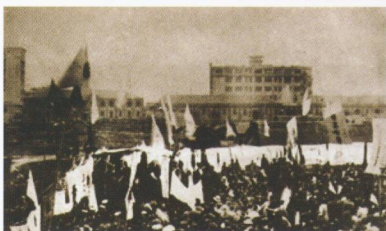


上海市普陀区历史回眸

追忆



——普陀历史档案剪影

上海市普陀区档案局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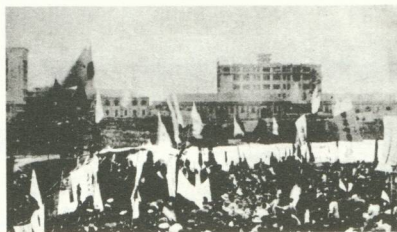
上海市普陀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

◎ 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上海市普陀区历史回眸

追忆



——普陀历史档案剪影

上海市普陀区档案局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普陀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追忆——普陀历史档案剪影

编 委 会

主 任：周国雄

副 主 任：张雄伟 王卫国

主 编：张雄伟

副 主 编：吴自钧 康国强

编 辑：华校生 一 木 周 宾

顾淦翔 袁彩根 陆伟杰

序

周国雄

2011年7月1日——一个伟大的日子正在向我们走来。

回眸中国共产党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每一段峥嵘岁月、每一个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顽强抗争和英明抉择，都体现了我们党把握历史大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的宏大气魄和卓越胆识。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征程和光辉业绩，犹如一幅气势磅礴、雄浑壮丽的画卷，展现着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以拯救民族危亡、谋求人民福祉为己任，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漫漫长路上百折不挠艰辛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

在这90年，上海普陀（沪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经历苦难与辉煌，曲折与成功。普陀是上海开埠后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也是党的早期组织重要活动地之一。中共最早的工人半日学校、沪西工友俱乐部、顾正红烈士、共舞台案、大锅饭运动、三和里女工夜校、沪西工人地下军、申新九厂“二二”斗争、真如国际无线电发报台、成功试制无缝钢管等许多重要事件在这里发生；邓中夏、李启汉、包惠僧、李立三、项英、张浩、杨开慧、向警予、恽代英、刘华、刘少奇、余立亚、李硕勋、李干成、何孟雄、吴亮平、范小凤、张

承宗等许多杰出领导人都曾在我区范围内开展过革命活动,不少先烈把热血抛洒在这块热土上。这是我们普陀的光荣,也是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回顾这段历史,普陀人民既对艰难曲折中取得累累硕果的昨天充满自豪,更对开创更加辉煌的明天满怀信心。真实记录着一段历史,凸现普陀人民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并不是沾沾自喜于既有的成绩,更不是以此来矜夸于人,而在于提供给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普陀历史,牢记党的宗旨,熟悉党的奋斗历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深刻理解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正是顺应干部群众这一学习和了解的需要,上海市普陀区档案局、中共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普陀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共同编撰了《追忆——普陀历史档案剪影》一书。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推动普陀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历史,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克难奋进,创造性地开展好各项工作,全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为全面建设和谐新普陀发挥作用。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为普陀(沪西)英勇牺牲的先烈,献给为普陀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基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建设者。

2011 年 6 月

目 录 *Contents*

首次政治罢工 声援爱国学生

——记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工人罢工/1

创办半日学校 启蒙工人觉悟

——记中共最早的“工人半日学校”/4

上海工运摇篮 展现革命宏图

——记沪西工友俱乐部/7

沪西最早党员 工人运动先驱

——记上海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孙良惠/11

革命视死如归 遗书坚定信仰

——记徐玮烈士/15

五卅运动前奏 震惊上海各界

——记沪西二月大罢工/19

愿拼热血如春雨 洒遍劳工神圣花

——记沪西早期工人领袖刘华/23

昔日血染党旗 今朝纪念先烈

——记顾正红烈士/29

文武双全战士 谱写悲壮一曲

——记革命烈士余立亚/33

青年运动领袖 英勇转战沙场

——记革命烈士李硕勋/37

反对“左”倾错误 沪西永存英名

——记何孟雄烈士/41

群起浴血奋战 三次武装起义

——记沪西工人纠察队/45

“华侨革命之母” 名校英才辈出

——记真如时期的暨南大学/49

“三苦精神”育人 艰辛历程铸魂

——大夏大学简史/52

幽默深刻演讲 横眉冷对诽谤

——记鲁迅在大夏大学的两次演讲/57

领导“赤色沪西” 屡建奇功传颂

——记早期革命家张浩/63

同仇敌忾抗战 粉碎日军美梦

——记1932年初淞沪抗战/67

抗敌壮我军威 硝烟遗址传世

——记十九路军临时军部真如范庄/71

亲临前线慰问 激励将士抗战

——记宋庆龄等援助十九路军/76

铮铮铁骨魂 血洒雨花台

——记沪西“共舞台案”/80

爆发反日罢工 各方大力援助

——记刘少奇与沪西“大锅饭运动”/86

几度迁址易名 纪念抗日英雄

——晋元中学简史/90

扩大统一战线 掀起罢工浪潮

——记1936年沪西、沪东纱厂大罢工/93

投入抗日洪流 培育女工干部

——记沪西三和里女工夜校/96

沪西地下“江姐” 埋名慷慨就义

——记女工夜校教师钱琴/100

- 创作革命歌曲 唤起民众激情
——访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波/103
- 积极入世救护 弘扬爱国志向
——记玉佛禅寺抗日救护队/107
- 万里宣传抗日 奉献火红青春
——记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109
- 出生入死留绝唱 龙华桃花又一春
——记老革命张恺帆/113
- 演唱演戏演讲 抗日烽火成长
——记上海“孩子剧团”/116
- 秘密组建队伍 惊险地下斗争
——记沪西地下军/121
- 紧急下令中止 枪声未能打响
——记沪西工人武装起义/125
- 面对带血刺刀 前仆后继斗争
——记申新九厂“二·二”斗争/128
- 积极发动群众 夺取最后胜利
——记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汤桂芬/133
- 谈判促使起义 挥师解放沪西
——访罗维道将军/137
- 历经风风雨雨 终归人民手中
——记真如国际无线电发讯台/140
- 黎明前的战斗 迎接上海解放
——记地下中共沪西区委/143
- 迎接曙光战斗 热血遍洒故土
——记解放前夕沪西牺牲的烈士/146
- 经受生死考验 诞生监狱之花
——出狱合影的故事/149

齐心稳定治安 加紧恢复生产

——记解放初接管普陀区/153

改善人民生活 巩固新生政权

——记解放初首任普陀区委书记吴亮平/157

普陀人民选举 深情寄予厚望

——记陈毅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164

深入基层抓典型 领导全区掀高潮

——记解放初普陀区委书记张敬焘/168

草窝创奇迹 放飞金凤凰

——记潘阿耀等试制无缝钢管/176

苦干巧干大干 纺织光荣旗帜

——记全国劳动模范杨富珍/179

首个工人新村 早已名扬四海

——记普陀区曹杨新村/182

艰苦奋斗办社 发展农业生产

——记毛泽东为李子园写按语/186

争睹领袖风采 老厂焕发生机

——记毛泽东视察中新九厂/189

驻足仔细观看 工人奔走相告

——记毛泽东视察国棉一厂/192

攻克世界难题 奋力为国争光

——记试制第一支活性染料/195

献花默祷致敬 友谊天长地久

——记周恩来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玉佛禅寺/199

首次政治罢工 声援爱国学生

——记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工人罢工

1919年6月,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进行空前规模的罢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19年6月5日,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标志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虽以“战胜国”之一的名义参加,然而不但没有收回任何主权,反而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胁迫,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承认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利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和会与签订卖国条约,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住宅。北洋政府逮捕了32名学生,更激起各界人民的义愤,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上海人民积极响应并投身五四运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7日,在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2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5月11日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反日宣传、抵制日货等活动;5月26日“学联”发动总罢课,84所大中及专科学校纷纷组织



1919年6月6日《申报》关于大罢工的报道

宣讲团在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广为宣传。6月3日至4日,传来北京大肆逮捕爱国学生 1000 余人的电讯,犹如火上浇油,抗议浪潮风起云涌。

1919年6月6日《申报》载:“昨日(5日)全体罢市之信流传,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曹家渡日人所设内外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体罢工停作。”这是上海报刊对沪西工人首次大规模集体罢工的最早报道。那么,在当时通讯闭塞、绝大部分工人都是文盲的情况下,工人是如何知道北京“六三”事件的呢?

《申报》还报道:“圣约翰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前身)宣讲团成立旬日……每日至少有八组出发宣讲……,已经宣讲地点如……真如、北新泾、梵皇渡、曹家渡、静安寺等处,凡至一镇,宣讲必遍及全地。”而当时受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的内外棉三、四、五等厂工人大多集居在小沙渡(今西康路、宜昌路至长寿路桥)、曹家渡、潭子湾一带。

1919年6月4日前一天傍晚,宜昌路的内外棉五厂、七厂(解放后合并为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工人放工出厂门后,见苏州河渡口处插着一面“承天英华学生救国会”的大旗,一群学生手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小旗子,正在进行揭露北洋政府的演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激起了在场的工人们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深仇大恨。工人们纷纷议论道:在厂里替

日本老板卖命,受尽非人的虐待,假如当了亡国奴,那更没有活路了。北洋政府卖国的消息在工人中传开后,工人们商量,仅仅不买日货还不够,应该多联络些人,不给日本人做工。

6月4日黄昏,承天英华学校几个学生来到东京里(今昌化



五四运动浮雕

路正红里,当时内外棉的工房),向工人们讲述了6月3日北洋政府大肆镇压、逮捕上街演讲学生的惨况,要求工人和各界人民一起紧急行动。在场的工人群众情激愤,纷纷表示明天就“摇班”(罢工)。

6月5日上午,传来商店罢市消息,内外棉五厂工人们三三两两在车间里议论时,一名准备到泡饭水槽边去泡饭的工人,见一日本人拿瓶子往槽里倒东西,他想起传说日本人放毒的事,急忙跑来跟大家说:“不好了,东洋人在水槽里放毒啦!”这一叫,工人们纷纷关了车,一起涌出车间找那个日本人。日本领班看势头不对,忙出来说刚才不是放毒,是洗蓝墨水瓶。大家一听更加恼怒:“工人们泡饭用的水,日本人怎么能随便洗墨水瓶,岂不是不把中国工人当人吗?”大家越说越气愤,并联想起学生们的宣传,当即决定用“摇班”来抗议。

不一会,戈登路(今江宁路)巡捕房的英国巡捕接报赶到厂里,挥舞鞭子要工人开车做工,工人们不理那一套,双方僵持不下。日本资本家害怕工人捣毁机器设备,就关闭了摇纱车间和粗纱车间的机器,打开大门叫工人出厂。五厂的工人在李凤池等工友的带领下,高呼着“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集体涌出了厂门。

沪西内外棉五厂工人冲破日本领事馆的阻挠和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装包围,迅速联络了内外棉三、四、七、九厂的工人兄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沪西内外棉厂1.5万人的同盟大罢工;下午一时三十分,浦东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人也相继罢工;数日之间,铁路、码头、电车、机器、烟草、海员等工人都积极投入到全市人民“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中,汇聚成一股史无前例的反帝爱国洪流并迅猛推向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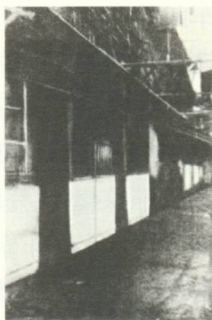
在全国“三罢”斗争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爱国学生,罢免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12日,上海各商店开市,内外棉纱厂工人和各业工人陆续复工,上海历时7天的“三罢”斗争胜利结束。

北京“六三”事件引发的上海“六五”罢工是近代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政治性罢工,有力地支援和参与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宣告了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创办半日学校 启蒙工人觉悟

——记中共最早的“工人半日学校”

工人自办的学校很少。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在槟榔路北锦绣里三弄，这学校起落有二年多了，首名半日学校，后又改为工人游艺会，上海纺织工人会沪西支部也附属该校。去年八月该校又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报名的有二百人；内有女生二十余人，授课钟点每日上午七时至九时放夜工后的来读；下午七时至九时放日工的来读。现在到校的，男女有三十余人。



半日学校所在的
里弄——锦绣里

1922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纪念号”发表《沪西劳动状况》(黄舜融)一文，其中谈到以上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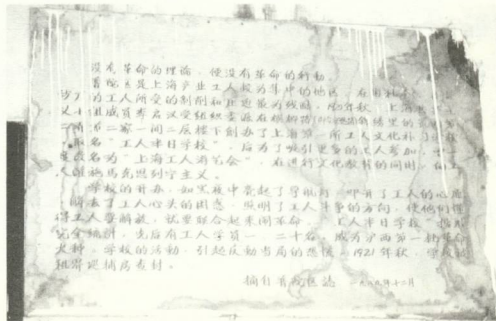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建立后，积极开展上海工人运动，在沪西、沪东一带筹建行业工会，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人群众。

沪西地区的小沙渡一带纱厂林立，集中了大批产业工人，其中日资纱厂的工人遭受最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

李启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到沪西小沙渡地区，着手筹建纺织工会。为了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李启汉决定先开办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

同年秋天，李启汉几经曲折，终于办起了上海共产

锦绣里入口
的关于半日
学校的介绍



党早期组织领导下的上海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分早晚两班上课,故称“半日学校”,在门口贴有“工人半日学校”黑字的白纸条。

半日学校设在槟榔路锦绣里(今安远路62弄178、179、180号),这是一幢由日商内外棉九厂出资建造的砖木结构两层楼工房。李启汉租下房子后,分为教室、宿舍和办公室。教室设在楼下,里面有一些没上油漆的桌凳,正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挂着一盏煤油灯,另有一台留声机,供学生学习使用。教室后面除了有一家英商开办的白礼氏洋烛厂外,还有不少空地,作为学员室外活动的场地。

李启汉主持办学兼教学,陈独秀等人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员陈为人、雷晋笙等为教员。他们为工人讲授文化课,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注重培养工人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打下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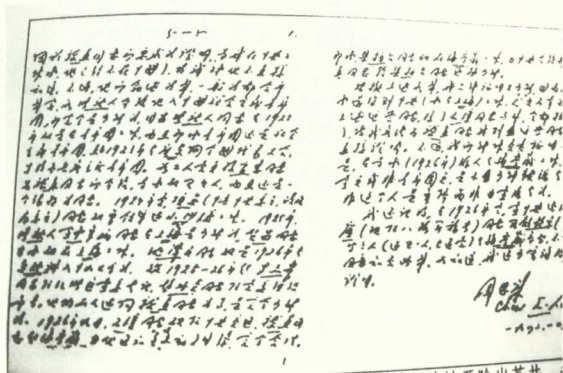
最初,有近百工人参加学习,不久,因工人流动性大、办校经费困难、教室简陋等原因,参加学习的工人逐渐减少。李启汉没有气馁,考

虑到工人劳动时间长、生活困苦,决定把半日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通过开展文娱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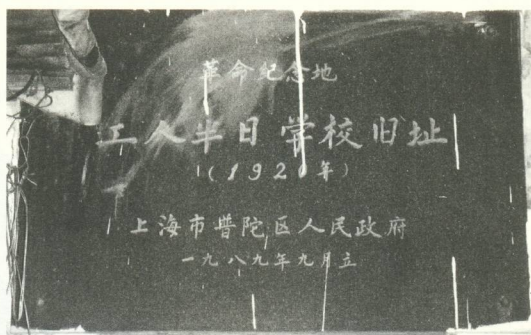
1920年12月19日,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海公学召开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社会



半日学校所在的里弄——锦绣里



周恩来为沪西补习学校创办者之一杨直写的证明



工人半日学校被普陀区人民政府设立为革命纪念地

各界人士400多人参加。李启汉主持大会，作报告时指出：工人们受苦挨饿，要想解除这些困苦，必须联合起来，讨论办法。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都要改革，打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杨

明斋、邵力子、沈玄庐等到会演讲，希望工人破除宿命论和迷信观念，努力学习，加强互助和团结，以集体力量抵御压迫。

工人游艺会的各项文娱活动，吸引了大批工人，纷纷前来报名参加。在此基础上，1921年春半日学校重新开学，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李启汉住在学校里，搬来油印机、留声机等。他一面教工人识字，一面启发思想觉悟，讲述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工人为什么穷”等革命道理。

同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此后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为书记部主任，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董锄平等为干事。

李震瀛奉命前来沪西，在半日学校基础上，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李启汉、李震瀛、包惠僧等讲授“工人为啥苦”、“帝国主义怎样压迫我们”、“资本家怎样剥削我们”等内容，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

1922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查封，工人补习学校被迫停办。

从创办“半日学校”到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前后近两年，规模并不大，但是在中共建党初期具有重要意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办最早的一所工人补习学校。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力量，他们积极参加如火如荼的中国大革命，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其中就有上海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孙良惠等。

上海工运摇篮 展现革命宏图

——记沪西工友俱乐部

沪西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共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几次派人赴京前往中央档案馆,查到了中共沪西最早党组织的名称和党员名单,其中就有上海工人运动摇篮——沪西工友俱乐部。

1924年5月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后,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任弼时等先后到沪西实地调查和指导工作。是年夏天,张秋人相约嵇直到中央机关,见到由中央委派到沪西小沙渡指导工作的项英(项德隆)。他要求嵇直团结工人,根据长辛店、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的经验,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尽早成立工友俱乐部,并参考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的章程拟订一个章程,然后报中央。

嵇直与孙良惠等人拟订了一个《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由总纲、部员、组织、会议、规约、部务、经费以及附则等8章组成。“总纲”写明

“本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为宗旨”。规定“每厂有部员三人至十人,即组织某厂基本小组,公推组长一人;有三人小组以上者,即组织某厂支部”。部务共分8种:一、补习学校;二、讲演会;三、合作社;四、书报室;五、各种游艺会;六、储蓄会;七、部员救济会;八、



沪西工友俱乐部旧址(原安远路西康路拐角处)

职业介绍所。同时,规定了部员的权利和义务。

1924年8月,租小沙渡路槟榔路(今西康路、安远路)三间平房。同月底,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约30余人参加,孙良惠主持会议,项英首先演讲。接着,嵇直把事先准备好的俱乐部草章逐条宣读、解释,经大家讨论和修改后,一致举手通过。按照章程,推举孙良惠为俱乐部主任(委员长),嵇直为秘书,徐玮、刘贯之、李瑞清为干事。最后进行募捐活动,嵇直脱下自己的帽子,倒放在桌上说:“今天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了,这是为工人办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意捐助,但是失业工人可以免除,各位捐一毛不算少,捐一块钱不嫌多。”嵇直掏出一元大洋,投入帽子里,项英捐了二元,大家依次捐出三角、五角。

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



会后,项英摊开红纸,提起饱蘸浓墨的毛笔,写下俱乐部的十六字宗旨:“联络感情,交流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分别写成两个条幅,贴在墙上。事后,征得项英同意,嵇直将俱乐部成立的情况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以期对其他各处工友起个示范作用。

沪西工友俱乐部创办后,嵇直调走,邓中夏委派上海大学旁听生刘华继任俱乐部秘书。

青工身体未长成,工资一二角,做工十二点;
做夜工、礼拜工,一刻不休停。
白相都没有,读书没铜钿,打骂又罚工,开除随他便,集会、结社、
言论、罢工,一概不自由!
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清
帝国主义资本家,不做工来专门剥削人,拿我们当牛马,做活儿养
他们。
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齐心协力,打倒他们,工厂归工人!

这是刘华自编的歌曲,教工友们唱,还教课文,讲故事,处处贯穿了阶级教育,联系工人的实际生活,工人们都喜欢听。经过几个星期的上课,工友们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其中就有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

党中央和上海地委、团中央和地方组织都很关心沪西工友俱乐部,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和上海大学师生经常前去俱乐部讲课,宣传革命道理。工人们思想觉悟逐渐提高,打破了传统的帮派观念,加强了联系,在各工厂建立了秘密小组。曾多次到上大讲课的沈雁冰回忆说:共产党以沪西为工运重点之一,其中又以沪西工友俱乐部为中心。

沪西工友俱乐部不断扩大影响,引起租界当局的敌视和恐慌,租界当局对俱乐部不断进行威胁和破坏。1925年初,党组织决定将俱乐部迁至苏州河北岸的华界——潭子湾三德里,使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主要基地。

俱乐部举办多样形式的活动,深受工人们欢迎,使革命火种得以传播,先后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会员近千人。同时,党组织从中挑选一批骨干加以培养,分批分组谈话、开会,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大家觉悟。同兴纱厂工人郭尘侠、李振西、韩阿四,内外棉三厂的陶静轩、孔燕南(女),内外棉五厂王有福,内外棉七厂顾正红等,逐渐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沪西工友俱乐部诞生不久,成立了中共小沙渡党小组,党员8名,

其中5名为工人党员(成员和组长名录散失)。1925年初,中共上海地委根据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三个党员以上可成立支部”,要求在原来各党小组的基础上组建支部,于是成立了中共沪西支部。负责人为孙良惠,成员



沪西工友俱乐部旧址所在地

有黄原昆、陶静轩、夏福生、李瑞清、马彦波、王定玉、邓中夏、蔡支华、胡先清、刘剑华(刘华)、江源清、顾修、余小峰、刘月柱、徐晋珊、孔燕南(女)、郭尘侠、王瑞安、关明轩、松年、文巧云(女)、刘贯之、朱国平、李金生、姜维新、郭干贞、李剑如、曹正甫、孙杰三、郑永寿、李天涯等32人。

1925年3月1日,沪西日商纺织厂工人大罢工胜利。此后,沪西工友俱乐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警务日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视记录革命志士活动的英文档案资料)多次秘密记载俱乐部有关活动。5月中旬,顾正红牺牲后,19日、22日,中共上海地委两次召开会议,布置和检查了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沪西工友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警务日报》秘密记载:

在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下,罢工工人顾正红的追悼会于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闸北潭子湾俱乐部附近的一块旷地上举行。……大约有五千人参加了追悼会,其中有一百名学生和几个妇女。淞沪警察厅的十二名警员和几名宪兵也在场,他们均全副武装。但由于追悼会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因此警方无机会进行干预。追悼会会场布置有大约三百面不同的旗子和挽幛,另有六种不同内容的传单向手拿死者照片到会群众散发,这些传单“谴责了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追悼会于下午二时五十分宣布开始,这时参加会议的乐队演奏了几支选曲。接着,人们在主持会议的煽动分子孙良惠的带领下,向安放在草棚内一只讲台上的死者照片致敬,然后由臭名昭著的共党煽动分子恽代英(此人现是上海大学教师)向群众发表演讲。……在五个讲台上发表演讲的学生和工人领导人中有:臭名昭著的共党分子瞿秋白老婆杨之华;杨树浦工会代表张佐臣;大夏大学学生高伯定、刘峻山;以及自称是孙逸仙博士的信徒俞达。每个讲台上的演讲结束时,群众就齐声高呼:“反对日本”,“报仇雪耻”,“为了斗争,工人们联合起来,把自己的队伍紧密团结起来”。追悼会于下午四时结束。

这次公祭大会也体现了中共沪西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他们积极参加中国大革命,有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鲜血染红了党旗。

沪西最早党员 工人运动先驱

——记上海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孙良惠

孙良惠(1898—1930),满族,祖籍在南京。20世纪初,孙良惠一家到上海沪西谋生。几经周折,他进入日商同兴纱厂做工。每天拼命工作12个小时,遭受欺凌和剥削,难以维持全家生活。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委派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开办上海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孙良惠闻讯后积极报名,进校补习文化、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此后,经李启汉的帮助,孙良惠组织成立沪西纺织工会。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半日学校工人学员与租界当局发生

了激烈的冲突,被视为眼中钉。1922年夏天,半日学校被迫停办,不久李启汉被捕,孙良惠也被开除出厂。因生活困难所迫,孙良惠找了一份在银行当门警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向往革命,抱有一颗赤诚之心,积极打听被捕的李启汉的消息。

同年秋天,孙良惠听说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举办工人补习班,喜出望外,前往打听李启汉的下落。这个工人补习班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派嵇直来沪西开办的,嵇直见来访者问起李启汉,心存怀疑。孙良惠爽快地做了自我介绍,嵇直非常高兴,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欢迎”。以后,孙良惠经常到补习班听课,带头发言,用亲身体会和工人语言,协助教员为工人学员解答问题。1923年11月,经嵇直介绍,孙良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成为沪西地区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正式拉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序幕,孙良惠作为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



中共沪西支部书记孙良惠

行部工作。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孙良惠等15人被推选为委员。同年末,孙良惠与恽代英、向警予、宣中华、俞秀松等参加了国共合作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12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俞秀松等起草的成立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孙良惠等21人被选为促成会委员。

1924年夏,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参照创办长辛店、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验,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以加强领导沪西工人运动。孙良惠和嵇直、徐玮、陶静轩、戴器吉、刘贯之等在工人群众中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大家参加俱乐部。经过一番积极筹备,9月1日举行俱乐部成立大会,由孙良惠主持,项英等人演说。会上一致通过了俱乐部章程,推举孙良惠为主任,嵇直为秘书,徐玮和刘贯之等为干事。项英根据俱乐部的宗旨,在红纸上挥笔写了16个大字:“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贴在俱乐部的中堂上,大家热烈鼓掌。俱乐部成立不久,嵇直调往外地工作,上级党组织派上海大学旁听生刘华任俱乐部秘书,协助孙良惠。

1924年9月,沪西工友俱乐部里成立了中共小沙渡党小组。1925年1月,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沪西支部,孙良惠为负责人。

1925年2月,孙良惠积极组织 and 领导沪西日商纺织厂工人大罢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秘密记载孙良惠等人活动情况:

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内外棉各纱厂的大约六百名罢工工人,在闸北(应为沪西)大丰厂附近的三德里一号沪西工友俱乐部开会,由著名国民党煽动分子李成(即李立三)主持。李号召全体工人共同合作,将罢工坚持到日本资本家被迫承认他们的要求为止,……接着,会议决定各厂推选首席代表一人,以便管理罢工工人。出席会议的有:孙良惠,他是一九二二年邮电工人罢工发起人李启汉的杰出同事;上海大学杨之华、王一知等三名女学生;全国学生总会著名成员刘清扬。会议于下午四时结束。

二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大约有八百名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在闸北(应为沪西)大丰厂附近举行露天集会,由闸北市民协会的重要成员顾秀担任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讲的有:著名国民党煽动分子李成(即李立三),金银工人互助会会员孙良惠等人,他们都号召罢工工人把罢工进行到底。会议随即作出以下决定:一、推选孙良惠为罢工领导人;二、为了向公众宣传罢工工人的苦难遭遇和争取各团体的支持,决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二时在西门勤业女子中学开会。

2月9日至3月1日“二月罢工”取得胜利,孙良惠功不可没。

1925年5月上旬,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孙良惠和邓中夏、李启汉、张佐臣、陶静轩等代表上海工人参加,孙良惠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以上海工人代表团的名义作大会发言,大会听取了上海代表团的报告,专门成立了《上海问题决议案》。大会决定成立中华总工会,孙良惠和邓中夏、李启汉、李立三等25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并决定设立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就近指挥长江流域和北方的工人运动。孙良惠与刘少奇等一起署名发电给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表示正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组织。

1925年5月30日,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连夜开会,决定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领导全市工人运动。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秘书长),孙良惠任总务副主任。上总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宣布全市总同盟罢工,继而进行“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

工人大罢工引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极端恐慌和仇恨,他们收买地痞流氓寻衅,挑起事端,大搞破坏活动。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孙良惠、李立三和刘少奇等被列入通缉的黑名单。这时,党中央决定派孙良惠赴广州,代表上海总工会和几十万上海工友,向参加省港大罢工的20万工人演说,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愤怒谴责日、英帝国主义惨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这篇演讲稿分两次连载于《工人之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创办),影响很大。

同年底,孙良惠的亲密战友、上海工运领袖之一刘华惨遭杀害。悲痛之余,孙在《工人之路》上发表悼念刘华的文章,揭露敌人的罪行,号



1924年5月5日，庆祝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后排左二为毛泽东，左五为孙良惠，前排左一为邓中夏

召继承刘华的革命精神，继续斗争。

1926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孙良惠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参加大会，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第二届候补执委。回上海后，他被任命为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3月27日，在上海召开全市

工人代表大会，孙良惠被选为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被任命为上海地方运输总工会委员长。会后，他赶赴浦东，在烂泥渡主持召开百余人参加的各码头代表大会，宣布上总决定：将码头总工会改为上海地方运输总工会，及其下属7个分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孙良惠不幸被捕，以“嫌疑犯”的身份被判10年徒刑。党组织及时为孙良惠家属送上补助金，以示慰问，同时积极设法营救。孙良惠获释后，1930年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前往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被任命为湖北省总工会主席。8月，各地执行蒋介石第11号密令，大批革命志士被捕后立即被杀害。9月16日，汉口区行委主席团委员宋惠和被捕后叛变，公开带领敌人四处抓人，其中有刚上任不久的孙良惠。孙良惠刚从外地而来，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化名张忍斋，自称湖北咸宁人，32岁，职业经商。不久，经叛徒指认，孙良惠不幸被出卖，他的省总工会主席身份被写入敌人档案，10月28日被判死刑。

孙良惠从被捕到牺牲，始终保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监狱中，他受尽了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时积极宣传革命道理，鼓励难友继续斗争。临刑前，他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革命视死如归 遗书坚定信仰

——记徐玮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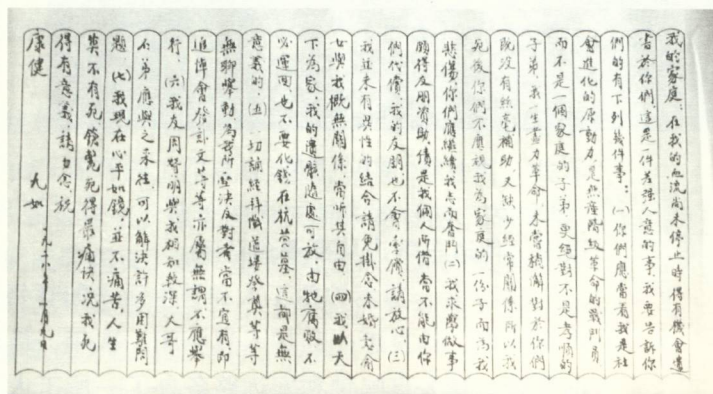
1924年成立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徐玮任干事，4年后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曾派人到徐玮烈士家乡进行调查，得到江苏省海门市

委党史办的热情接待，得以访见徐玮烈士出生地磨框镇（现瑞祥乡）的后人，瞻仰了烈士的纪念地和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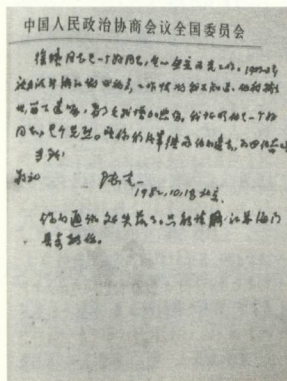
徐玮，原名宝兴，乳名九如，化名谢公弢、胡公达等，1903年10月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农民家庭。父亲徐锡龄设塾教读，农忙时率孩子们下地干活；母亲粗通文墨，常给子女讲民族英雄的故事。

良好的家教，培养了徐玮热爱祖国、同情百姓的思想感情。1914年，徐玮投考海门县立高等小学时，在命题《自治》的作文试卷上写道：“我不但要治好自己，还要使天下人均能自治。”小小的年纪，就有了关心天下的抱负。

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玮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宣传抵制日货，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校长为平息学潮，想“借重”成绩优秀的徐玮在同学中的威信，要他在学生大



徐玮烈士写给母亲的遗书



陆定一对徐玮烈士的证明书



徐玮烈士家乡原房屋

会上，劝说大家“安心读书”。徐玮利用讲坛，大讲学生运动的意义，还揭露校长经商敛钱的劣迹。结果被诬“鼓动学潮”而被开除。1921年，转学苏州东吴大学的徐玮因宣传无神论，反对洋奴教育又被学校开除。1922年徐玮进入上海南方大学

读书。他边求学边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负责沪西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青年团第三支部书记嵇直介绍徐玮、孙良惠一起加入青年团。次年，徐玮转为共产党员，协助嵇直，在大自鸣钟和安远路各办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徐玮给工人上文化课，宣传革命道理。由于他和蔼可亲，讲课引人入胜，工人们对他特别满意。小沙渡即现在长寿路至苏州河一带，是工业区，产业工人十分集中。为扩大宣传，团结工友，徐玮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在张秋人、项英的指导下成立了“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孙良惠任主任，嵇直任秘书，徐玮、刘贯之等任干事。补习学校和俱乐部本着“团结互助，增长知识，改良待遇”的精神，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支持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徐玮还动员进步学生去俱乐部教书，在课堂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还向工人介绍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 and 苏联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的状况，给工人们很大鼓舞。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徐玮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领导工人举行罢工。1925年11月，徐玮任共青团小沙渡部委书记，领导工人及国民大学、大夏大学的共青团支部工作。他很重视青年工作，注重发挥共青团的作用，教育团员和青年懂得革命道理。他深得团员和工人们的拥戴，被誉为“很好的宣传鼓动家”、上海团组织中的一

大“金刚”。小沙渡团的工作在徐玮的领导下搞得生气勃勃，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组织也从原来的100多人，迅速发展到300多人，成为沪西工人运动中一支强大的骨干力量。

1926年春，徐玮回乡为父亲治丧期间，还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将《资本论》、《向导》、《苏联十月》等书刊分送亲友。他的母亲爱子心切，劝他“回乡教书，享享清福”。他意味深长地对母亲说：“一个人享福与许多人享福哪个福大？闹革命就是要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为了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他立志要做“职业革命家”。他曾对一起工作的同志说：“中国革命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党团的事业将要好几代人才能胜利完成，因此需要有一批一辈子做各种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由于徐玮的工作卓有成效，1927年2月，共青团在上海召开江浙区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为江浙区委书记。1927年，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一直同周恩来、罗亦农等人一起，坚持在最激烈的闸北火线指挥战斗。上海临时政府成立后，徐玮作为青年的代表，被推选为临时政府的宣传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徐玮离开了上海到达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9月，调杭州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组织领导工农运动。

1927年11月初，省委地下机关突然遭到破坏，徐玮和团省委秘书长曹仲兰等同时被捕。在狱中，因叛徒出卖，徐玮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坚贞不屈，把牢房当作学习的课堂，利用放风的机会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带领难友开展斗争，痛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在狱中，他还写下诗篇：“前人去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但愿此生有意义，哪管死得迟与早。”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

徐玮分别写了三封遗书，给母亲、兄弟及朋友周赞明。1928年2月9日，徐玮以乳名“九如”写给母亲的遗书中说道：“在我的血流尚未停止时，得有机会遗书于你们，这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应当看我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员，而不是一个家庭的子弟，更绝对不是孝顺的子弟。我



亲属在徐玮烈士遗像前

一生尽力革命，未尝稍懈，对于你们既没有丝毫补助，又缺少经常关（联）系，所以我死后你们不应视我为家庭的一分子而为我悲伤，你们应该继续我志而奋斗。……”

4月18日，给兄弟的遗书中，徐玮写道：“我与你们永别了。你们一定会明了我是为什么死的。……你们如果能明

了我死的意义，便不应为我悲伤，你们应该劝导母亲，善视母亲，彼此亲爱，努力上进。”同日，徐玮在给朋友周赞明的遗书中坦言“……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与悲伤。……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归消灭，那么早死算得什么！”

1928年5月3日下午3时，徐玮等难友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五卅运动前奏 震惊上海各界

——记沪西二月大罢工

上海档案馆内珍藏着两份历史资料，一是内外棉厂工人的罢工宣言，一是工人们在潭子湾庆祝罢工胜利，都从不同角度生动地展示了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事件，史称“二月罢工”。

1925年2月2日晨5时许，日商内外棉八厂粗纱间夜班的一个12岁女童工，因通宵劳动疲劳过度，倚墙瞌睡，被日本领班发现，上前拳打脚踢，女童工腿部受伤倒地。其姐也在同一车间，见小妹受欺压，冲上前去评理，也遭到毒打。全车间工人愤愤不平，团结起来向厂方抗议，日商厂方借机开除50余名工人。被开除的工人要求结算存工，厂方不仅蛮横拒绝，还将带头的6名工人押送会审公廨。7日，日本领事值堂“陪审”，公廨竟判一工人拘禁3星期，训斥其余5人。

沪西工友俱乐部孙良惠、刘华等获悉后，向中共上海地委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罢工委员会，指定邓中夏、李立三等负责，号召上海全体党员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

孙良惠、刘华等接到指示后，紧急召开各厂活动分子会议，最后讨论决定在2月8日、9日各厂工人领工资后，立即罢工。根据群众的愿望和党的指示，俱乐部代表内外棉工人向日商厂方提出六项条件，并印成传单在各厂散发，号召工人罢工。其条件：1.以后不准打人；2.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1/10，并不得无故克扣；3.恢复第八

内外棉厂的工友們。

我們在東洋人廠裏做工。總是受國罵呀。每日要做十二點鐘以上的工。賺的工錢。還是很少。一點不好。東洋人就是拳打脚踢。一點小錯。就要罰錢。東洋資本家。真把我們中國工人。看作牛馬奴隸一般。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不管我們工人的死活。不講人道毫無公理。本月二日又無故將第八廠粗紗間的工友金德開除。四日他們去拿工錢。東洋人不但不發工錢。還把他們的代表。拖到行裏去當面。東洋人真把我們不當人呀。工友們。每年要賺的錢。高都高不到那裏。我們工人的。東洋人吃了我們的血。這些錢我們的血。真是有此理。工友們。東洋人真是逼得我們沒有路走了。只有大家齊心。一致罷工。反抗東洋人的虐待。要求東洋人給我們賠償。

(一)以後不准打人。

(二)按照每人原有工錢加給十分之一。并無故不得扣。

(三)恢復第八廠被開除之工友。并立即釋放被拘押之工友。

(四)以後兩星期發工錢一次。不得遲期。

(五)罷工期間以內的工錢。廠裏須照常發給。

(六)以後不得無故開除工人。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定要將東洋人的條件。我們儘有生命。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工友們。大家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東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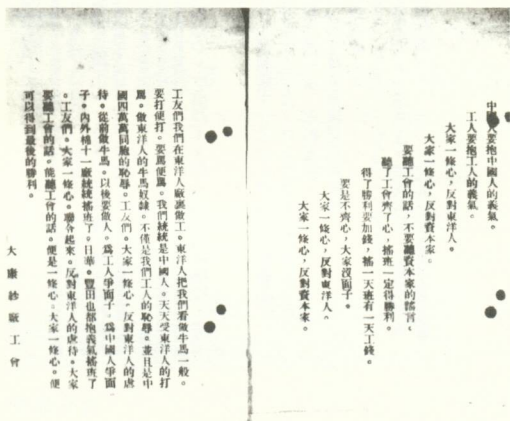
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内外棉纱
厂工人罢
工宣言

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4.以后两星期发工资一次，不得延误；5.罢工期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6.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但是，日商厂方置之不理，并布置包探，继续拘捕工人活动分子。在俱乐部发动下，2月9日下午，内外棉东西五厂和七、八、十二厂日班工人全体罢工，蜂拥而出，到苏州河对面的荒地上集合，召开群众大会，各厂夜班工人闻讯也随同前往参加，到会者约万余人。

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下，掀起罢工浪潮，势不可挡。10日，内外棉九、十三、十四厂工人加入罢工，而后罢工扩大到内外棉三、四、十五厂。日商内外棉11家沪西工厂17000余工人，包括日商厂方认为最保险的养成工在内，全部卷入罢工大潮。14日，沪西日华三、四厂和东亚麻袋厂等共5000余人加入大罢工，沪西丰田一、二厂及同兴厂近6000人继起罢工。大罢工大潮又蔓延至沪东日商纱厂，在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策动下，大康一、二厂4000余工人奋起响



沪东大康
纱厂工会
散发的传
单

应沪西大罢工；18日，裕丰一、二厂2600余人也加入大罢工行列。至此，日商的6个株式会社，即内外棉、日华、大日本、丰田、同兴和东洋纺，共22家纺织厂约35000余工人投入了二月大罢工。

同时，党组织及时帮助各厂分别成立工会，加上东亚麻袋厂工会，组成工会联合办事处，在潭子湾办公。荒芜冷僻的潭子湾顿时热闹起来，成为大罢工的指挥部，每天都有工人群众在集会，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进步师生轮流演讲，散发传单、宣言和快报，鼓动大家团结一致，罢工到底。上海大学积极声援大罢工，成立了“上海日纱厂罢工后援会”，帮助纱厂工会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向全市学校筹募捐款，支援罢工工人。

警予等发动各界团体组成的“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唱对台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罢工工人“听工会的话”，不受威胁利诱，相互扶助，克服困难，坚持团结战斗。日商厂方眼看纱价上涨，厂里损失越来越大，被迫同意与工人代表举行谈判。

2月25日，各日商纱厂工会代表：同兴的刘贯之、大康的张佐臣、日华的李瑞清、裕丰的万金福、内外棉的朱国平和丰田的张应龙等6个代表，在上海总商会里进行谈判。日商厂方谈判代表为内外棉会社董事长武居和该社上海支店经理岗山，调解人为上海总商会副秘书长方椒伯、会董王一亭等，以及曾经参与调解工作的各马路商会总联会、五马路总商联会、沪西四路商联会的代表潘冬林等10余人。另外，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和交涉使的代表也到场“监视”。经过工会代表努力争取和中间人的调停，日方对工会所提严禁殴打工人、被开除工人复职等八项条件部分接受，26日下午正式签订了协议。



潭子湾大丰纱厂老工房大丰里，领导罢工的活动据点

至于释放被捕工人问题，警厅方面由总商会保证解决，租界巡捕房方面由工会聘请的英籍律师克威交涉解决。

27日下午，工会代表10余人前往警察厅欢迎被捕工友出狱，他们同乘马车至潭子湾工会办事处，受到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潭子湾响起一片欢呼声、掌声、鞭炮声，大家欢庆大罢工的胜利。

历时3周的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震惊中外五卅运动的前奏曲，提供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强有力的干部队伍。

愿拼热血如春雨 洒遍劳工神圣花

——记沪西早期工人领袖刘华

沪西工人文化宫大门口在车水马龙的武宁路上，1960年10月1日建成后正式对外开放。沪西工人文化宫的前身为沪西工友俱乐部，取名也是为了纪念1924年9月成立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刘华（1899—1925）曾任俱乐部秘书，后担任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等职务。

沪西工人文化宫的美丽湖畔有一尊刘华烈士半身塑像，这是1992年初立的。塑像背后是岩石幕墙，中间镶嵌着汉白玉壁墙，刻写着刘华生平简介。一旁绿草坛下方有一块铜牌，上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普陀区人民政府”。



沪西工人运动领袖刘华

1920年秋天，上海闹市区里，有一个青年提着包袱，操着四川口音问看门老头：“这里是中华书局印刷所吗？”

这位青年人原名刘炽荣，上学时改名为刘华，字剑华，四川宜宾人，出身于佃农。1915年读完高小，第二年就随父亲外出谋生。他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加之其他种种原因，经人介绍认识中华书局成都分局的王姓股东，由此到上海来做学徒。

中华书局印刷所开办于1912年，刘华进去时，该印刷所已经成为中国出版印刷行业的“四大书局”之一。刘华被分到石制版间，工作繁重，劳动条件差，经常加班，熬得两眼布满血丝，每月工资只有三四块钱。为了省钱，他和其他学徒经常是三个人吃两客饭。两年间，刘华已掌握了制版技术，能够独当一面工作，他常常把节省下来的钱购买进步书刊。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他逐渐懂得了许多道理，对周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了新的理解，

“这是什么世道，中国人要受外国人欺侮？”还有一些政治新名词，都引起他的关注。

1923年夏天，刘华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上海大学由国共两党共同举办，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赤色堡垒，许多优秀人才在这里脱颖而出。刘华一面在学校里做总务工作，刻蜡纸、印讲义，一面勤奋学习，经常学习到深夜。他还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旁听，其中执教的有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有不少是在上大的教学中产生的。

刘华的积极表现引起上大党团组织的注意，他进校不久就被吸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附中团支部书记。1923年11月22日，经中共上海地委批准，刘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华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贫穷人家出身的孩子，现在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他真正的母亲——中国共产党。我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战斗到底！”

1924年4月，上大附设平民学校举行开学仪式，时任上大平民学校执委的刘华和邵力子等人都作了发言。5月，他担任团上海地委学生部主任。10月，他被推选为刚成立的上大学生会执委。

这时，刘华强烈要求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党组织就派他去参加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工作，担任俱乐部秘书（原秘书是嵇直）。俱乐部设有识字班、文化补习班和演讲会，演讲会宣讲国家大事和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等问题，有时也讲革命故事。有一次，刘华讲一个女工遭受虐待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引起不少听讲的人留下热泪。刘华还讲述了某厂洋监工如何辱骂工人，毒打工人，不把工人当人看待。当时就有听讲的工人愤怒地喊道，“打死这个恶鬼子！”革命的道理鼓起了工人们团结斗争的信心，打破了工人中的地方帮会观念，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联系，这些都为沪西日商棉纺厂“二月罢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月罢工”之前，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指挥罢工委员会，邓中夏、李立三为总负责，刘华则为了组织罢工、联络全市各日商纱

厂工人和召开各种会议等具体事宜，日夜不停地忙碌着。

针对日商厂方虐待工友一事，刘华提议以“沪西俱乐部”的名义出面干涉，代表工人向日商厂方提出条件。根据大家的意见，刘华等人总结出六条，并印成传单散发，传单最后号召，“工友们，大家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对东洋人的虐待，达到最后胜利。”现在这份传单原件存放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题为《内外棉厂全体工人宣言》。

1925年2月9日，荒僻冷落的潭子湾顿时沸腾起来，聚满了罢工工人，会场中心插着一面白旗，上面写着“不准东洋人打人”的大字。刘华站在一个土堆上，首先发表演说：“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罢工开始啦！……为了加强我们工人群众之间的团结，我们应当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听工会的话……”刘华越说越激昂，激起工人群众的强烈共鸣，“不戴东洋人帽子！”大家发出积聚在心底的仇恨，纷纷把做工时戴的东洋帽扔在地上，用脚践踏。

这次“二月罢工”带动各纱厂纷纷成立工会，并成立各工会的联合办事处，项英为主任，刘华为副主任兼宣传主任，孙良惠为组织主任，由刘华等常驻潭子湾三德里办事处。5月24日，内外棉纱厂工会等在潭子湾隆重举行顾正红烈士公祭大会，刘华为大会总指挥，他说：“烈士的血没有白流，他的牺牲已经唤起人们新的觉醒，正在踏着烈士的血迹与帝国主义继续战斗，为中华民族雪耻，为烈士报仇！”

五卅惨案发生后，5月31日晚上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刘华被推选为上总第一届执委，兼任上总第四办事处（仍设在三德里）主任，以后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第四办事处不时遭到反动军警和工贼、流氓的骚扰、破坏，刘华率领工人纠察队一次次给以还击。

刘华废寝忘食，忘我工作。1925年7月，四川老家遭到土匪抢劫，刘华的弟弟被打死，父亲被绑走，母亲受重伤，祖母病危，一家惨遭大祸。刘华接连收到家里的来信来电，催他速返老家。他也很想回去看看，但工作重任在身，无法离去，他在回信中说，“国家衰弱，强邻欺侮，神圣劳工，辄为鱼肉。我亦民族一分子，



1993年3月3日，原区委四套班子领导为刘华烈士塑像落成揭幕

我亦劳动一分子，身负重任，何以家为？须知有国方有家也。”他请家人原谅，允许他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工人运动。

刘华因长期积劳成疾，咯血不止。在李立三等人再三催促下，才同意治病休养。他在病中赋诗道：愿拼热血如春雨，洒遍劳工神圣花。

1925年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反动当局通缉李立三及工会其他领导人，公租界巡捕房也到处查缉刘华，并通告，“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四川人刘华迭在闸北非法集会，激动人心，扰乱治安，故特通令所属军警，一体查办捉拿，并恐避匿租界，爰知照捕房协缉。”

刘华身体稍好，经常外出参加各种活动。1925年11月29日下午，刘华去南市参加一次群众反段（祺瑞）集会。散会后，他准备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同志。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他发现有两个包探跟踪，就想甩掉，但前面又有两个巡捕拦截，“走，到巡捕房走一趟。”这时正好有一个纱厂女工路过，刘华认识她，就故意大声喊道，“哎呀，我的被子还晒在外面，天要下雨了，还没有收呢。”女工马上明白，赶到潭子湾，报告刘华被捕的消息。党组织得知后，立即紧急商量营救的办法。

租界当局十分害怕刘华被关押在巡捕房里，会引起一场新的反帝斗争，第二天就引渡给军阀孙传芳所属的沪淞戒严司令部，以此借刀杀人。刘华在监狱中遭受毒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的机密；敌人又以巨款引诱，他也不为所动。

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屡次向军阀孙传芳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刘华。上海工人、学生准备举行游行示威，迫使军阀释放刘华。刘华在监狱中得知后，深为大家的深情厚谊所感动，但他不愿为他一个人的安危，让大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他托人送出去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却是永恒的！”

1925年12月9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议以代表大会名义向戒严司令部要求释放刘华。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上总新的执行委员会，刘华当选为上总副委员长。

但是，军阀孙传芳驻扎上海后，急于要控制局势，平息工潮，以取得列强的欢心，抓到刘华后，认为是摧残上海工人运动的好机会。孙传芳亲自拜访英、法、日、意四国驻沪领事馆，并与上海总商会要人商讨禁止“赤化宣传和治安等问题”。12月16日晚上，上海总商会宴请孙传芳，在座的日本商会要人和英国驻沪副领事向孙传芳说，“刘华是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上海屡次罢工皆为其所煽动，如不重办，上海的秩序十分危险。”孙传芳就叫副官打电话给戒严司令部严春阳，命令将刘华“秘密枪决，灭尸不宣”。

第二天深夜，在南市蓬莱路附近的空地上，刘华被秘密杀害。刘华为中国工人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26岁。

刘华牺牲后，全市工人无比悲痛，纷纷佩戴黑纱哀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悼刘华同志！》，指出“刘华同志是上海无产阶级的首领”，“刘华同志及其他积极奋斗的战斗领导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示威，造成了这半年来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为刘华两次发表通电，称颂“刘华为工界最忠实最勇敢之领袖”，呼吁各界声讨军阀罪行。



坐落于普陀区沪西工人文化宫内的刘华雕像

1926年5月29日，全市人民为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在五卅公墓奠基礼上高呼口号，“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刘华！”“为我们的领袖复仇！”“刘华不死！”

中国工运领袖邓中夏等曾在劳勃生路(长寿路)和小沙渡路(西康路)的大自鸣钟(1958年已拆除)举行纪念刘华的沪西工人集会，邓中夏说：“我们一定要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在这里为刘华树碑纪念。”

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区委党史研究室发现邓中夏的讲话，便与有关部门联合向区委报告。区委很重视，责成区总工会等部门筹建纪念碑，还得到上海文管会的全力支持。

1992年4月29日，普陀区总工会、区委党史研究室等隆重举行了刘华烈士塑像揭幕暨沪西工人运动史陈列室开馆仪式，原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等出席，《解放日报》等刊登有关报道和照片。

昔日血染党旗 今朝纪念先烈

——记顾正红烈士

2006年10月,因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位于澳门路300号原上棉二厂顾正红殉难处纪念地被拆除。

2007年初,根据原普陀区离休干部的反映和建议,普陀区委本着尊重历史、服务现实、实事求是的精神,责成区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区总工会、文化局等部门多次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和上门拜访,了解情况,征集资料,做好筹建顾正红纪念馆相关准备工作。西部集团负责建筑施工并委托同济大学承担纪念馆的图纸设计,区委宣传部牵头相关组织工作,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与老干部的沟通协调,负责馆内展示资料和展品的准备,区总工会、文化局、规划局、档案局予以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2008年5月30日上午,在中央有关领导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委领导的关心下,隆重举行顾正红纪念馆(普陀区澳门路300号)开馆典礼。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倪豪梅出席典礼,并为顾正红塑像揭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豪为顾正红纪念馆揭牌,市委副秘书长姜樑出席典礼。普陀区委书记周国雄致辞,区领导主持开馆典礼。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祝学军担任司仪。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总工会、市文明办、市委督察室、市档案局、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上海博物

顾正红纪念馆雕塑



馆等有关部门领导，普陀区四套班子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了开馆典礼。

顾正红纪念馆内的丰富史料，展示了 80 多年前沪西工人运动的光荣历史。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此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逐渐复苏和发展，最终爆发五卅运动，掀起中国大革命高潮。

1925 年 2 月，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二月罢工”委员会，上海 22 家日商纱厂近 4 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5 月，日商内外棉七厂厂方撕毁与工人达成的协议，以关闭工厂、开除罢工工人相威胁。15 日，资本家在厂门口贴出“因故停工”的布告，夜班工人被阻门外，工人顾正红扯下布告，率领工人们冲进工厂。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领打手镇压，疯狂地毒

打手无寸铁的工人。顾正红带头冲进物料间，拿起打梭棒，奋起自卫。川村恼羞成怒，打伤 10 余名工人，对顾正红连开 4 枪，还用刀猛砍，顾正红倒在血泊中。17 日，顾正红因伤重牺牲。

顾正红，1905 年生于江苏阜宁县。1921 年跟随全家逃难到上海，不久，进了日商内外棉九厂做工，因反对工头被开除，后转到七厂做工。1924 年，他进入中



顾正红与敌人搏斗处

共主办的小沙渡工人补习学校和沪西工友俱乐部，学到许多革命的道理，成了“二月罢工”的积极分子，加入了共产党。

顾正红惨案激起上海各界民众的极大愤怒。16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 32 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日商纱厂工会、店员联合会、印刷工人联合会等团体联合学生总会、沪北商会等 35 个团体，成立日人残杀同胞

內外棉紗廠風潮擴大(二)

顧正紅中四槍斃命 受傷者仍在醫院醫治

工人開會選舉職員 日紗廠開會調查此事

內外棉紗廠風潮，昨日仍在堅持中，茲將各種情形，分誌如下：

▲死傷之工人：前晚(十五)被日人槍斃之工人，計第七廠(一)顧正紅、江北人，第一三二五號，身中四鎗，已於昨晨七時身死，經同仁醫院送往驗尸所檢驗。(二)吳阿四，南京人，一三〇六號，刀傷，黃福金，常州人，一三〇五號，槍傷，(四)周阿大，常州人，一三〇五號，槍傷，(五)徐阿平，無錫人，一三〇九號，頭傷，第五廠(六)李小龍，江北人，二〇六號，八二二號，槍傷，(八)董阿四，江北人，頭部打傷，又輕傷無數。(中國社)

▲工會之解決：罷工日三德里總工會昨日自上午七時起，各工廠工人陸續到會集議，由工人代表相繼發言，語頗激昂，結果議決推定臨時職員如下：(一)總主任劉華 孫仲英、選定佐立政信為候補、

郭慶傑、徐晉瑞、王瑞安、(四)外交劉貫之、陶靜軒、李瑞清、朱國平、戴器青、(五)糾察徐德處、姜維新、鄭天祥、(六)女工辦事員吳國瑞、孔燕南、石錦妹、郭阿二、朱小姑、(七)已罷工各工廠主任周洪濤、江銀柳、石傑三、(八)非罷工各廠主陳古月三、張慶龍、(九)救濟員孫仲英、張錦妹、董元坤、羅俊卿、(十)募捐主任張元坤、余風德、冷雙喜。

▲日紗廠開會：日商紗廠聯合會前日下午三時，在日本人俱樂部開會，討論內外紗廠工潮之善後與添設紗廠聯合會專署書記事，關於罷工問題，因直接關係罷工者未出席，不悉詳細之罷工狀況，因是聯合會幹事與日民於散會後，即赴內外紗廠調查，結果其善後之討論，將再開聯合會決定態度，又關於書記問題，選定佐立政信為候補。

《民國日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報道

雪耻会，发宣言、散传单，控诉日本资本家罪行。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上街宣传，援助工人斗争，数名学生被捕，更激起市民愤慨。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

5月24日，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沪西工友俱乐部出面组织，在潭子湾荒场上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上海各界万余人参加，高呼“反对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等口号。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主要繁华马路上，进行宣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百余人，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者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等重要矿区，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和罢工、罢课、罢市。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

※本埠新聞※

●內外紗廠工潮釀成血案

▲工人傷亡十三名 二人受傷最重

昨日薄暮七時餘，滬西兩州路日商某紗廠工人罷工，發生衝突，開槍擊傷工人十三名，由警院路捕房派西捕車送公共公麻，當由駐廠捕頭報告同仁醫院，立聯病車到廠，將受傷人車送醫院療治，當經醫生檢視，其中顧正紅（腹部及腿上各中一彈）、吳阿四（臂部受刀傷數處）、周阿大（頸部受傷數處）、受傷最重，即留院診治，其餘均受輕傷，即為之包紮後出院，顧正紅業已由德醫生剖腹療治，腸胃已穿孔，當即剪去一段，檢出子彈，其腰上一彈業已穿過，傷勢甚重，勢難倖存云。

又據工人方面消息，近二星期，內外棉紗廠，每天開除工會代表，昨晨（十五）內外棉十二廠工人實行罷工，供其餘各廠，均未罷工，所以昨晚各廠工人均照常前往工作，詎日人不要內外棉七廠工人上工，工人與之爭論，緊要工人回去，後由普渡路巡捕到來，日人即開手槍打人，共打傷十餘人，顧正紅等三人受傷最重，即將顧等周阿大等四人受傷比較嚴重，現該七人已由捕送入醫院，此事全由日人無理而起云云，（股際被刀傷）名，重者為顧正紅（下腹部中四彈）、吳阿四（股際被刀傷）、王福全，受傷較輕者，為周阿大、徐阿平、李小龍、潘女工，尚有五六人輕傷，不知姓名。

●兵士帶土被獲幾釀衝突案續訊

駐鎮華軍三十一號軍士被獲土，被駐軍憲兵查獲，向是入道，由駐鎮軍憲兵連合稽查處長偵查，昨（十四）

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怒吼声，形成了全国大规模的反帝怒潮。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 50 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

《申报》报道内外棉纱厂血案

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 月 7 日，日本 30 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各国不同方式的有力支援，使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帝斗争。

如今，顾正红纪念馆成为缅怀先烈、继承革命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1925 年 5 月 24 日，纱厂工人在沪西潭子湾举行顾正红追悼会

文武双全战士 谱写悲壮一曲

——记革命烈士余立亚

中央档案馆有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1923年法国巴黎郊外，周恩来等为欢送12名即将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同志合影，余立亚坐在前排左起的第5位，这是余立亚生前最后的真实形象。

余立亚，湖南长沙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在湖南长沙接受文化教育。湖南救亡图存的新思想很活跃，蔡和森和毛泽东在湖南发起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像磁石般吸引了余立亚。他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告别妻儿，赴法勤工俭学。

为了搞清这段历史，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走访了曾赴法勤工俭学的郑超麟。

抵达法国巴黎后，余立亚与李维汉、王若飞、邓希贤（邓小平）、郑超麟等先后在巴黎近郊圣日曼中学、墨兰中学学习法文，1922年2月，到蒙达尼镇的哈金森工厂做工，厂里免费提供住宿的木棚。同年6月18日，余立亚参加由周恩来等发起、共同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据郑超麟回忆，参加成立会议的有18人，其中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尹宽、萧朴生、任卓宣、刘伯坚、熊锐、王凌汉等。大家讨论并争论了党名、党纲、党章。记得周恩来提议加入组织要“宣誓”，但大家不同意，结果免去了这个形式。在讨论党名时，大多数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周恩来反对，主张用“少年共青团”，最后表决结果，仍决定用“少年共产党”名称。“少年共产党”成立不久，邓希贤（邓小平）也加入该组织，负责刻印、出版油印刊物《少年》。“少年共产党”后来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中共沪西部委书记、
上总沪西工会联合会
主任余立亚



余立亚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同学合影（后排左2为余立亚）

1923年1月，周恩来、余立亚等人接到陈独秀来信，要选派一些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未来的中国革命培养一批干部。周恩来代表组织选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人选，其中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

雄。接着，便有了本文开头提及的一张合影。

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余立亚等人读的课文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和俄文等。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余立亚等人冒着严寒排队谒灵，参加了有关吊唁活动。

1925年初，国共合作正式确立，需要大批党内干部，中央决定调回余立亚等人。

余立亚先后在河南、上海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开展党的活动。1925年9月，上海区委根据中央指示，按上海的区域划分为杨浦区、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7个部，建立7个部委员会（简称部委）。

1926年8月，上海区委组织特别委员会领导小沙渡日商纱厂反日罢工，因种种原因大罢工失败，使革命力量一度遭受相当的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必须尽快加以整顿党组织，设法维持上海总工会的威信。为此，上海区委决定任命余立亚为小沙渡部委书记（兼任吴淞独立支部书记），整顿已涣散的党组织。经过调查，余立亚（王炎夏）向区委递交《关于九月份罢工后的情况报告》，分析罢工后的党组织情况。余立亚等人分工到各厂秘密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有了明显的成效。当时小沙渡部委下属支部15个，党员人数144个。上海区委组织部主任赵世炎报告说“这一时期党员人数虽

少，但党内组织比较稳定……支部从原来的 130 个，增至 150 个，内容比以前好。”1927 年 1 月，全市党员已增至 3000 多人，比原来翻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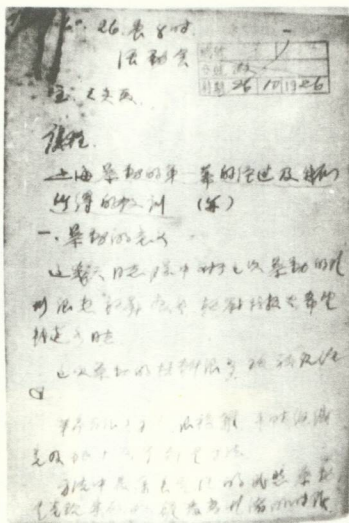
1926 年 10 月，上海区委决定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余立亚等人接到命令，立即召开各厂工人纠察队骨干会议，传达区委指示，动员部署武装起义。当天晚上，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鲍孝良带领十几名纠察队员，在潭子湾北面靠近铁路边的一间草棚里待命。后接到停止起义命令，余立亚等人撤离集合地点。

1927 年 2 月，余立亚等人又积极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加速发展党和工人组织，壮大队伍，精心组织工人“缴枪”小组，设法从巡捕手中夺取枪枝，并组织女工运送武器。但是，第二次武装起义依然没有成功。

1927 年 3 月 7 日，中共上海区委为领导和组织上海工人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决定对全市 8 个部委作部分调整，其中小沙渡部委和曹家渡部委合并为中共沪西部委，所辖的地域范围仍然包括小沙渡和曹家渡，由余立亚任中共沪西部委书记，组织部主任诸耀三、朱勤如（分别管小沙渡地区、曹家渡地区），宣传部主任李又清、章蕴农（分别管小沙渡地区、曹家渡地区），精心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余立亚领导下，组成了 3000 余人的战斗队伍，其中的一支打狗队威震上海滩，他们远征浦东、沪东，惩治了破坏工人运动的地痞、流氓、工贼。

1927 年的 3 月 21 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打响了，余立亚率领一支工人纠察队攻下曹家渡警察署，夺取枪支，继而会合沪西另一支工人纠察队，包围了四区警察局，经过 2 个多小时的激战，打垮敌人。战斗中，副大队长曾瑞（黄埔军校学生）和工人杨启后、卞如庆、董小四子、王阿四（女）、倪阿二英勇牺牲。随后，余立亚率队参加北火车站的激战，取得最后的胜利。



1926 年 10 月 26 日，余立亚主持召开中共上海地区活动分子会议，这是当时的会议记录



工人纠察
队训练

3月29日，临时上海市政府召开成立大会，市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因蒋介石已在暗中磨刀霍霍，严重阻挠了市府工作。

4月1日，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主持各部委书记会议，其中沪西部委书记（未署名）发言：

机关已找好，在华界，曹家渡亦有房子。同志二千二百（人），党员大会到了一千四、五百人，一星期内可有四千人，支部四十四个。

洋务公会与工联关系很好，在群众中已有反英宣传。巡捕有六十余人来接洽，每天来报告，可成立工会。

已（以）前内有条件的各厂，仍继续谈判，调价集中在承认替工会找房子及开办费。内外棉已承认，大丰承认了八个条件。九厂及日华三、四厂仍很强硬，罢工已二十天，工人很苦，但很坚决。问题很紧迫。

有组织的工人十一万，房客联合会要闸北去接受。

如果这是余立亚的发言，那么也许是现存他的最后一次发言记录稿。发言中提及的党员和支部，都远远超过去年余立亚接手沪西工作时的数量，其他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但是，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敌人疯狂镇压，大开杀戒，余立亚等人不畏艰险，坚持斗争。日商特务刺探到沪西区工联和党的秘密机关，抓捕余立亚等人，押解到丰林桥（后改为枫林桥）国民党驻沪特务处。余立亚拒绝敌人利诱收买，经受了酷刑拷打，始终忠贞不屈。无计可施的敌人把遍体创伤的余立亚等人押赴刑场，惨无人道地施以腰斩杀害。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陈列馆第一期展出时，以大幅油画形式，生动地反映了余立亚等烈士英勇就义的悲壮场景，让后来人缅怀先烈，继承革命遗志。

青年运动领袖 英勇转战沙场

——记革命烈士李硕勋

李硕勋(1903—1931),四川省宜宾高县人。1924年春,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沪西工人区担任工人夜校教师,宣传革命思想,与工人建立深厚感情。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李硕勋被团中央分派到全国学生总会工作,直接领导上海学生投入反帝斗争。6月4日,李硕勋和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代表刘一清、梅殿龙、阳翰笙、林均等同上海总工会代表、商界联合会代表举行联合会议,商议成立统一的反帝指挥机构——上海工商学总联合会。7日,召开成立大会,李硕勋被选为该会委员。

6月19日,香港十余万工人开始罢工,声援上海五卅运动,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和广州工农兵等举行示威大游行,遭到租界列强的射击,造成“沙基惨案”。消息传到上海,李硕勋认为,从五卅惨案到“沙基惨案”,都遭到列强和军阀的镇压,当敌人用枪炮对准我们时,我们却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没有自己还击能力,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

这时,在上海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团部召开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李硕勋作了介绍学生运动概况和经验的报告,被推选为总会长兼交际部主任,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他提出建立学生军的建议,得到总会执委的赞同,此后制定了《全国学生军组织大纲》,刊登于《中国学生》,发往全国各地。学联设法得到一批可作为军事训练的武器,经李硕勋等人策划和筹备,上海学生军正式建立,还成立了全国学生军最高指挥机关——学生总会军事委员会,李硕勋兼任委员长。

李硕勋同总会执委商量,打算进一步通过各地学生军联合会,筹



曾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的
革命烈士李硕勋

建各地学生军,但由于各地军阀阻扰,此计划未落实施行。上海学生军的建立,提高了学生对建立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培养了一批学生军事骨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硕勋写给二哥的信中说:“我的的人生观是革命,我的生活也就是革命!革命的步骤当是怎样呢?第一是宣传,第二是组织,第三就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李硕勋平时工作非常忙,还是挤出时间,为自己建议重新出版的《中国学生》周刊写文章,分析中国现状和研究中国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以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指导全国学生的革命运动。

1925年秋天,李硕勋等人在上海南市西城小学纪念庆祝国际青年节,被《警务日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视记录革命志士活动的英文档案资料)秘密记录:

九月六日下午三时十五分,有四十九人在城内蓬莱路四十四号西城小学开会庆祝国际青年纪念日十一周年,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全国学生总会主席李硕勋对欧洲青年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间所表现的活跃性格和忠诚精神感到喜悦。青年们努力奋斗的精神已使他们的力量 and 影响不断增长。……当会议正在进行之时,他们向听众散发了反帝反军阀的传单和小册子。

1926年冬,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年底,被党组织调入北伐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任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命二十五师回师武汉东征讨伐蒋介石,李硕勋亦随师回到武汉。7月15日,汪精卫亦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中国大革命失败。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上午,聂荣臻赶往驻地马回岭,与周士第、李硕勋等制定起义方案,拉出七十三团全部、七十五团三个营、七十三团重机枪连,向南昌进发,打垮沿途追兵,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部队重新整编,周士第任第二十五师师长,李硕勋任师党代表。5日,撤出南昌,向南进发。南昌起义失败后,成立由朱德、周士第和李硕勋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转战闽粤山区。以后,李硕勋相继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和省委军

委书记。

1929年春,李硕勋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回到上海,李硕勋在沪西见到夫人赵君陶和不到半岁的儿子,高兴万分,并以李家“远”字辈分,给儿子起名李远芄(读 peng)(即国务院前总理李鹏)。李硕勋在沪西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往来于工厂、街道,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为了联合工人开展斗争,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上海工联会,李硕勋设法大力发展会员。

192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上海工人组织的“五九”示威运动周中,李硕勋发动沪西工人参加示威活动,展示了大革命失败后工人的顽强斗争精神。5月下旬,为纪念五卅惨案四周年,上海党组织和上海工人联合会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总示威。李硕勋通过沪西区各工厂的党支部和工人积极分子,秘密到工人群众中去联络、搞宣传活动。5月30日,沪西工人同上海工人一道,举行纪念五卅惨案四周年的总示威。

1929年秋,李硕勋调任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1930年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积极组织发动江苏、上海的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他参与领导红十四军、红十五军、红十七军的组建工作,为我党早期武装力量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1年8月13日,由于叛徒出卖,李硕勋在海南岛海口的一家旅店被捕,关押在琼山县警察局。在狱中,他以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刑拷打,并作了牺牲准备,写下遗书: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

李硕勋之子
李鹏与邓颖
超的合影





李硕勋与夫
人的合影

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是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九、十四

9月16日,国民党琼山县宪兵队用箩筐抬着被打断腿骨的李硕勋走向海口市东较场行刑。李硕勋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从容自如,毫无惧色。他高昂起不屈的头颅,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呼喊:“打倒蒋介石!”“打到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先驱李硕勋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李硕勋烈士的遗书通过难友、狱卒的关系,几经周折,才送到赵君陶手里。1959年,赵君陶将这封遗书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缅怀先烈、教育人民的珍贵教材。

李硕勋的妻子赵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의妹妹。李硕勋就义后,李鹏由母亲抚养,后辗转到重庆红岩村和延安接受教育。

朱德曾为李硕勋烈士题词:“硕勋同志临危不屈,从容就义,是人民的坚强战士、党的优秀党员。”

反对“左”倾错误 沪西永存英名

——记何孟雄烈士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碑林铸刻有烈士诗文,其中有何孟雄早年在黑龙江过境被囚禁时写的一首诗:“当年小吏陷江洲,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在何孟雄烈士展示区的玻璃柜内陈列着一块烈士生前使用的怀表,普陀区党史研究室负责人曾积极协助征集。

何孟雄(1898—1931),湖南酃县人,曾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他的妻子缪伯英是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龙华烈士陵园内 24 烈士墓

何孟雄早年就读长沙岳云中学时,参加反日爱国运动,与毛泽东、蔡和森结识。1919 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罢课、讲演、示威等斗争。1920 年 3 月,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10 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秋,与缪伯英结婚,将住处作为党组织的联络点。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参与发动和领导了长辛店、张家口、京绥路等铁路工人大罢工,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开创北方革命局面。

義聲

1927年9月,何孟雄担任沪西区委书记,与高俊毅(组织)、陈怀璞(宣传)、易国杞(职工)组成区委领导班子。原来区委成员朱世标、宗益寿、李荫泉、黄临川、唐林弟(女)因故调走。1928年1月,何孟雄调走

1926年秋,何孟雄南下到武汉,任中共湖北区委兼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党的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何孟雄被列入通缉名单。8月初，何孟雄等4人从家乡湖南抵上海，他化名刘元和(小山、晓山)，以开书店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夫人缪伯英以华夏中学教师身份，从事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领导工作。在险恶环境中，他俩经常天不亮出门，深夜回家。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和盯梢，两人分居两处。

(后任沪东区委书记等职务),由赵容(康生)接任沪西区委书记。

何孟雄担任沪西区委书记3个多月,现存资料很少。普陀区党史研究室经过多方查找,发现《沪西十月份工作大纲》、《沪西支部整顿支部计划》历史文件,署名廖慕群。经考证,此人正是何孟雄,从而填补了沪西党史的一个重要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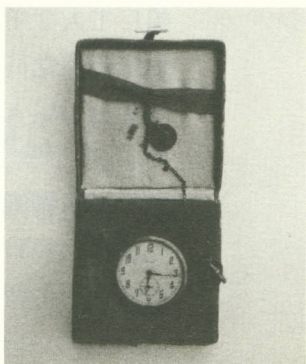
《沪西十月份工作大纲》(简称“大纲”)首先强调要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积极组织群众运动,使群众认识到党组织的力量。其次,要积极估量那些可靠分子,重新训练他们。

“大纲”认为,过去的斗争和工作使我们更了解沪西工作建筑在沙漠上,群众虽然很革命,可是我们拿不准群众的倾向和情绪,换句话说,我们以前领导群众是趁机而动,机会过了,群众的热潮降下去了,我们的工作也就跟着停止了,无论如何都活动不起来,老实说以前的工作纯是机会主义者的工作,我们要改变以前工作的老方式,就是建立党的基础。十月份我们更具体的规定,造就下级干部:一、群众下级领袖;二、党的下级领袖。

对此,“大纲”提出10月的工作计划:1.整顿支部(整顿方法另开);2.各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及工厂支部(详见职工计划);3.妇女工作整理;

4.五金支部工作建立;5.C.Y.(共青团)和党在下级的关系;6.下级干部的造就;7.沪西工厂设支部的发展组织。区委组织部按照以上七项做成具体工作计划,在这月内能实行(详见组织报告)。

“大纲”批评区委过去的“机会主义者的工作”,没有把握机会,这是指8月下旬罢工一事。沪西内外



何孟雄进行革命活动时使用的怀表



何孟雄就义纪念地

棉厂工人2千多人举行罢工,要求恢复老工会,被开除的工人复工和增加工资。党员在工人中散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册子。邻近的内外棉七、八、九等厂工人约4千人支援五厂斗争陆续罢工,并提出类似要求。由于罢工缺乏正确的领导,各厂的罢工要求未达到,遭到失败。这也是上级调来何孟雄担任沪西区委书记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对于工人运动很有经验,并希望他结合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工作,为沪西工人运动打开一个新局面。

同时,江苏省委制定了《上海十月份工运计划》,提出以反对国民党御用的工统会为一切实策的工作重心;改正过去偏重党内工作,系统地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等。根据省委指示,何孟雄等人商议具体工作,筹备沪东、沪西各棉纺厂联合召开的代表大会。10月24日,联合大会发表反对工统会宣言,宣布与工统会脱离关系,拥护上海总工会,成立工厂委员会。

11月,江苏省委通过《整顿组织决议案》,对上海各区委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其中沪西区委群众斗争的经验予以肯定,但认为需要注意克服群众中的流氓习气,应发展面粉和纱厂的党组织。江苏省委还发布《关于上海暴动问题》通告,要求各区委接到通告,应立即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执行,反执行中犹疑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决以“最严厉之处罚”。对于党内“左”倾盲动错误指导思想,何孟雄在执行过程中有自己的看法,不久被调离沪西。

以后,何孟雄到农村淮安等地组织农民暴动,写下了《省委关于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提出党要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尤以农民游击战争战略为主要决策的意见。何孟雄还提出正确主张:农村要“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到胜利”。

1930年,何孟雄三次向中共中央递交政治意见书,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撤销领导职务,写检查。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何孟雄再次受到“左”倾打击。继而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2月7日,何孟雄等24位革命志士被枪杀于龙华古塔之旁。

群起浴血奋战 三次武装起义

——记沪西工人纠察队

走进沪西工人文化宫，我们就会瞻仰到南草坪上的大型雕塑。高高矗立的一组高大人物塑像，基座正面雕刻“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纪念”，落款为“上海市总工会 1985 年 5 月”。

为了响应北伐战争，1926 年 10 月，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赵世炎等直接领导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江苏省党部左派等参与了准备工作。酝酿武装起义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力量，一是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总工会组织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二是上海资产阶级总商会出面组织的保卫团，三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在上海组织的一支武装力量。由于过分相信钮永建，加之其他原因，失去了起义良机。

10 月 20 日以后，上海武装起义指挥部与工人纠察队进入临战状态，由于北伐战场局势变化，起义计划和时间（24 日凌晨）被严重泄露，淞沪警察厅加强戒备。10 月 23 日，敌我双方紧张地准备，全市工人纠察队分别编为大队、中队和分队，晚上进入战斗岗位。上海区委发现敌情异常，又传来不利消息，当机立断，停止行动，立即派人通知各区工人纠察队。

但是，各区工人纠察队在接到停止起义命令之前，有的已经向敌人警察署发起了进攻。



矗立在沪西工人文化宫内的三次武装起义群雕

陶静轩是沪西工人运动领导人，这次起义被任命为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码头工人起义总指挥。浦东党组织和码头工会陶静轩等人组织了13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及10余支枪，但是由于泄密，原定起义的当晚，浦东警察厅得知消息，全部出动，彻夜巡逻搜查，并破坏了浦东吴家厅的指挥机关，抓走陶静轩等人。在敌人的法庭和刑场上，陶静轩态度从容，大义凛然，大骂军阀。11月16日，36岁的陶静轩向那些监刑的士兵演说革命道理，告诫他们不要再当军阀的走狗，赶快醒悟过来。临刑前，他说：“我在沪西参加革命，不忘沪西兄弟，死也要面对沪西。”陶静轩牺牲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军阀暴行。

192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伐军到达松江时，发动总罢工，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2月18日晚，得知北伐军已经到达嘉兴，上海市总工会决定第二天进行全市总罢工，援助北伐军。19日，全市15万工人参加罢工，20日，罢工人数激增到27.5万人，整个上海陷入瘫痪。沪西小沙渡一带罢工工厂达25家，人数1.5万人以上。

当日下午1时，沪西大夏大学学生积极支持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他们组织宣传队，手拿旗帜、传单，纷纷走在劳勃生路、曹家渡，边宣传边发传单，勇敢地揭露军阀残害人民的罪行。两名学生陈亮、陈骏被军阀大刀队抓获，慷慨陈词，英勇就义。

2月22日，罢工转为起义，局部地区战斗打响。但是，全市工人纠察队没有统一行动，加之其他原因，工人阶级陷入困境，实战中暴露了许多问题。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损失，23日早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作出停止暴动的决策。

为了吸取上海工人两次起义

敢把皇帝拉下马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流行的民歌)

天不怕，
地不怕，
咽着铁链子下面淌血花。
拼着一个死，
敢把皇帝拉下马。
杀人不过头落地，
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
“老虎凳，绞刑架，
我偏咬紧钢牙。
阴沟里石头要翻身，
革命的种子发了芽。
折下骨，
当武器，
不胜利，
不放下。

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流行的歌

失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彭述之、尹宽、王亚璋等8人组成，下设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统一领导起义。

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80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沪西各厂首先关车大罢工，在各厂纠察队维护下，整队游行。不久，各厂工人纠察队突然袭击敌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沪西起义队伍指挥者是中共沪西部委书记余立亚（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找革命真理，并在巴黎与周恩来等进步青年共同创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沪西工人纠察队分为两路，分别由余立亚、沪西工人纠察队长鲍孝良带领，有300多名工人纠察队及30余支枪。余立亚率队进攻曹家渡六区警察署，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缴枪投降！”“打倒军阀！”只有少数警察开枪抵抗，工人纠察队发起冲击，这时，申新一厂工人纠察队缴获了沿途岗警的枪支后赶来支援，很快俘虏了60余名警察，缴枪30余支。工人纠察队一鼓作气，渡过苏州河，迅速占领了潭子湾警察局。

另一路工人纠察队由鲍孝良、曾瑞率领。鲍孝良（1901—1927），又名学良，安徽人。早年来沪进日商纱厂做童工，1923年进内外棉十五厂做推纱工。以后参加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在沪西工友俱乐部接受革命启蒙教育，协助陶静轩在厂里成立工友俱乐部秘密小组。1925年初，他由陶静轩介绍入党。在“二月大罢工”期间，鲍孝良率先在厂内成立工人纠察队，被推任为队长。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和沪西工人纠察队时，他被任命为大队长。他激动地说，“今天，我们为刘华、陶静轩报仇的时刻到了，大家要拿出勇气，冲锋在前，打倒反动军阀。”

鲍孝良等率队从镇安里临时指挥所出发，沿途缴获岗警枪械，瓦解了共和路、恒丰路之间的二分所和巡逻队署，赶到小沙渡第四区警察署。这里有直鲁联军的支持，进行顽强抵抗，顿时枪声大作，一些工人纠察队员中弹倒地。唯一受过军校训练的曾瑞立即下令隐



1927年，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沪西工人纠察队缴得曹家渡枪械后的情形

蔽，停止进攻，调整战斗部署。工人们推来塌车，车上装满泥土的麻袋组成“活动堡垒”，再次发动进攻。敌人依仗有利地形和优势装备，继续顽抗。这时，余立亚率队赶到，两支队伍一起发起猛攻，敌人招架不住，举白旗投降。在激烈战斗中，曾瑞不幸中弹牺牲。

攻克第四区警察署后，沪西指挥部移至该处，并迅速指挥工人纠察队开赴北火车站，支援闸北的战斗。同时，留在沪西

的罢工工人，为了维持地方治安，随时解除溃散警察、逃兵和流氓的武装，坚决打击破坏分子。

这次武装起义的重点在闸北，十几万工人聚集街头，以壮声势。按照预定计划，闸北工人纠察队与沪西、沪东工人纠察队汇合，集中向起义的主要目标进攻。反动军警负隅抵抗，驻守北站的敌人疯狂射击，双方激烈交火。

第二天，闸北、沪西、沪东工人纠察队构筑了许多工事，重重包围了北火车站守敌，在激战中，工人纠察队的防线和工事屡遭敌人破坏，在群众的协助下，很快得到修复和加固。纠察队手握刚缴获的武器，轻重机关枪也架到前沿阵地上，轻重火力同时开火，硝烟弥漫，枪声大作。傍晚，终于攻克敌人最后的堡垒，取得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这次起义中 200 余名工人光荣牺牲，其中有沪西的陶静轩、曾瑞、陈骏、陈亮、杨启后、卞如庆、曹小四子、黄阿四等同志，还有一些牺牲的同志连姓名都未留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沪西部委书记余立亚被捕，在枫林桥被腰斩杀害，时年 30 岁。工人纠察队长鲍孝良、彭天保等沪西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

“华侨革命之母” 校园英才辈出

——记真如时期的暨南大学

在普陀区万里小区中心绿化带的南端，横卧一块花岗岩巨石，镌刻金色的铭文，这是当年国立暨南大学校址纪念地，西侧不远处保留着一座原科学馆旧址。暨南新校舍曾建于上海真如（现为长征镇辖区），被国父孙中山称为“华侨革命之母”。1937年夏，暨南校园毁于日军炮火，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



暨南大学旧址纪念石

国立暨南大学，前身为清政府南京薛家巷妙相庵的“暨南学堂”。1905年，两江总督端方偕同户部侍郎载鸿慈等赴欧洲考察宪政，归国途经南洋，与华侨有所接触，了解到华侨子弟长期客居异邦，疏远中华文化之弊端，深感兴办华侨教育之必要——“宏教泽而系侨情”。经报清朝廷批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国立暨南学堂于南京，创办人为端方。

校名“暨南”一词取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当时学生主要来自南洋诸国，故称“暨南”，意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南洋。

1922年3月19日，暨南学堂校董事会召开会议，议题之一为选择新校址，建设新校舍。与会校董认为南京校园过于狭窄闭塞，不能适应学校发展之需要，决定到上海选择新校址。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文化、航运中心，有利于拓展海外华侨教育。

经黄炎培、柯成懋、高阳、赵正平等人多处考察，最后选址在上海近郊的真如。经函请宝山县署批准，在真如境内紧靠沪宁铁路真如车站北隅征地 240 亩，兴建新校舍，时名为暨南学堂。1923 年 6 月迁校，更名为暨南学校，1927 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

暨南校训“忠信笃敬”，其出处古老而富哲理。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意即“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恭敬”，涵盖人的言行举止和做人准则，给人以启迪。

当年暨南校园有条“真如路”，缘自真如寺而得名。“真如”，大乘佛教的中心观念之一。据《辞海》的解释：真——真实、真诚，与“伪”相对；如——顺遂、依照、遵从；意为常如真性，按事物的真实状况（办事）。细究而之，暨南校训与真如的本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3 年至 1937 年“八·一三”抗战之前，这十几年在暨南校史上留下辉煌篇章，此后暨南校舍尽毁于日军炮火之中。

1923 年 7 月，早期革命家恽代英将暨南教过的学生韩汉光、蒙岛南等吸收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中共暨南学校支委，开始领导暨南学校的地下斗争和民主爱国运动。在上海现代革命斗争史上，暨南大学一直是学生运动的一面旗帜。党支部领导暨南“学生救国会”、“抗日救国青年团”、“左联”、“社联”、“文艺社”等进步社团，在师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1935 年“一二·九”运动中，暨南师生联合复旦、交大、大夏、光华、圣约翰等校学生，多次发动示威和请愿活动，共产党员黎莹、胡穗新、刘慈恺、王经纬（陈伟达）、邝劲志（方孟）等带领同学积极参

国立暨南大学
1937 年
的校门



与抗日救亡运动。多年来，暨南师生积极参加各种斗争，前赴后继，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统计，仅解放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有 206 人，被开除的有 100 余人，牺牲 13 人。

鲁迅先生曾三次为暨南大学师生演讲，后两次进入真如的暨南校园，在沪西留下历史足迹。

1927 年 11 月 6 日，中文系教授夏丏尊与鲁迅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华兴楼二楼，与暨南大学一年级近 30 名学生聚会，鲁迅即席演讲关于文艺创作和读书等方面的问题，没有具体的演讲题目。

1927 年 12 月 21 日下午，经暨南大学教授章衣萍出面联系，鲁迅接受该校秋野社的邀请，到校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路》。记录稿有多份，其中刘率真（曹聚仁）的记录稿曾发表，后经鲁迅审阅校正后，由杨霁云编入《集外集》。

1929 年 12 月 4 日下午，暨南大学坚冰社骨干周正扶等迎接鲁迅一起来校，鲁迅在大饭厅演讲《离骚与反离骚》，千余人听讲。鲁迅论及古今的离骚派和反离骚派，指出“这两派——牢骚与反牢骚——都不是社会的叛徒”，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现时统治阶级的利益。此讲演稿刊登于《暨南校刊》第 28 期至 32 期合刊（1930 年 1 月 18 日出版）。

暨南大学曾拥有一批批优秀教师，可谓群贤毕至：蔡元培、郑洪年、夏丏尊、马寅初、钱亦石、郑振铎、梁实秋、林语堂、洪深、沈从文、黄宾虹、钱钟书、夏衍等；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代栋梁之材，校友中曾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有：黄炎培、严济慈、周建人、许德珩、周谷城、楚图南、胡愈之、陶铸、吴学谦、李岚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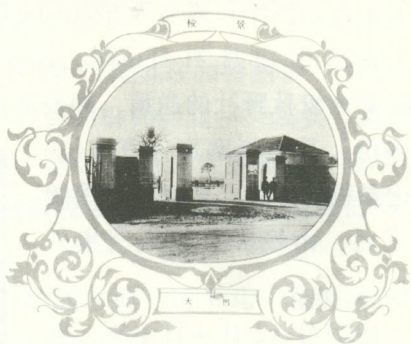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
庆祝接管
大会

“三苦精神”育人 艰辛历程铸魂

——大夏大学简史

华东师范大学坐落在普陀区内，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的全国重点大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身“大夏大学”及其创办过程。至今华师大校园内仍保存一幢早期建造的教学大楼“小白楼”（或称“文史楼”），记载着大夏大学办学的艰辛历程。



大夏大学的大门

1923年，厦门大学一些进步学生反对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联名向学校提出改革校务要求，校方处理不当，开除发动签名的学生陈国柱，激起全校学生义愤。1924年5月，校长解聘了支持学生的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三位教授。学生闻讯执意挽留，校长不同意，于是各系学生相继罢课。6

大夏大学
鸟瞰图



大夏大學鳥瞰照片 BIRD'S EYE VIEW OF GREAT CHINA UNIVERSITY.
地址：上海中山路 CHUN-SAN ROAD SHANGHAI

月1日，校方指使人毒打集会的学生。引起学生强烈抗议，四处揭露真相。全校教职工同情学生，六位教授愤然辞职。事态愈演愈烈，校方大批开除学生，提前放暑假，对学生停止供水、电和膳食。300余名学生发表宣言，集体离开厦门大学。

其中 200 余名离校学生推举罗士清等 14 人为代表来沪，请求厦门大学原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余泽兰、李拔峨、林天兰、吴毓腾、吕子芳、周学章等 9 人组织建立新校，避免失学。

当时政局动荡，大学风潮此起彼伏，同时出现许多投机大学，仅上海一地甚至多达 44 所大学，良莠难分。这些给大夏大学的创建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况且筹措办学经费更是艰难，诸位教授多方奔走，也难以落实。

厦门大学离校学生团代表之一何纵炎，是何应钦的季弟，何应钦的夫人是王伯群的胞妹。经何纵炎介绍，王伯群捐助现款 2000 元，得以开始筹办新校，暂设在小沙渡路 201 号。9 月 20 日，靠近槟榔路（安远路）的潘家花园里举行了开学典礼，22 日正式报到上课，学生有 291 人，基本上都是从厦门大学转来的学生。

建校初期，不设校长，由 8 名教授组成“校务行政委员会”，集体管理学校，如涉及学生重大事宜，则由学生会派代表一人列席。并且采取校务公开的方式，遇有复杂问题即由师生协商解决。

有许多名人愿意来执教，马君武教化学，周昌寿教物理、夏元璠教现代物理，沈璇、何衍睿教数学，邵力子教新闻学，郭沫若教文学概论，田汉教戏剧概论，何炳松教西洋史，李石岑教人生哲学，朱经农教文化史，程湘帆讲授教育行政，都很受学生欢迎。

校方无钱聘请许多职员，所有刻印讲义、管理图书仪器及采购、庶务等工作，大部分由学生分任，多数尽义务。学生的生活和个人衣着比较朴素，勤奋学习，博得社会好评。学校创办时提出了三个口号：“三苦精神”（苦教、苦学、苦干），“师生合作”，“读书救国”。由此激励全校师生，共克时艰。

1924 年 10 月 22 日，正式成立学校董事会，公推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为主席董事，邵力子为董事会书记，吴稚晖、汪精卫、叶楚傖、邵力子、马嘉森、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为校董。学校董事会决定校名为“大夏大学”，隐寓大夏，即从厦大嬗蜕而来，且有光大华夏之意。

同时，该校学生中成立了共产党、青年团的党团支部，支部地点设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致和里。召集人施乃铸，支部成员有

陈文、熊映楚、吴良斌（吴亮平）、陈国柱、陈兴冲、蔡珊、姚邦彦等。支部由沪西区委领导，中共中央派来的领导人为贺昌。党团合一的支部成立后，组织了国民党区分部，中共党员多次参加，形成国民党左派，由雷荣璞（雷经天）负责。后雷荣璞（雷经天）为党团支部书记，国民党左派组织由熊天荆负责。

1925年5月，顾正红被惨杀，大夏大学进步师生极为愤慨，中共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学生积极宣传、抗议。5月30日，按照预定计划，许多学生暗藏标语和旗帜，分别向各个集中点出发。有的在浙江路，有的在南京路，和其他学校学生一起，揭露顾正红被害真相，宣传爱国反帝思想。学生爱国言行遭到帝国主义的仇视，英国巡捕抓走20余名学生。



大夏大学胶州路校舍

6月4日，大夏大学突然接到工部局通知，被勒令24小时内迁出租界，学校本部遂被英兵侵占。学校被迫仓促迁至槟榔路（安远路）潘家花园为临时办公处，这里算是“华界”，周围的长寿路、胶州路和槟榔路都是“越界筑路”的地段，反而“自由”了。

大革命期间，上海多次举行全市性罢工、罢市、罢课。施乃铸、雷荣璞、陈国柱、熊映楚等学生分别参加了罢工委员会、学联、工商学联合会工作。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震动了上海滩，华洋两界宣布戒严，上海戒严司令李宝章下令大刀队在各处巡逻，大肆屠杀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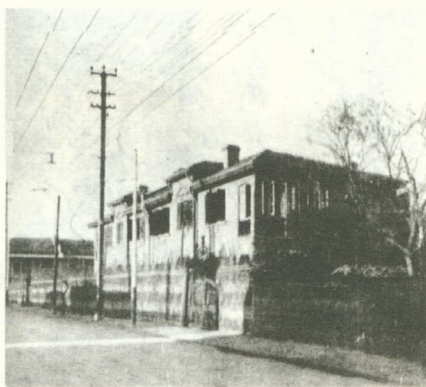
2月20日，大夏大学一些爱国学生到沪西一带宣传，散发传单，途中遇到李宝章大刀队，三名同学即平阳籍陈骏、永嘉籍陈亮和乐清籍胡宏模避走稍迟，不幸被抓住。李宝章下令将陈骏、陈亮在曹家渡斩决，陈骏、陈亮就义时高呼口号：“军阀无道，灭亡不远！”胡宏模被捆绑“陪斩”，血溅衣襟，旋解至龙华扣押，10日后，由校保释。“八·一三”抗战前，大夏大学图书馆还挂着陈骏、陈亮烈士的遗像。

1930年学校不断发展，胶州路校舍不敷应用，校方在中山北路、樊皇渡路一带（现华师大校址）购置几百亩农田，筹建新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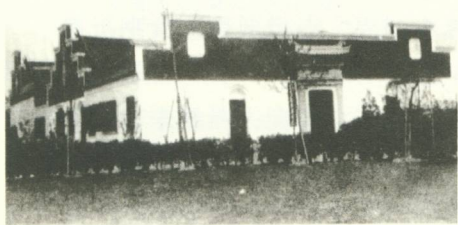
1931年，中国著名企业家、福新面粉厂创始人之一荣宗敬捐赠学校外西边一条大河（丽娃栗姐河），为大夏大学校园增添了美景。该校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而著称，共占有土地面积300亩。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日军大举侵华，大夏大学内迁，与复旦大学联手，分设于庐山、贵阳两地，分别为第一、第二联合大学。第一联合大学的大夏学生50人，下庐山到南昌，当时组建新

四军的陈毅曾到大夏同学住处讲游击战争形势。第二联合大学在贵州期间，历史社会系附设社会研究所，对贵州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进行了调查、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创立了民族博物研究室，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历



戈登路（现江宁路）校舍



潘家花园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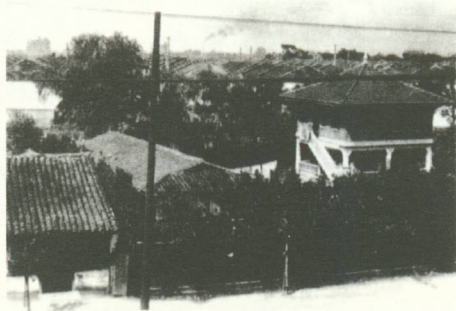
贵阳时期学校
总办处

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6年夏，大夏大学师生回沪之前，在贵州赤水树立了迁校纪念碑。10月，贵州、上海两地学校，在上海中山北路原校址合并，共有1700名学生。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学生应变自治会带领师生员工返校，修复校园，迎接新的一学年。不久，欧元怀、王毓祥重组学校董事会，推举王志莘为董事长，还成立了师生员工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有权讨论决定重要事项。这一年，大夏大学学生400余人参加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等革命工作。1950年，大夏同学又有100余人到东北等地工作，参加祖国建设。学生中160余人报名参加干部队伍，45人保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1951年夏，华东教育部决定以大夏、光华大学为基础，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在并校过程中，大夏大学中文系、英文系、历史社会系、数理系、化学系、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会计系、银行系、工商管理系大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小部分并入上海财经学院。至此，华东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大夏大学结束了历史使命。



胶州路办公楼、职员宿舍

幽默深刻演讲 横眉冷对诽谤

——记鲁迅在大夏大学的两次演讲

鲁迅曾到大夏大学作了两次演讲，在沪西留下历史足迹。可惜的是这两次讲演内容均佚失，后人只能通过鲁迅其他文章和有关资料探寻其内容。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遗憾地说：“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我记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1927年10月3日，鲁迅、许广平离粤抵沪，开始了在上海10年的战斗生活。8日，从共和旅馆迁居闸北横浜路景云里（现为横浜路35弄）23号，弄内第二排最后一幢，许广平称之为“景云深处是吾家”。这是坐北朝南的石库门三层楼房，楼下是客堂，前楼大间是卧室兼书房。前门斜对面是茅盾、叶圣陶、周建人家的后门，冯雪峰、柔石等也曾住在景云里，附近有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

鲁迅刚到上海原想待“周围清静一些之后，再看情形，倘可以用功，我仍然想读书和作文章。”但是，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老友闻讯纷纷前来邀请去演讲、讲课，鲁迅深感不能工作之苦，写给章廷谦信中吐露了烦恼之情，“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

11月9日，创造社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访见鲁迅，商议组织联合战线，恢复《创作周报》事宜，后因故未能如愿。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

第二天（星期四）下午，鲁迅家的客堂里又热闹起来，首先来的客人是大夏大学几个青年学生。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9月，一些教师 and 大部分学生原来是从厦门大学学潮中分离出来的。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执教，还作了几次演讲，双方交谈起来有一种亲切感，最后鲁迅同意下周前去该校演讲。把客人送走，又来了几个学生，鲁迅还是热情地接待。

11月14日下午，鲁迅应邀为劳动大学开设的《文学讲座》讲课（每周一次），但讲稿佚失。一周前，鲁迅已去该校开始讲课，讲题为《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认为“真正的革命家也是革命文学家，但现在顾不着做文艺，而现在的文艺家呢，只能喊喊，叫叫，还不能作出革命文学来。”

11月16日下午，鲁迅到光华大学讲演，主要讲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对文学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其中谈到国民党帮凶文艺，“新月派”献媚投靠国民党，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操纵文化进行反革命宣传的罪行。

11月17日下午，鲁迅前往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胶州路16号（后为301号）大夏大学讲演。

大夏大学创办之初，校舍暂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201号。不久，学校在胶州路两侧（靠近安远路）借得二亩多土地，马君武校长以吴淞的私人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得二万两银子作为建筑费用。1925年5月中旬开始兴建新校舍，9月，新校舍落成，学校随即全部迁入。胶州路修筑于1913年，路南段为住宅区，向北逐渐过渡为工厂区。1930年秋，大夏大学迁移到现在华师大新校舍，原校址让给大夏大学附中。此后不远处建成的胶州公园，曾驻扎著名的谢晋元部“孤军营”。

鲁迅出现在大夏大学大礼堂里，顿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盯着享有盛名的文坛健将。鲁迅的脸黑黄，头发比较乱，穿着一件老布长衫，衣着随便，不爱修饰，难以同他的盛名联系起来。鲁迅演讲了整整一小时，大多数学生都被折服。当天晚上，鲁迅将此事写在日记上。遗憾的是这次演讲内容和题目均佚失，根据当时鲁迅其他讲演内容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文学与社会、革

命”。

这时该校董事长王伯群已接替马君武任校长，并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鲁迅来校演讲时，王伯群在南京参加南京政府常务会议，19日晨，与财政部长孙科同车抵沪。王伯群虽主张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但是在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反共之际，王伯群作为南京政府要人当然不会同意眼皮底下鲁迅“离经叛道”之说，这也是鲁迅这次演说没有流传的原因之一，当时大夏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大夏月刊》上也未透露鲁迅来校演讲的有关情况。

鲁迅到各校接连演讲，引起各种反响，其中鲁迅在光华大学的讲演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2卷第7期（11月28日），同时发表了谢元范《略评鲁王梁饶四先生的演讲》，“鲁王梁饶”即指鲁迅、王独清、梁实秋、饶孟侃4人。

二

1929年8月初，大夏大学刊登招生广告，其中注明招收三年制的预科生（高中），校址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胶州路16号，无轨电车直达。秋天，该校爱好文学的预科生成立乐天文艺研究社，由虞德元、丁君美、洪君、刘致宝、潘权、高贞崧、刘导沂、刘璨等发起，男女同学相率参加者前后有40余人，每周乐天壁报八张，“若谐若庄，琳琅满目，凡校中师生，入阅，均赞许不止。”

这时，鲁迅、许广平已移居到景云里17号，隔壁18号仍然是周建人夫妇家。为了两家出入方便，在两家之间打通并设一木门，但仍然从18号后门进出。家里时常响起婴儿哭声，那是刚出生的周海婴，鲁迅、许广平忙碌中欣喜不已。

1930年2月14日晚上，鲁迅先生收到乐天文艺研究社写的信，邀请他再去大夏大学演讲。鲁迅因牙齿肿疼，引起身体不适，晚上睡不好，原想推辞，为了不让学生失望，便答应了。当时《大夏周报》第74期有篇报道：“近日派员邀请鲁迅郁达夫诸先生，来校作公开学术讲演，届时定有一番盛会云。”

鲁迅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自由



鲁迅在演讲
后的照片

运动大同盟，与郁达夫、郑伯奇等人在“宣言”上签名，后又当选为执行委员。鲁迅赞同该组织的宗旨——抗击黑暗，争取自由，但是不同意李立三冒险“左”倾一套，采取飞行集会、撒传单、城市暴动等活动。同时，鲁迅与柔石、冯雪峰等人积极筹备成立左联。3月2日，鲁迅前往中华艺术大学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他演讲时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其中原因之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

3月9日，鲁迅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时再次谈及革命与文学家的问题，还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人，两只脚分别站在写有“革命”、“文学”二字的葫芦上。大家忍不住大笑，但是，鲁迅依然很严肃。

3月13日下午，作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活动，鲁迅、郑伯奇等前往大夏大学演讲，在胶州路校舍斜对面的礼堂兼风雨操场举行。千余学生早已挤满了礼堂，连窗台上都站了人，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两个学生散发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同月，大夏大学成立同盟分会），宣言落款前两位是郁达夫、鲁迅。

鲁迅还未赶到时，会议主持者先请“自由盟”成员郑伯奇、潘某（可能是潘汉年）演讲，介绍了他俩的著作和简历。郑伯奇是个忠厚人，说着一口陕西话，他与潘某先后介绍了关于“自由盟”有关情况。

突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原来鲁迅赶来了。会场里有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看见礼堂外面的鲁迅先生，他穿了一身灰色的厚棉袍，头发很长，脸色有些苍白，听说他是抱病而来。主持者让鲁迅先休息一会。

在一片掌声中，鲁迅登台演讲了，因牙疼，声音并不高，徐缓，沉着，亲切，就像拉家常。遗憾的是他的演讲内容也佚失，幸好两年后他在《〈二心集〉序言》里谈起这次演讲。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

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象牙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鲁迅在其他文章和有关演讲时曾提及,批评这种“为艺术的艺术”——造象牙之塔的消极风气,仿佛与社会上的一切毫无关系。在这次演说中,鲁迅加以引伸:黑暗的社会已不容许摆放象牙塔,只好搭设几个可怜的“蜗牛庐”,以此形象化地讽刺,只能“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思想被禁锢,哪里还有什么文艺。

鲁迅的精彩演讲,使学生们时而哄堂大笑,时而会意地点头称许。但是,都遭到国民党右派报刊的恶毒攻击,特别是针对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活动的攻击。

3月18日,国民党当局控制的《民国日报·觉悟》制作了一个栏目标题:《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这次演讲,“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藉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

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革命的志士吗？”3月20日，《革命日报》副刊《革命之光》第69期发表《听了鲁迅们演讲之后》一文，也拼命攻击鲁迅等人演讲。

继大夏大学演讲之后，鲁迅、郑伯奇等人在中国公学分院继续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组织活动（3月19日），鲁迅演讲《美的认识》，也同样遭到各种恶毒攻击。4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刊登《鲁迅卖狗皮膏药》，攻击鲁迅的演讲是为共产党和自由大同盟作“口头宣传”。5月7日，该报副刊发表《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什么“鲁迅屈服了在共产党麾下”，“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等等。

因此，鲁迅在《〈二心集〉序言》愤怒地谴责反动当局“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只好变了真的蜗牛”，并引用唐代韩愈诗句“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以此辛辣讽刺那些反动报刊之说。

其实，鲁迅不同意李立三搞的“左”倾一套，虽然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组织活动的演讲，但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演讲。3月21日，他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言行，引起反动当局的仇视，下达通缉令，鲁迅不得不躲避在内山书店。1930年5月，鲁迅全家搬离景云里，迁往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

鲁迅病逝后，郑伯奇写了悼念文章，提及自己与鲁迅到大夏大学演讲一事。但是，他把这次演讲的内容错记为鲁迅在中国公学分院演讲的《美的认识》，即关于美的阶级性问题。戈宝权回忆鲁迅在大夏大学演讲的文章里已指出这一点，并说明可以查看鲁迅《〈二心集〉序言》。

领导“赤色沪西” 屡建奇功传颂

——记早期革命家张浩

1942年3月9日上午，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举行万人公祭张浩，灵堂两侧挂着中央治丧委员会的挽联：“工人先锋，战士楷模”。毛泽东主席题写挽词“忠心为国，虽死尤荣”。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祭礼结束出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其执拂抬棺上山，万余人排着长队，徐徐向青年文化沟的桃花岭行进。最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各界代表挥锹奠土，毛泽东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1929年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张浩

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大冶、汉阳、长沙、安源等地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秋，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秋回国，成为职业革命家。为了便于在各种环境中工作，他经常变换身份，使用多个化名，张浩，则是1935年秘密从苏联回国时起的化名，一直沿用到病逝。

张浩先后在上海沪西从事工人运动，他的英勇事迹被人传颂。1926年8月，小沙渡日商纱厂反日罢工失败后，余立亚被任命为小沙渡部委书记，张浩任组织部兼宣传部主任，积极协助余立亚等人调查研究，并奉命负责内外棉七、八、九、十二、东五各厂党组织。

1928年，张浩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支持毛泽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9年初，因被敌人悬赏追捕，张浩化装成和尚，身披袈裟，手持佛珠，赶到上海，担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区委成员有刘锡五、党维蓉、吴龙章、金秀（女）、了君、董惠民、钱宗仁、林一、傅縡

云（女）。

张浩不仅动员妻子涂俊明到上海参加革命，还动员四弟林育农、内弟涂延林、堂妹林春芳到上海参加工人运动。堂妹林春芳在上海革命活动中积劳成疾，病死在上海；内弟涂延林和另一个内弟涂明山相继英勇牺牲；堂弟林育南是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张浩启蒙小弟林彪，不久参加革命，后来成为著名战将。

张浩在沪西领导工人运动，每月只有五六元生活费，还要接济失业工人，家里时常开不了锅，有时竟饿晕了。他曾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沪西区委和下属支部工作和建设问题时，省委提出加强产业支部工作的意见，确定沪西产业支部有电气车四厂和五厂、同兴、振泰、中新纱厂和绢丝厂等支部在党的生活和群众斗争中都要起核心作用；慎重对待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党的老党员，积极发展新党员；妥善处理失业工人；确定争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破坏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的方针。

1929年5月19日晚上，沪西新加坡路（今余姚路）英军兵营附近老虎灶主张学良，遭英兵殴打死亡，引起公愤。江苏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和赤色工会，抓住“张案”扩大反帝斗争。张浩等人设法成立了援助“张案”委员会，在邮务工会召开代表大会，百余团体千余人到会，议决5月30日公祭张学良，并通过五卅四周周年纪念筹备会等决议。经上海《申报》、《时报》跟踪报道，掀起全市反帝浪潮，迫使驻沪英军司令部公开道歉，看管肇事者，答应出葬殓费、抚恤费，并下令把兵营迁到愚园路，不准英军外出。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沪西人民的斗志。

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全市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张浩组织沪西工人大示威，冲破反动军警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张浩抬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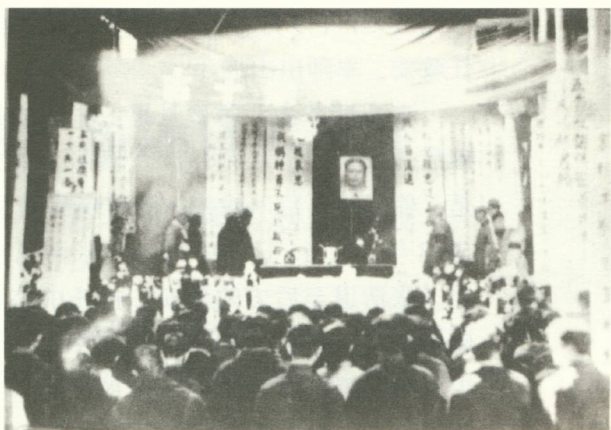
的层层封锁线，向预定的路线进发。游行队伍遭到武装镇压，许多群众被强行抓走，更多的示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示威游行的总指挥张浩，发现有两个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奋不顾身前往解救，与敌人殊死搏斗，救下两个妇女。但是，敌人死死揪住他，打得遍体鳞伤，

把他关进监狱，施尽酷刑。4个月后，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张浩出狱后，任中华全国海员工会特派员，负责领导香港、广州的海员工会。1930年4月起，先后任满洲省委常委、工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1月，在沈阳被捕，受尽酷刑。1932年1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赴上海任全总常委和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这时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沪西成为上海反日大罢工的中心，张浩赶到沪西，与时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的刘少奇一起领导反日斗争，沪西一时成为“赤色沪西”。

1933年初，张浩奉中央之命，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失去联系，张浩受共产国际委托，回国寻找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张浩把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八一宣言》及电台密码反复背诵，铭记在脑中，化装为商人，挑着货筐，从莫斯科取道蒙古，穿过沙漠，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定边，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张浩在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的错误。1936年1月，他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任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援西军政委（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



张浩追悼
会场景

员)。1937年9月，与刘伯承一起组建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委，率师出击战斗。

在长期革命斗争岁月里，张浩的身体遭受严重损伤，脑部经常疼痛，发病时，必须用冰块镇痛。中央考虑送他去莫斯科治病，但是，他坚持要留下战斗。随着疾病加重，他已无法在前线指挥战斗，1938年1月16日，中央决定张浩退出一二九师，由邓小平接任政委。张浩退至后方的延安，担任中共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仍然废寝忘食工作，1942年3月6日，不幸病逝。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隆重葬礼，万人参加，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和各界代表挥锹奠土，张浩遗体葬于延安桃花岭山顶。

1997年2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张浩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出席。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和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共同牵头拍摄大型电视剧《张浩》，创作组

张浩烈士墓



和电视拍摄组到张浩曾战斗的地区访谈调查。他们到上海市普陀区时，受到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引领到苏州河、长寿路（劳勃生路）、余姚路（新加坡路）等地拍摄实景，提供了编写的《不灭之星》等资料，被编入他们出版的《张浩传奇》一书。

同仇敌忾抗战 粉碎日军美梦

——记 1932 年初淞沪抗战

1932 年 1 月 29 日，大公报、申报相继报道了昨晚十一点半发生的沪西战斗，激烈交战的双方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侵华日军，由此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侵华日军得寸进尺，先后向榆关、天津、塘沽、青岛、厦门、福州、汕头、上海等地挑衅。天津事件虽在小抵抗后划出“中立区”以求妥协，而上海事件则日益增多。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发出指令，要求上海公使馆武官在上海制造一些事端。随后发生了女特务川岛芳子制造日僧伤亡事件，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杀伤华捕，在北四川路捣毁华人商店。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口头表示遗憾，实际并无具体禁止暴行措施。

1932 年 1 月 21 日上午，日方借口日本僧人被殴伤，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即时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等团体。驻沪日本第一舰队司令部声称，“如果答复不圆满，将采取严厉的对付行动”。25 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催促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对解散抗日救国会等无理要求作出答复。27 日晚 8 时，

十九路军
战士奋起
抗日





郊区农民
帮助十九
路军挖战
壕筑工事

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48小时内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采取行动。上海市政府于28日下午2时完全接受日本总领事提出的最后通牒，公然命令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市长吴铁城命令市公安局局长温应星和市社会局长麦朝枢，分别查封上海各区抗日救国分会，至下午5时查封完毕，日本

总领事对国民党市政府这种不准爱国、屈辱投降的行为，表示满意。

但是，当晚11时，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本一发出另一个通牒，强迫国民党上海驻军让出防地，交其占领，并于午夜12时率领海军陆战队和便衣队向十九路军防地闸北进攻。当时驻闸北的七十八师翁照垣旅张君嵩团奋起抵抗。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退让，官兵拒不执行，于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此前，侵华日军步步进逼，战争迫在眉睫之际，除金融界张公权等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和平解决”外，广大市民和群众团体异常悲愤，认为屈辱求和已不可能，只有拚死抵抗，才能求得生存。上海工农学商各界借打浦桥法政学院开联席会议，通电要求对日绝交，反对日总领事所提无理要求。上海学生联合会全体干事赴市政府，坚决反对屈辱外交，反接受日本总领事的无理要求。

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发动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的活动，上海总工会组织工人参加抗日斗争，宣布抗日同盟罢工的命令。左联组织抗日会也发表了宣言。

战事一发生，童子军、学生军、义勇军、战地服务团纷纷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和战地服务。妇女界宋庆龄、何香凝和医务界颜福庆、牛惠生、翟直夫、倪禄春，以及工商界史量才、刘鸿生等积极

组织救护队、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等，支援抗战。上海各界募集寒衣、食品及各种军用物资进行支援和慰劳，各方函电和报纸舆论对中国军队奋起抗战，备致赞扬。这些爱国举动让十九路军官兵深受感动，奋勇作战，视死如归。他们优待俘虏，重伤被俘的日军空军少佐等及时得到救护，被击毙的藤井海军大尉还被厚葬于真如。因此，日方报纸亦表示钦佩。

淞沪抗战爆发之前，侵华日军根本看不起中国，诋毁中国为“非有组织的国家”，盐泽本一扬言在4个小时内可以占领上海。没想到十九路军官兵奋起反击，勇猛异常，迫使日军节节败退。不到24小时，国内外舆论完全改变，中华民族恢复了自尊心。日军在战场上的一败再败，被迫退却，于是增调海军陆战队，更换野村古三郎为司令，结果仍不免失败。后又增派久留米混成旅来沪，纪家桥一役，又被击溃。接着，特派菱刈隆为司令官，增调陆军第九师团，更换植田谦吉为司令官，在庙行一役中又遭失败。乃另委白川义则为司令官，再增两师团来沪。一个月内，日军再三增兵，五易主帅。

十九路军
军长蔡廷
锴在前线
指挥督战



到3月1日，国民党军队因日方新增师团在浏河登陆，后方及侧面受包抄威胁，一时无援军开到，乃撤退至第二线待援。这时，上海日军计有五个师团七八万人，军舰80余艘，飞机百余架，大炮300多门，武器优良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十九路军不过2万5千人，战斗20天后，加上第五军两个师，共为五个师，人数仍不满4万。力量如此悬殊，竟能不断取得胜利，完全是由于人民和不屈的民族精神使然。

但是，淞沪抗战仅持续了30多天，敌方不断增兵，国民党军队退入第二线待援，迄无援兵开来，而议和之声甚嚣尘上。早在1月29日，国民党政府请求国际联盟行政院依据盟约第十五条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调处，并请英、美驻华公使斡旋调停。3月1日，驻华英、美公使提出休战3天和五项调停办法，日方停战条件之一要求十九路军撤离京沪线。最后，日方因东北义勇军纷起，日军兵力单薄，亟须抽调军队去东北防守，日本国内反战运动兴起，重光葵等被刺受伤，而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不可轻侮，乃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军队撤出防线，由警察接防，日军退至“一·二八”前的防线。此后，蒋介石命令十九路军撤出京沪线，调往福建，继续实行其消灭异己部队的阴谋。不久，十九路军又在福建高举抗日义旗，成立反蒋的人民政府。

淞沪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抗战三日亡国”，“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上海的美梦，迫使日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吞并上海华界的计划，十九路军全体官兵英勇顽强的精神永载中国抗战史册。

抗敌壮我军威 硝烟遗址传世

——记十九路军临时军部真如范庄

1930年8月，六十师（师长蔡廷锴）、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被扩编为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十九路军军长。1931年10月，十九路军被调驻京沪铁路沿线担任警卫，蔡廷锴率部队前往，并恳请蒋光鼐回指挥部，蒋光鼐因对蒋介石不满等原因，仍然称病不愿出面。

自“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一直很关心东北武装抗日的动态，并产生率领部队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想法。于是他在上海金菊村住处秘密召集十九路军旅长以上的将领，提出去东北的想法，得到大家的赞同，决定组织一支“西南国民义勇军”。

正在紧张筹备义勇军之际，日本政府唆使日本浪人有计划地上海挑衅。1932年1月22日蔡廷锴从前线得到情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日军准备开战，当晚赶到蒋公馆，与蒋光鼐商量。第二天，举行军官秘密会议，由蒋光鼐主持，蔡廷锴等作了重要讲话，大家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决心守土抗战。晚上7时，蒋光鼐、蔡廷锴向各部发出准备抗战的第一道密令。

1月28日晚上11时许，日军分五路进攻闸北十九路军防区。蔡廷锴接到前方来电，马上下达反击的战斗命令，“砰！砰！”十九路军将士打响了正义的第一枪，由此拉开了威震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日血战的序幕。

当晚，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淞沪警备司令）紧急开会后，星夜步行绕道赶往真如火车站（曾为上海西站）。当晚下着雪，路上泥泞，滑而难行，一直到天将拂晓，他们才赶到十九路军军部——



十九路军总
指挥蒋光鼐



十九路
军军长
蔡廷锴

火车站西南的范庄。

范庄，1920年前后由广东富商范肖之所建的别墅，占地约6亩，整个庄园被篱笆所围。主要建筑为两间西式平房，约50平方米。房前有70-80平方米的草坪，四周广植花草树木；东侧有约50平方米的玻璃暖房，供养花之用；暖房南面有人工水潭，用来浇花木，潭旁立一小亭，甚为别致。廊庑下有一对联：把酒涤烦襟，任世界变乱纷乘，地似桃源堪息影；凭栏舒画眼，喜风月留连共话，园非金谷也陶情。

当时为十九路军抗日需要，由赈灾会拨款，上海市工务局会同十九路军交通处动员灾民参加筑路。以范庄附近为中心辟筑的真北路、真南路、真大路等军用公路，后经历年修建拓宽，成为上海市西部的重要交通干道。

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发出了“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的通电”，电文义正辞严，“……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十九路军将士在闸北等处浴血奋战时，真如车站也成了日军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美国记者斯诺在范庄采访蔡廷锴时，日军飞机就来轮番轰炸，有的低飞扫射，有的低空侦察。因为这里不仅有军部指挥所，闸北战事的命令都从这里发出，而且这座车站是兵站，凡是调来上海的军队，都在这里下车，转赴前线。斯诺看到下车的士兵穿着灰色的军服，衣衫单薄，他们背着一顶写着“十九路军”四个大字的铜鼓帽。

“砰！砰！……”军部附近响起了步枪的射击枪声，突然“轰”的一声，原来有一架低飞的日机被战士击落，掉落在军部前面。蔡廷锴和斯诺过去观看，只见日机碎了几段，驾驶员和两名射手被燃起大火烧成灰烬。蔡廷锴和斯诺一起向战士鼓掌，表示祝贺。

2月1日，蒋光鼐在南翔设立了总指挥部，军部仍设在范庄。

接连几天，日军以陆海空全军力量连续进攻，战火从闸北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但屡攻屡败，都被十九路军的铁拳粉碎了。2月6日，天晴，宣告日军第一次总攻失败。连日本《每日新闻》都哀叹，“我军惨遭未有之惨败。”

这期间，我空军已经参加空战。2月5日，日机9架在闸北投弹后，飞抵真如，企图轰炸真如国际无线电台。十九路军地面火力猛烈还击，我空军战机也赶到，强占至高点，配合地面炮火，对日机俯冲射击。有两架日机机尾冒烟，一架带伤逃去，另一架日机被击中，轰的一声巨响，急速坠地。机身粉碎，机师三人皆死，其中一人为海军大尉矢野让五郎。日机头有“三菱航空机株式会社修理，昭和六年七月十八日”字样。在飞机座舱内缴获手枪3支，已毁坏机枪2挺。当时围观群众数百人，许多人取机身残骸小块以作纪念。这是我空军首次御外作战。

2月7日晨，新上任的日军总指挥官野村下达第二次总攻击的命令。经过一番大血战，2月9日，十九路军与唯一前来支援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全线告捷。

2月10日，蔡廷锴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带去两箱高级法兰地名酒（此由永安公司老板送给军部的），送给守军指挥官。第二天，他又前往闸北前线，因他的身材较高，日军机枪扫射过来，子弹射穿他的左肋下的军服，没打中身体，却把两名护兵打伤了。

当各界人士都来祝贺十九路军胜利时，军政部何应钦却积极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在向日军屈膝求和的同时，给蒋光鼐来电，催促十九路军撤退。蒋光鼐和蔡廷锴商量后，决定不撤退，蒋光鼐回电说，“……仍拟以一部坚守吴淞闸北，余配备于胡家庄、大场、真如、虹桥之线，控置预备队于南翔，敌来与之一决……”蔡廷锴答记者问时也表示，“如日军不顾国际公法，不顾人道，用毒气炮向我攻击，我军亦必拼命抵抗。决不因日军之炮威，而稍动素志。”

2月18日，已是第三次更换上任的日军指挥官植田竟然厚颜无耻地向蔡廷锴提出哀的美敦书，要十九路军撤出上海。这“最后通牒”一经公布，引起一片哗然。蔡廷锴把此荒诞的“最后通牒”交给蒋光鼐，蒋光鼐立即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大家都感到很气愤，蒋

光鼐把手一挥说，“用大炮回答植田！”

经过两天两夜的大血战，植田“中央突破计划”彻底破产，全线总败溃，所谓的“最后通牒”成为历史的无情笑料。

十九路军奋勇抗战，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许多爱国志士组成义勇军，自2月3日至2月26日，先后前来真如，以不同方式参加抗战。据《真如镇志》记载，当时有名称的义勇军就有29支，分别参加救护、运输、修路、宣传等，有的还转到闸北前线等地参加抗战。上海市商会组织的童子军服务队来到真如，他们戴着红袖章，在街上巡逻，指挥交通，检查来往行人。自开战后，日军派出密探、浪人和汉奸，到真如来刺探情报，企图搞暗杀活动，破坏设在真如的国际无线电台。因此，童子军等发现可疑的人时，就把他们送到范庄军部。有两名对空发射信号的汉奸，被抓住枪决。

中共临时中央先后发表《关于上海事变的斗争纲领》等，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和组织上海市各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何香凝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往真如慰问，发动捐献冬衣活动，建立战地医疗所和医院等。

南京、北平、天津、济南等地民众纷纷来信慰问，并寄来大批慰劳物品，其中就有大量的粮食。2月2日送至真如粮食就有130担（每担50公斤），4日为233担，5日247担……几乎每天都送来大量粮食，粮食等物质存放于暨南大学里。

但是，蒋介石不仅不派部队支援，还下令不准其他部队前来上海参战，使十九路军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同时派人与日军会谈妥协，下令十九路军退居第二防线，不要继续抗战，葬送了英勇壮烈的淞沪抗战。

3月1日晚11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退出真如防地，梁佐勋团长率领部队在真如车站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战斗甚烈，伤亡惨重，后退至江桥。3月2日，日军占领真如，镇及四乡百姓遭受惨杀。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才撤离真如。

5月28日，在苏州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大会由蔡廷锴主持，蒋光鼐亲笔写下一副挽联：自卫

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碑，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人，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场“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军民协力抗战 30 余天，先后在闸北、吴淞、江湾、大场等地击退了武器精良、兵力 10 倍于我的日本海陆空军的疯狂进攻，打死打伤敌人 3 万余人，迫使日军四易主帅，谱写了抗战史上扬眉吐气的新篇章。

如今，曾为上海西站的斜对面是车站新村居民区，即桃浦公路（原车站路）127 号——昔日真如范庄旧址，十九路军军部曾设在那里。1937 年“八·一三”事变时，范庄毁于战火。车站新村内，设有十九路军军部遗址纪念地（长 23 米，宽 21 米），四周有铁栅栏，以及高大枝叶浓密的树木，中间是一座黑色大理石的纪念碑（高 2.05 米，宽 1.1 米），正面刻写着“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军部遗址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九月立”。碑的其他侧面还刻写着当时十九路军抗战的内容简介。车站居委会里挂着十九路军抗战展版，由离休干部为青少年讲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桃浦路 127
号十九路军
临时军部纪
念地

亲临前线慰问 激励将士抗战

——记宋庆龄等援助十九路军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东北爆发后，不久“一·二八”淞沪抗战又打响第一枪。在国家安危之际，宋庆龄挺身而出，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外国记者称她是“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义勇，不畏强暴……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宋庆龄慰问十九路军抗日将士，与蔡廷锴摄于真如范庄军部

“九·一八”事变后，反动当局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东北大好河山很快陷入于敌手。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地学生首先奋起，在南京发生了抗日救国的学生示威队伍遭到血腥镇压的“珍珠桥惨案”。一直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的宋庆龄悲愤填膺，怒不可遏，连夜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她列举了大量确凿事实，愤怒谴责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法西斯暴行，无情揭露了反动当局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各种卖国投降活动。该宣言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31年12月20日刊登在《申报》上，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抗战第一枪后，经过20多个小时的血奋战，击退日军一次次进攻，粉碎了日军战前扬言4小时即可占领闸北的狂妄计划。1月29日晚上8时，日军狼狈地要求停战。这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却急电蒋光鼐、蔡廷锴放弃抗战，再次施加压力。

宋庆龄很清楚十九路军违抗不抵抗命令而自卫作战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更需要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她与何香凝等人商量前去慰问。

1月30日早上8时30分，宋庆龄和何香凝带领两辆满载慰问品的卡车，奔赴十九路军作战前线。这天依然是天寒地冻，但上海民众支持抗战的热情高涨，不时地拦下卡车，送上整只剥皮的猪、羊、鸡鸭和一篓篓鸡蛋，还有人送上盛着热气腾腾馒头、大饼的箩筐，恳切地嘱托代献给前方抗战将士。对此，宋庆龄和何香凝等深受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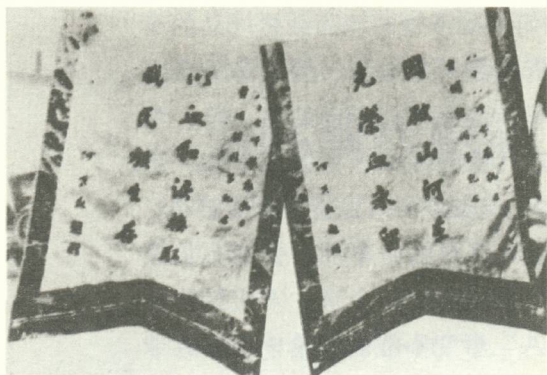
宋庆龄和何香凝先到真如范庄十九路军临时军部，受到军长蔡廷锴等热烈欢迎。宋庆龄、何香凝与蔡廷锴亲切交谈，宋庆龄称赞十九路军违命抗战，洗刷了“九·一八”事变不战而退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奇耻大辱，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她还亲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发表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支援你们，支持你们！”宋庆龄还与蔡廷锴在军部门前的台阶上合影留念，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2月6日上午9时，真如经历了日机疯狂轰炸之后，到处是一片片废墟，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刺鼻的焦味。这时，宋庆龄再次出现在真如范庄，身后还有弟媳张乐怡（财政部长宋子文夫人），携带慰问品前来慰问，勉励将士们奋勇杀敌。

蔡廷锴在《自传》中写道，“二月六日，天阴晴，拂晓后炮声已停。据沈师长报告，在拂晓前，敌人以少数兵力来扰，均被我军击退。九时，孙夫人、宋部长夫人等来部劳军，并慰勉，约一小时即辞去。”

2月9日，十九路军与唯一前来支援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经过一番血战，击退日军第二次总攻击，全线告捷。正当社会各界祝贺时，军政部何应钦却积极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向日军屈膝求和，同时催促十九路军撤退。

2月12日，坚守在吴淞前线的十九路军官兵经历了几天异常激烈的战斗，现在他们欣喜地见到了宋庆龄，她在旅长翁照垣的陪同下巡视阵地。旅部指挥所设置在竹林掩护下的一个小村落里，指挥所里还特地挖了地窖。在指挥所里，宋庆龄与师旅指挥官亲切交谈时，外面炮声不时响起，日机还向地面扫射。她镇定自若，对在场的记者发表谈话，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抗战的重大意义。并对翁照



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并赠抗日将士锦旗

垣说：你们“守吴淞立功奇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翁照垣激动地代表全体将士表示，“以卫土为责之将士，决不使敌人稍肆横暴，使敌人决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

由于当局停发十九路军的军饷和物质，宋庆龄、何香凝在慰问时看到十九路军官兵只

穿了单夹军衣，战斗在冰天雪地的前线。在寒风刺骨里，有许多负伤的战士们急待救护治疗，医疗设备也严重短缺。这些让她俩十分痛心，当场向十九路军指挥官表示要为抗战出份力。

回到市区后，宋庆龄、何香凝立即发动募捐活动，并与《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联系，呼吁为前方抗战将士捐制棉衣。何香凝在寓所大门上张贴着“此处接受热心援助”的大幅纸条。各界民众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到5天就收到群众捐献的全新棉衣3万多套，棉被2000余条，基本上满足了前方将士的急需。上海有关部门在两周内就送去军粮7010石，其他副食品、生活用品不计其数。到淞沪抗战结束时，十九路军公布，收到海内外捐款大洋1000万元以上。这些捐款和物质远远超过当局停发十九路军8个月的军饷。

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市各团体、医院、各大医学院校纷纷组织救护队开赴前线。至2月底，统一改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有30余支，队员2000余人，先后救出受伤官兵6000余人和难民数万人。

为了改变当时各界举办的伤兵医院比较分散的状况，宋庆龄、何香凝商量决定，“应有持久集中之组织”，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医疗力量的国民伤兵医院，能给伤病员以精心治疗。她俩的倡议得到了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借出校舍，东南医学院院长捐献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申报》馆和先

施、永安、新新等各大百货公司的实业家踊跃捐献钱物，新加坡华侨胡文虎汇来1万元巨款援助。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3月5日，拥有300张床位、医疗器械设备完善的国民伤兵医院在交通大学内正式开办。《申报》还特地刊登一组“救护工作”的新闻报道，其中就有“宋何组织伤兵医院”的报道。

国民伤兵医院公推宋庆龄、何香凝担任理事，主持工作，并聘请中西医学专家为伤兵员精心治疗。国民伤兵医院成立的当天，宋庆龄对记者发表谈话，她指出，“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我辈之设立此医院，仅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其敬仰感谢而已。”

铮铮铁骨魂 血洒雨花台

——记沪西“共舞台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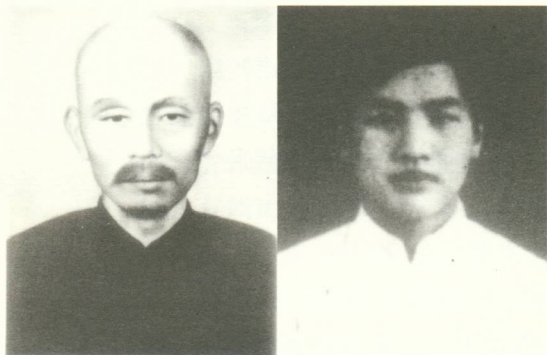
在胶州路、长寿路口的南面，胶州路959弄1号长久大厦后面，那里曾是沪西共舞台（又称共和大戏院）的旧址。1932年7月17日江苏省反帝代表大会在沪西共舞台召开，其时有88位代表被逮捕。其中有13人被判死刑（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26人被判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其余的除了交保释放9人之外，大部分被判6年以

下徒刑。这史称为“共舞台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被捕人数最多的两个大案之一（另一个大案在1930年，被捕108人）。

沪西共舞台之地，原来南侧是大夏大学校舍，西侧是大沟浜及难民临时搭建的草棚集居地。1930年金友发依仗日本人势力，在此强行赶走难民，撤除草棚，

开设剧场。剧场设施简陋，上面以芦席作顶，后台有演员化妆室兼休息室，观众席为木板长凳，可容200多人。此为沪西地区第一个剧场，专邀淮剧团演出古典淮剧。1938年，该剧场毁于大火，第二年原业主与人合资在原址上重建砖木结构的新剧场，占地面积扩大2倍，沿用原名。建国后，该剧场建筑质量低劣，1966年被列为危房拆除。1967年由房管部门在此建成砖木结构两层楼房6幢，曾为胶州路967弄内的居民住宅。以后拆迁，成为现在的高楼大厦。

1932年5月，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各界民众掀起一个反对停战协定的热潮。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反帝大同盟、



沪西共舞台事件肖万才(左)、曹顺标(右)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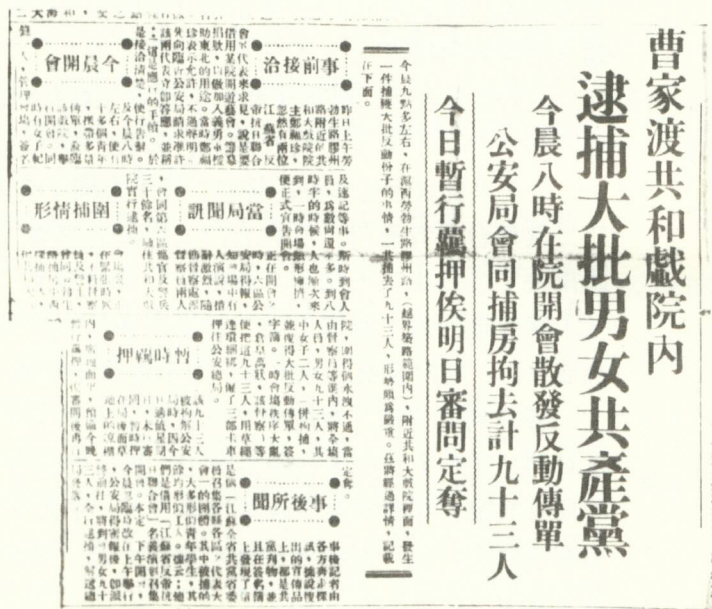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等几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领导上海人民抗日斗争。

6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掀起新的反帝斗争高潮的指示，决定进一步扩大和统一全省反帝大同盟，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作准备，并定于7月间召开全省范围的代表大会。6月24日，召开筹备会议，正式成立筹备处。7月2日，筹备处在《申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定于七月十五日召集江苏省代表大会，八月一日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并希望“各地民众团体届时推派代表出席大会，共商国是，群策进行为要”。

当时反动当局加紧镇压抗日运动，6月11日市公安局还发布特别戒严令。但推行“左”倾的领导完全不顾严峻局势，在第一号通告中不仅公开两次会议的时间，而且亮出筹备处的地址：上海云南路（今云南中路）会乐里三弄279号。在

“共舞台案”中被捕的幸存者顾卓新、温济泽等回忆说，“这就使国民党当局能够有准备地来对付我们。这种‘左’倾错误，是导致共舞台集会遭到破坏和大批同志被捕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租借会场遇到困难，全省代表大会的日期推迟到7月17日。筹备处工作人员曹均（曹顺标，原名曹仁飙）与戏院老板商定，会址安排在沪西共舞台。虽然这个会址没有公布，但开会事还是被



沪西共舞台事件的报道

国民党特务察觉到了。

7月17日清晨，温济泽、曹均等到共舞台时，还有几个伙计在戏台上睡觉，曹均把带来的纸包（里面是有关文件）收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唤醒伙计。这时，其他工作人员和代表陆续来了。温济泽等人却感到很不安，因为在来的路上，特别是戏院的附近，已经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而且逐渐增多，有的已混进会场。

温济泽、曹均急忙找到大会负责人，温济泽说，“现在已经很危险，不如赶快疏散，另外找到安全地点再开。”负责人说，“不开也不行了。”“那怎么办？”“派三个代表到附近公安局，请他们保护我们开会。”负责人说完后，大家就推选出3个代表：武翰章（暨南大学代表，现名武少文），周正余（中国公学代表，现名周毅），刘志超（中国公学代表）。

3个代表去后，温济泽和大会负责人就在戏院门口等候、观察。等了好一会，不见3个代表回来，却有三辆大卡车飞驰而来，车停了，跳下来的是手持步枪的警察，马上包围了会场。

共舞台只有前门，没有后门，后院有围墙。有几个代表翻围墙跑出去了。码头工人陈荣（蔡疾呼）身材高大，就蹲在墙边，让其他人踩在他的肩上翻墙出去。温济泽和他相互推让，都想让对方先翻墙出去，这时警察已冲进来，用手枪对准他俩，将他俩抓回戏院。

警察到处搜捕，戏院里有反抗的，有打起来的，有向警察宣传抗日的，还有个女记者与警察辩论。被抓到的有88人（此外，被抓的还有戏院主郑福珍及该院茶房等5人，不久交保释放），每两人被用麻绳绑在一起，温济泽和曹均绑在一起，随后被抓的人都被押往市公安局。

7月18日，《申报》就刊登题为“胶州路共和戏院内大批青年被捕”的报道。7月22日《中央日报》也刊登题为“沪被捕共犯”的报道。当时正在积极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蔡元培受人之托设法营救这些青年，7月23日他以中国公学董事长的身份致函给淞沪警备司令，“前在劳勃生路共和大戏院开会之学生，已由市公安局拘押并转解贵司令部在案。其中有刘志超、李季俊、钟策、张钟、周正余、林作友、罗永福、叶元焕、徐淮平等九人，均系中国公学

学生，未知有否犯罪行为？倘审问之后，该生等尚无显著不端情事，可否准予交保释放？”但被拒绝，理由为“案情重大，无权处理。”

经过审讯，温济泽等人于7月29日晚上被押送到南京军政部军法司，又经过审讯，再被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做最后的审讯和判决。

在南京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温济泽等人被换上更重的脚镣，关进号子（囚室）。每个号子里都架着双层床，上下通铺，两层紧挨着睡十几人。地上放一个马桶，就没有多少可以走动的空间。正值酷暑，连墙壁都被太阳晒得发烫，号子里热得像个火炉。马桶臭气四溢，使人呼吸都困难，而且蚊蝇飞舞，臭虫乱爬，身上汗粘粘，难以入眠。

温济泽等大部分同志在法庭上立场坚定，斗争勇敢，在遭受吊打、老虎凳等酷刑时，始终坚贞不屈。在多次审讯中，大家的口供基本一致，都说是看到海报，共舞台戏院义演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就去捐款看戏，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审讯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插手，从上海调来3个叛徒，当庭指认出一些人。同时，同案88人中有4人叛变，供出召开大会的一些秘密，出卖了他们认识和不认识但听说过的一些同志，因此，又有7名同志在上海被捕，使此案人数达到95人。

审讯在9月中旬结束，27日判决，有13人被判处死刑。

1932年10月1日清晨，看守所里杀气腾腾，看守班长打开号子门上的大铁锁，大声地叫着一个一个被判处死刑同志的名字。

第一个是肖万才（肖志义），江苏阜宁人。在原来被捕的88人中他没有他，只有他的女儿王小宝（被捕时的化名，现名肖明）。由于叛徒出卖，他与妻子、儿子都被捕。他的一家是一个秘密联络站，肖万才是上海南洋肥皂厂党支部书记、中共闸北民众反日救国会分会发行部长。

他们一家四口同堂审讯。王小宝是共青团闸北区委妇女部长，为了不牵连父母、哥哥，坚决说不认识他们。肖万才也说不认识王小宝，把叛徒供出他一家的情况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他是同案临刑前走在第一个的勇士。他那被晒黑的脸上布满皱纹，显露出威武不



沪西共舞
台幸存者
座谈

屈的神态，迈着从容镇定的步子走向刑场。

肖万才的女儿王小宝原被判处死刑，因年龄未滿 16 岁，减为 18 年有期徒刑。他的儿子被判 12 年有期徒刑。他的妻子双目失明，曾帮助丈夫做过许多工作，因身份未被暴露，被交保释放。她曾经到监狱探望过儿女，此后

下落不明。

第二个上刑场的是曹均，是 13 人中最年轻的，19 岁，浙江萧山人。他是筹备两个大会的时候任“民联”青年部部长温济泽的联系人，因被叛徒出卖，判处死刑。在监狱里，曹均与温济泽被关在一个号子里，合盖一床薄被子（是曹均的哥哥送进来的）。他俩常在被窝里悄悄地谈话，或者用手指在对方手心里写几个字，这样进行交谈。曹均说，“我准备牺牲，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的哥哥，要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

后面依此走向刑场的是许清如、杨小二子、徐阿三（潘阿二）、许金标（徐子明）、崔阿二（崔四）、钟明友、邱文知（邱文治）、陈山（曾太功）、陈士生（陈纪盛）、王得盛（王明国）、柳日均（刘栋臣）。

其中陈山是沪西区委宣传部干事、内外棉三厂党支部书记，他是代表沪西区委，并带领内外棉三厂、六厂和七厂的代表参加大会的。他要难友带个口信给妻子，要她不要难过，把孩子带大，长大了也要干革命。

邱文知，被叛徒出卖，说他是在沪西区委“特科”工作，在罢工时打过包工头。他在法庭上大骂无耻叛徒，被吊打得遍体伤痕。临刑前，他把随身的东西送给难友，自己只穿着背心和短裤。他的两条腿被打伤了，但是走向刑场时，坚持昂首挺胸，面带微笑。

王得盛，曾在上海举行援助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示威游行时担任总指挥，临刑前他坚定地对难友说，“被捕杀头，这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一批人倒下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

13位同志在雨花台英勇就义，执刑的看守回来对在押的人说，“这些人真有种！个个不怕死。有的身上中了好几枪，还在喊口号，还在唱什么‘打得落花流水’（《国际歌》）。”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实行合作，经过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谈判，被关押的70名同志除陈福生（陈志正）3个月前病死在监狱里，其余都先后被释放，纷纷奔向抗日战场。

1992年9月19日，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和长寿路街道在燎原电影院隆重举行“沪西共舞台事件13烈士就义60周年纪念大会”，当年幸存者顾卓新、武少文、温济泽和肖明等出席大会。

顾卓新，被捕时化名陈广和，被判处6年，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杨超，被捕时化名李季俊，被判处15年，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温济泽，被捕时化名温谅文，被判处12年，曾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兼研究院院长等职。他离休后，继续完成《革命烈士传》、《瞿秋白文集》14卷，出版多种著作；武少文，被捕时名为武翰章，被判处无期徒刑，曾任农业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于岩，被捕时名为王惕之，被判处10年，离休后任辽宁省老年学会会长等职；周毅，被捕时名为周正余，被判处15年，离休后返回福州郊区洪山乡老家。

1994年11月，温济泽曾到洪山去看望周毅，两人相见，感慨万千。周毅后赋长诗，题为《晤谅文同志有感》，开头写到，“一别六十载，青丝变白头；相见疑梦寐，往事话不休。”诗中歌颂邓小平指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向，最后几句，“坚持此航向，富强又何愁？个人遭坎坷，小事不足惆。”

爆发反日罢工 各方大力援助

——记刘少奇与沪西“大锅饭运动”

上世纪 90 年代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曾在沪西工人文化宫举办《沪西共产党人奋斗的足迹》大型图片展览。为了寻觅 30 年代刘少奇领导沪西“大锅饭运动”证物，区委党史研究室在上海档案馆内的一处阳台上发现一口当时曾用过的大铁锅，但无法借回，只得拍成照片，在展览会上展示。



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
领导沪西反日大罢工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沪西爆发规模空前的反日大罢工。沪西是上海日商纱厂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全市 34 家日商纱厂 6 万余工人有一半在沪西。工人们长期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斗争精神。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亲自为工人反日会起草了章程，号召上海工人阶级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前线，各厂工人成立日货检查队，没收日货；封锁对日本军队、机关及资本家的一切供给；设法截断对于日本军队、机关及资本家的水电供给。

1 月 28 日下午，沪西日商纺织同业会获悉日军将于当夜进攻上海，立即宣布即日起关厂停业。日军占据工厂，把工人全部赶出工厂和工房，被迫离厂的工人纷纷加入同兴、喜和为核心的罢工行列。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号召举行总同盟罢工。日军占领上海后，在中共沪西区委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沪西区罢委会和各日商纱厂罢委会，组织和领导沪西工人反日罢工斗争，把原先取消月赏和反对关厂停工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日军占领上海的抗日总同盟罢工。

刘少奇十分关心沪西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认为“像这样数万

人的大规模罢工、停业斗争，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是多年未有的，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工人进行一次政治训练，让工人群众经受一次锻炼，也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

刘少奇、罗登贤、张浩、饶漱石、帅孟奇等中央和省委领导经常到沪西地区给罢委会同志分析形势和指导工作。为了使沪西日商纱厂抗日总同盟罢工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省委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发动各抗日团体和群众组织声援沪西工人的斗争。民众反日团体和左联、社联、剧联以及大中学联等给罢工工人送去慰问金、食品、衣被等御寒用品，还派出人员为罢工工人讲解抗日形势，开办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排练抗日话剧，激发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2月中旬，刘少奇主持成立的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沪西罢工工人纷纷加入，并成为工人反日会的骨干力量，使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沪西罢工工人组织义勇军活跃在抗日前线，积极地帮助十九路军运输枪炮弹药、挖战壕、筑工事和抢救伤员。他们还组织纠察队，维持沪西秩序，防止敌人破坏。他们的宣传队成为宣讲抗日形势的鼓动队，组织抗日集会和游行示威，反日气氛弥漫了沪西地区，汉奸和国民党势力不敢涉足，一时有“赤色沪西”之称。

沪西工人反日罢工斗争条件极为艰苦，原来仅有的微薄工资也失去了，难以维持生活。3万余罢工工人及其家属近10万人的吃饭成了重大问题。

罢工初期，沪西区工人斗争委员会空喊武装斗争、武装工人，热衷于飞行集会，忽视群众的生活问题和倾向。刘少奇及时纠正了



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场景



关于沪西工人反日大罢工的报道

沪西区罢委会的极左做法，要求高度重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沪西区罢委会根据刘少奇的意见，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组织罢工工人向社会局、地方维持会要求发放救济米，经过斗争迫使社会局和地方维持会拿出救济款大洋 3000 元和救济米 600 担。同时，组织宣传队、募捐队，走向街

头，开展反日罢工宣传和募捐活动。

宋庆龄密切关注沪西反日斗争，获悉数万工人吃饭、住房十分困难，亲自筹措 2 万元，将支票交给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请他们转交沪西罢委会，并转达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和敬意。但是，党内有人不同意接受宋庆龄的捐款。刘少奇获悉后，坚决阻止，认为宋庆龄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为了声援上海工人的抗日行动而捐款，表现了爱国之心，也是对上海工人群众寄予厚望。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应该接受这笔捐款。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接受刘少奇的意见，收下宋庆龄的捐款。

2 月 14 日，刘少奇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同志鉴于上海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形势，要把工人运动看作进攻性，将罢工变成总同盟的武装暴动。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目前举行武装暴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条件不成熟。武装暴动与支持第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现在上海工人既没有武装，工人的力量也没有成熟到可以举行武装暴动的那一步。

3 月 1 日，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十九路军孤立无援，被迫撤出市区，沪西反日大罢工被推向斗争前沿，沪西成为上海人民反日斗争的中心。中外反动派调动武装军警，严密监视和镇压工人反日斗争，派出工头挨家挨户诱骗工人复工，企图先开一厂或部分车间，以动摇整个罢工阵线。他们又从大批难民和失业工人中招收新工，挑拨工人群众内部的团结。内外棉各日商发出通告，“如到时工人再

不上工,将另找新工”,再次分化工人,部分工人被迫进厂复工。

沪西罢委会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一方面组织力量进厂,向复工工人宣传和散发传单,揭露厂方复工阴谋,并派出工人纠察队警告和打击工贼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在英华里、梅芳里、富来里等罢工工人聚居的地方开办大锅饭,免费供应罢工伙食,抑制资方引诱工人复工,时称“大锅饭运动”。这一举措发挥了重要作用,罢工工人情绪逐步稳定,内外棉各厂复工工人开始减少,工人们唱起了反日罢工歌:“反日罢工上海滩,罢下工人二十万,二十万人一条心,一心来吃大锅饭,要国民党撤兵很容易,要你工人进厂复工难上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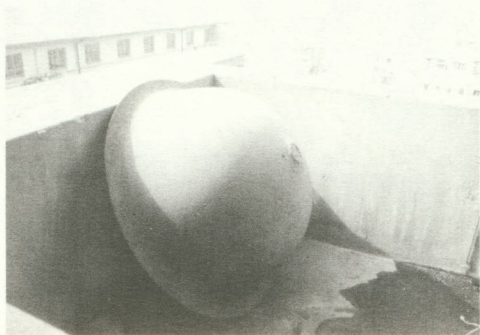
刘少奇正确领导沪西反日大罢工斗争,却受到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3月14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负责人之一卢福坦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会议批判刘少奇,指责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刘少奇领导罢工是“取消派”的方针。中央认为,工人斗争应当采取进攻战略,要把沪西大罢工搞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

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长职务,调到上海工联任党团书记,改派康生到沪西检查并指导工作,迫使沪西罢工运动转向,“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和传单在罢工工人中流传,为租界巡捕房镇压沪西罢工找到借口。

4月下旬,资方勾结国民党政府和租界捕房,派出警力,全力破坏“大锅饭运动”,没收大锅饭餐具,捣毁炉灶,封闭各级罢委会,逮捕罢工领袖,巡捕、包探进驻各厂监视工人动态。但是,各厂仍有相当多的工人坚持罢工,直到5月初结束,历时4个月。

是年冬,刘少奇被调离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沪西大锅饭运动的铁锅
(藏上海档案馆)



几度迁址易名 纪念抗日英雄

——晋元中学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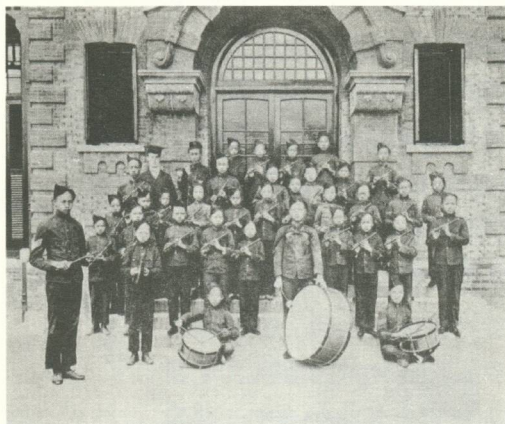
解放前，上海租界设立的华童公学共有四所：法租界公董局设立的中法中学，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的格致中学、育才中学和晋元中学。如今晋元高级中学新校址在普陀区新村路，成为区里优秀中学代表之一，校园内建有谢晋元的全身雕像，经常举行有关纪念活动。

华童公学是沪西一所名校，1904年应英租界工部局华人纳税会要求，由英国人创办，设在北火车站天目北路南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华童公学的师生积极响应，罢课一天，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925年5月30日发生五卅惨案，第二天，华童公学的学生

罢课，投入全市反帝示威洪流中。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后军阀连年混战，局势动荡，各地富商巨贾纷纷来沪，躲进租界。租界当局为了自身利益，让万国商团和英国驻军先后进驻华童公学，以示防范，学校被迫暂时停课。租界情况稳定后，英军的军乐队士兵培训华童公学学生，成立军乐笛子队。

抗日战争之前，学校人数渐增，乃迁至中州路汉壁礼西童公学校址，能容纳700余人，但操场面积不大，学校搞体育活动时，均借用虹口公园跑道和球场。抗战时期，英国驻军下旗撤回本国，虹口则被日军控制，并未在该校驻军。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再此发动淞沪战争，虹口沦为战区，华童公学校舍被炮弹击中，房屋全毁。学校不得不由苏州河北



华童公学
军乐队合影
(19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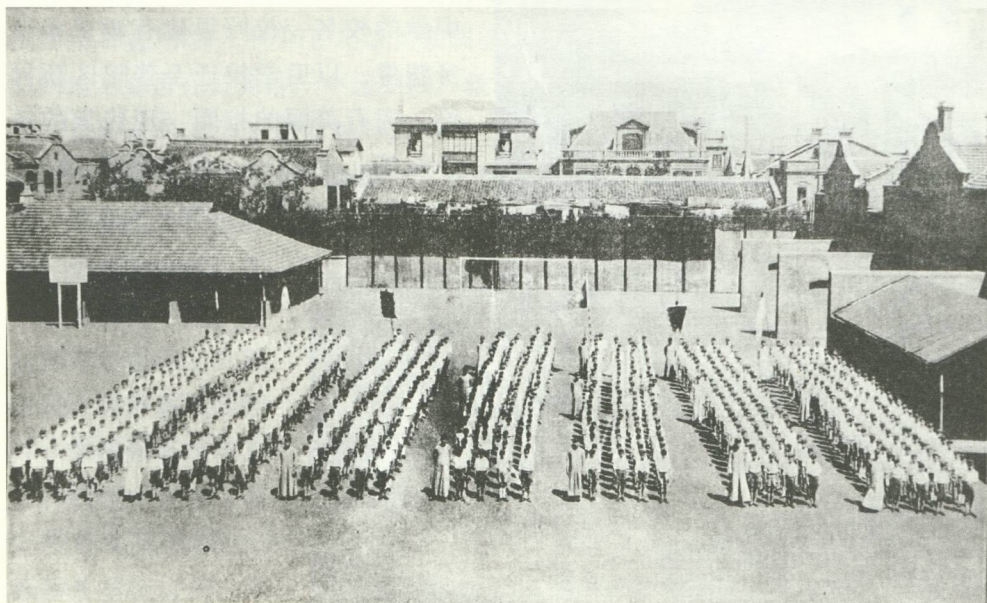
迁到河南，先借四川路青年会上课，继而在南京路市政所上课，之后几经迁移，最终将校址定在马白路（今新会路25号），这里与新加坡路（现余姚路）谢晋元“孤军营”相近。

1941年4月，谢晋元被日伪收买的叛兵杀害，出殡队伍蜿蜒数里，华童公学以军乐前导，至为壮观。1941年8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英籍校长和教务长于是被关进杨树浦集中营，代理校长为林步基。日方派来两名日籍教师教日语，便于监视在校教工的活动。1944年汪伪政府接收该校，改名为“上海市立模范中学”。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为纪念四行仓库孤军作战的谢晋元团长，国民党教育局将华童公学改为“上海市立晋元中学”，由上海市教育局派来无党无派的金通尹任校长。

国共谈判破裂后，金通尹校长被调走，由国民党党员蒋建白任校长。1948年冬，蒋建白去台湾，暂由葛士表教导主任、乐秀荣训育主任、钟贵扬总务主任负责管理学校。

1949年上海解放，军管会派姚湘涛任校长，蓝尤青任教导主任，



华童公学学生在操场集合的情景

接管华童公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成立校务委员会，教师代表有黄礼芳、肖朗、胡先本等人。1950年，姚湘涛回南洋女子中学任校长，上海市教育局派叶克平任校长。后来，学生人数由750人猛增至2000余人，班级由17个增至51个，教室不够用，只好分为上午、下午两部制上课。1957年普陀区东新路314号新校址落成后，才改变局面。新学校改名为陕北中学，全体教



1934年华童公学校舍

现已改成
长寿社区
学校的华
童公学



工和高中学生迁往新址；初中学生留在新会路原址，后由武宁初级中学接收，改名新会中学。当时，陕北中学仅有两幢大楼和36个教室，并无操场，后来建成的操场由全校师生勤工俭学劳动铺填而成的。

1984年6月，学校恢复了晋元中学的校名，校园里建有谢晋元半身塑像。以后学校迁至普陀区新村路，拥有美丽的校园、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涌现出一批批优秀师生，学校多次获得各种殊荣。

扩大统一战线 掀起罢工浪潮

——记 1936 年沪西、沪东纱厂大罢工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八项抗日主张的第三款：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是指 1936 年 11 月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全国救国会 7 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时称“七君子”。他们被捕的重要“罪行”是鼓动工人罢工，危害民国。“工人罢工”，指 1936 年沪西、沪东反日大罢工。

1936 年，日本资本家为了扩充其经济实力，抢占市场、排挤打击华商纱厂，加紧对工人的压榨。当时全市纱厂中近一半是日商纱厂，雇佣工人 5 万左右。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最低日工资仅大洋一角多。厂方禁止工人的一切活动，动辄处罚、开除。工人反抗情绪日益增强，不少工人加入救国会、赤色工会等。赤色工会系统的地下党员在日商纱厂中组织纱厂救国会，会员达 3000 余人。

是年 2 月，为了加强对日商纱厂工人斗争的领导，全总白区执行局成立了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纱委），由陈之一、张维桢、韩念龙、周林组成。起初，领导几次罢工都遭到失败。

沪东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上工时，随身携带过去在十九路军服役时身着军装照片，惨遭多名日本人毒打致死。上海工联以夜校工人核心，酝酿发动抗议梅世钧惨案的斗争，遭到残

抗日救国
七君子在
苏州监狱
看书写作
坚持斗争
的情形





日商纱厂联合罢工时，女工们退出工厂的情形

酷镇压，工人运动受挫。3月，纱委组织日商裕丰等5个纱厂工人坐厂罢工，大批工人被开除，罢工失败。5月，全总白区执行局又多次要求纱委组织飞行集会，也未成功。

纱委吸取经验教训，认为这样干行不通。这时，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传到上海，强调必须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暂时放

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城市中设法联合一切工人的团体与各厂工人，建立工人的抗日救国会”。

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胡瑞英调任沪东烟厂区委书记后，1935年11月8日，她率先发动日商纱厂上海四厂罢工，当天沪东7个厂1.5万工人相继罢工。次日，沪东其他工厂亦全部罢工，爆发了1936年日商纱厂大罢工。事前，工人未领到当月工资，罢工后生活极度困难。罢工指挥部决定组织已发薪后的沪西工人再次举行大罢工。11月16日，内外棉十七、十八厂率先罢工，17日丰田纱厂亦开始罢工，波及整个沪西的日商纱厂。气急败坏的日本资本家请调日本海军陆战队包围厂区，用机枪封锁厂门。工人则占领厂内写字间，将厂内日本人全部包围，逼使厂方撤退海军陆战队。工人随即冲出厂门，通知新厂工人一致行动，新厂工人立即关车罢工。早晨，英租界巡捕房竟然派两辆装甲车，越界闯入罢工工人集结的中国地界进行威胁，并抓了两个罢工工人。工人一拥而上，围住装甲车。后经中国警察局调解，英国巡捕被迫释放工人。

内外棉纱厂、丰田新老两厂5000工人的罢工，带动了沪西其他日商纱厂的罢工。19日起，已复工的沪东工人因资方未履行条件，再度罢工，形成全市范围的日商纱厂大罢工，参加罢工工人人数达4万余人。

日商纱厂大罢工声势猛烈，日商哀叹“纱业前途几将动摇”，直接影响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仅沪西丰田纱厂 17 日、18 日两天罢工，日商损失 40 万元以上。日本朝野为之震惊，日本当局派出专员抵沪，调查罢工情况，并恳求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和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出面调解。

工人罢工指挥部领导人审时度势，认为可以利用合法斗争形式，与国民党工会等建立统一战线，与日商谈判，提出以释放被捕工人和罢工工人提出的 5 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后经杜月笙调解，11 月 25 日达成 7 条协议：一、工资增加 5%；二、每月赏工改为奖励制，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工资；三、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四、不得打骂工人；五、每天工作 12 小时，星期日做 14 小时，其多做的 2 小时工作，另加工资；六、吃饭停工 30 分钟；七、各厂工人即日复工。日方基本同意工人所提的条件，27 日各纱厂结束持续 20 天的大罢工，斗争胜利结束。

沪西、沪东反日大罢工是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爆发，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才取得的胜利。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募捐和向罢工工人发放募捐款，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发表《为日纱厂华工人联合罢工宣言》，组织大夏大学等院校学生到罢工工厂慰问，赠送食品。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上海社会名流坚决支持工人大罢工，他们纷纷起来发表演说，控诉日本资本家的残暴，号召同胞援助日商纱厂大罢工，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

这次反日大罢工是大革命失败后沪西、沪东纱厂工人斗争规模最大并取得成功的一次罢工，打破了近年来罢工斗争屡遭失败的沉闷局面，在全国工人运动中产生积极影响。

七君子出狱后与马相伯、杜重远合影



投入抗日洪流 培育女工干部

——记沪西三和里女工夜校

1928年，在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邓裕志等爱国进步人士主持下，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开办女工夜校，1930年正式定名为女青年会女工夜校。



女工夜校教师给女工上课，在黑板上书“做工读书、救中国、打倒日本”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19世纪末从美国传入中国的国际性基督教妇女团体。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创办的女工夜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汇聚了各方进步力量，促使进入该校学习的女工逐渐觉

醒、团结互助，涌现了一批有觉悟、有文化、有能力的女工干部。

抗战爆发后，女工夜校师生投入抗日洪流。沪西小沙渡路三和里（今西康路910弄21—23号）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最有规模的一个女工夜校。刚从沪江大学毕业的钟韶琴到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任干事，与邓裕志一起筹划在纱厂、丝厂、袜厂集中的沪西设立一个完全由女青年会自办的劳工服务处，熟悉女工状况，以求“教育和其他方法适应工人需求，并训练社会服务人才”。

其间，上海大批工人失业，在上海女青年会等团体帮助下，500余名失业工人经介绍进厂就业，女工夜校声誉鹊起，产生很大影响，许多女工纷纷到三和里女工夜校报名入学。鉴于要求入学的女工激

增，女青年会劳工部又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裕庆里、曹家渡康福里和菜市路（今顺昌路）办起了同样性质的女工夜校，学生总共有 600 余人。三和里女工夜校也成为全国各地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示范点。

女工夜校学制二年，分初级、高级两班。初级班教《千字课》，要求能识字写字。高级班有历史、算术、尺牍等课程，毕业时相当于小学程度。1933 年增设了特级班，为此，协会劳工部与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沪江大学沪东公社、基督教协进会合作组织工人教育设计委员会，请青年会曹亮和沪江大学教授钱振亚等编辑出版《经济学》、《经济史》、《工会运动概况》、《一个女工和一个女大学生的通信》、《怎样读报》等女工教育辅导读物。这套读物文字通俗易懂，内容生动，切合实际，深受女工同学喜爱。由于初级班和高级班学生程度参差不齐，1934 年，劳工部决定在各校增设中级班，学制由二年改为三年。

女工夜校教师有的来自教联，有的来自陶行知办的山海工学团，有的从中学出来的，也有少数大学生，还有从特级班培养出来的小先生，充当初级班教师。她们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认真负责，经常深入女工同学家庭及工厂车间，在接触中，自己也不断受到教育。

女工夜校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学生成立友光团，组织辩论、讲故事、演剧、唱歌，出版《友光通讯》等活动，当时不少著名进步的文艺和学术界人士都前往辅导。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国际性的社会妇女团体，国外人士常常通过女青年会到女工夜校观察了解上海妇女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况。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及《中国呼声》主编葛贵思夫人都曾到三和里夜校参观，与女工同学座谈，并将上海女工的情况向国外报道。抗战前夕，有几位外国朋友到夜校参观，同学们正在谈论时局，他们原以为这些白天在机器旁沉默不语、劳累不堪的女工同学不过是思想单纯、不懂国事的劳动者，听到同学们说：“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徐明清，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教师、沪西教育工作者联盟负责人



是个小国，尚能抵御意大利的侵略，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不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朋友很惊讶，赞叹说：“女工夜校学生有如此高的认识水平，真不简单。”

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前夕，女工夜校师生已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崭露头角。1935年2月，福新烟厂工人罢工，三和里女工夜校师生在工厂墙外攀搭人梯，将募捐得来的大饼、馒头、面包送到罢工工人手中。

1935年12月21日，邓裕志参与何香凝、史良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女工夜校师生们参加成立大会。她们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山河”的旗帜，高唱《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会后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同学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4万余人反日大罢工，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师生积极募捐，把救济款转交给国难教育社沪西分社支部书记吴新稼，分发给因罢工而生活困难的工人。沪东罢工工人的救济款，也通过女工夜校同学分发，帮助全市反日罢工最后取得了胜利。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女工夜校师生积极参加社会各界救亡组织的难民收容所，担任宣传、卫生、扫盲和管理的工作，有的到医院慰问伤兵，进行抗日宣传和护理工作。

1938年，江苏省委的工委成立夜校工作委员会，加强对劳工夜校包括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领导。1940年“工委”又成立女工委员会，派李淑英负责领导女工集中的沪西工厂和女工夜校工作。女工在夜校接受教育，涌现出一批批积极分子。党员教师及时将她们的情况，经夜校地下党组织转到各地工厂党组织，然后发展入党，许多女工学生被培养成为基层工厂工人运动的骨干。统益纱厂女工汤桂芬在夜校老师的教育和培养下，日后成为上海有影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党组织领导下，女工夜校成为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力量的教育基地。

抗战时期，三和里女工夜校是唯一坚持办学的学校。日本投降后，三和里女工夜校借筹备中的胶州路实验民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千人赴会，许多原是女工夜校的同学或经她们相约而来的工厂

小姐妹们强烈要求读书。劳工部主任干事王知津、干事邢泽与返沪的邓裕志竭尽全力，筹得一笔经费，依靠夜校老师钱琴、黄纫秋的帮助，先后定下了曹家渡白利南路（今长寿支路）仁和里和其他几处房子，新办5所女工夜校，学生增至千余人。



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女工们正在为前线抗日将士赶制被服

党组织进一步关注女工同学的成长，仅周琪老师一人在元丰毛纺厂就发展了8名同学入党，壮大了该厂党组织的力量。

1948年1月，沪西振丰、元丰、寅丰等8家毛纺织厂工人为争取年终奖开展饿工斗争，资方勾结警方进行镇压，逮捕部分工会代表，许多工人积极分子被开除。夜校师生到各厂慰问，对开除的夜校同学提供物资帮助。2月，发生申九“二二”惨案，女工夜校开会，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师生为死难烈士佩戴黑纱、募捐，支援被打伤、开除的工人。罢工被镇压后，申九厂校亦被停办，该校有一批女工同学转到三和里女工夜校继续学习。3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系统个别组织遭破坏，200余人被捕。许多女工同学亦因此被捕。她们在狱中坚持斗争，顽强不屈，坚持到上海解放。

女工夜校的历史功绩，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表彰。

沪西地下“江姐” 埋名慷慨就义

——记女工夜校教师钱琴

钱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和里女工夜校的一位普通老师，又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秘密地下党员。



在台湾牺牲的钱琴烈士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在频繁的戒严、封锁、灯火管制、断电的困苦环境中，钱琴和其他教师依然不讲报酬，坚持将女工夜校办下去，使三和里女工夜校成为黑暗上海的一盏明灯。

1944年7月，王知津从沪江大学毕业，经雷洁琼教授介绍，进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任劳工部主任干事，分工负责全市女工夜校工作。小沙渡路（西康路）三和里是上海规模最大的一个女工夜校，钱琴是夜校老师，领导和教师尊敬她、女工学生喜爱她，而反动当局则十分憎恨她。

抗战胜利后，女工夜校师生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作坚决斗争。1946年秋天，钱琴突然向王知津提出辞职，说是外祖母病重，得回家乡常州。王知津同钱老师相处很好，从没见过她为私事请过一天假。王知津怎么说也留不住，觉得有点奇怪。第二天，钱琴悄悄地离开三和里女工夜校，没有与同学告别，从此就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其实，王知津也是地下党员，由于单线联系，并不知道钱琴的真实身份。全国解放后，王知津等人到处打听钱琴的下落，经过很长的时间，才知她已在台湾牺牲。

原中共上海市委工委书记张祺回



钱琴与弟弟的合影

忆说,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台湾过去长期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需要有一个新的文化开发和启蒙,台湾民众也成立了许多新社团工会组织。其中有一个邮电工会,要求上海地下党派有工人运动经验的同志到台湾开展工人运动。

经上海地下党市委领导研究,决定派遣沪西干部计淑人和钱琴。计淑人是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具有领导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钱琴在女工夜校工作出色,已被国民党当局列为重点监视的对象。

钱琴到台湾后,化名为钱静芝,计淑人化名为计梅真。

原台湾邮电工人运动领导人陆象贤回忆说,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实行限制组织工会的政策,凡是没有成立全国性产业的工厂、矿山、企业一律不准在台湾省组织工会。1946年5月,陆象贤等人开始筹备台湾省邮务工会,8月正式成立,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把全省6千多邮电职工统一组织起来。陆象贤当选为该会的理事长,兼任台湾省邮工补习学校校长。

工会成立后,陆象贤被派到上海,向全国邮务总工会报告台湾省邮务工会成立,请予备案,并要求对台湾籍邮电工人争取归班,实行同工同酬,给予支持。同时,陆象贤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报告在台湾开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成立台湾省邮务工会的情况,要求选派对办工人补习学校有经验的同志到台湾省邮工补习学校协助工作。

上海地下党组织选派计梅真、钱静芝与陆象贤见面,随同到台北。陆象贤以台湾省邮工补习学校校长的名义,聘请她俩为教员。1946年9月,她俩到台北就职后,面对台湾籍邮电职工党员,认真地传授国语和文化知识,关心学员的生活,她们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和爱戴。

1947年2月,台湾2千多名邮电工人到台北邮电管理局请愿,遭到国民党卫兵开枪镇压,造成死伤多名的“二·二八”惨案。此后,台湾籍邮电

后任中共普陀区委副书记的王知津(左一)与钱琴(右一)等女工夜校的教师合影





纪念台湾邮电工人运动
先驱的书——《魂系台北》

职工同广大台湾同胞一样,对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计梅真、钱静芝针对广大邮电职工的思想情绪,鼓励他们加强团结,积极参加工会活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待遇。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发展进步势力。

1949年3月25日,全省各地邮务工会台湾籍会员为争取归班,各推派代表齐集台北,举行争取归班大会。经计梅真、钱静芝积极发动,于3月26日,集合近2千人至省政府游行请愿。在这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的形势下,台湾省当局不得不对解决台湾籍邮电职工归班问题予以重视。这次台湾邮电工人的空前壮举,在台湾省工人运动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由于计梅真、钱静芝在台北邮电工人中具有崇高的威信,国民党当局对她们又恨又怕,终于下了毒手。1950年10月,将她俩在台北杀害。

陆象贤沉痛地说:“她们的悲壮牺牲,使台北邮电工人失去了两位敬爱的老师和群众领袖,是台湾省邮电工人运动的巨大损失。”

2011年1月,《环球时报》以“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为标题,揭示了上世纪50年代,台湾军方对政治犯和中共特工执行枪决后,将遗体交到台北市极乐殡仪馆,供家属认领,没有家属认领者就地火化,无主骨灰暂时存放在“无主纳骨塔”,这是当时戒严时期政治受难人的骨灰存放处,台北第二殡仪馆有一份600多人的迁移名册,希望这条线索成为今后重新寻找烈士的关键。

钱琴的胞弟钱枚多次来上海,寻觅钱琴在上海革命活动的足迹。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革命陈列馆内,已在壮观的烈士群像中,增加了钱琴的照片。

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前夕,原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师生编写了回忆录《巾帼摇篮》,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参与编辑。书中有多篇缅怀钱琴的文章,人们都尊称钱琴是沪西的“江姐”。

原中共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陈一鸣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本书所征集到亲历、亲闻的感人史料,读者们可以发现,既属于上海的工人教育和工人运动史,又是上海的妇女教育和妇女运动史,既是爱国民主人士的奋斗统一战线史,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史。”

创作革命歌曲 唤起民众激情

——访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波

上海在筹建国歌广场时，杨浦区等有关方面需要聂耳、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相关情况，正值云南电视台要拍摄采访革命文化老人孟波忆聂耳（祖籍云南玉溪，生于昆明）的专题片，鉴于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同孟老比较熟悉，于是相约于上海市人大培训中心孟老的工作室，采访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波，了解孟老上世纪30年代在沪西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孟波回忆当年作曲教歌的情况

耄耋之年的孟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眼不花耳不聋，他说：“我今年94岁，1935年参加革命，主要搞革命文艺活动。大约1935年到1937年，我们就到沪西和沪东宣传抗日，那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中华民族到了要做亡国奴的最危急时刻。沪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自鸣钟、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三和里和劳勃生路（今长寿路）都有女工夜校，沪西纱厂多，参加夜校的大多是纱厂女工，她们是内外棉、日华、同兴的（均为日本纱厂），生活非常苦，她们跟老师讲怎么受苦受难，一天做十几个小时的工，还吃不饱饭，还要受欺负。老师麦新根据同学们的自述编了歌词，我谱了曲，叫《工人自叹》歌，总共有7段词，唱出了女工三班倒，一个铺（双层）睡6人，挨打受骂吃尽苦头的悲惨情景，女工们一面唱一面掉眼泪。我们到沪西沪东教唱歌也受教育，包括冼星海、聂耳、麦新等音乐家。

冼星海 1930 年从法国回到上海，他老师是法国印象派大师杜卡。他接触工人农民以后说，我们的音乐找到了出路，应该为劳苦人民，为抗日救亡服务。他写出了《救国军歌》、《太行山上》、《拉力歌》等抗日和歌颂劳苦大众的歌曲，还有著名的《黄河大合唱》。有人说他写《黄河大合唱》没到过黄河，其实他 1936 年就到过，深受黄河船夫号子的影响，船夫在黄河惊涛骇浪中搏斗的情景，他是有体会的。”

谈到女工夜校时，孟老从书桌上拿起一页纸，那是他接到预约电话后默写的当年创作的《工人自叹》的词曲，那是用上海话唱的上海小调，孟老郑重地在词曲后面签了名。

女工夜校总的负责人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她是一位爱国的基督教徒和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工作者，她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工非常同情和关怀，对女工夜校的进步教师也很照顾，凡有教师和学生搞进步活动被捕或受迫害时，她都会通过关系和她的社会地位进行交涉，予以保护。

“抗战爆发前，我们在女工夜校里教唱歌、教戏剧、教文化，还排练短小的白话剧。教的歌曲很多，像《救中国》、《渔光曲》、《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工

人自叹》、《女工歌》、《救亡进行曲》、《开路先锋》等几十首，还有《祖国进行曲》等苏联革命歌曲。陶行知、金仲华、章乃器、罗叔章等知名人士常来女工夜校讲时事；麦新、郁应恺在沪西教唱歌，冼星海也来，有事时由我去担任；陈波儿、徐韬、郑君里、崔嵬等辅导戏剧。顺便说一句，有个叫李云鹤的也教文化和唱歌，就是后来的江青，不久被捕了，怎么出来我就知道了。”

孟老拿起一本当时由他和麦新自编出版的《大众歌声》，翻到《工人自叹》歌，用略带常州口音的上海话，声情并茂地为我们唱了一段：“格能日脚真正过勿落，要想活命

麦新、孟波
编辑出版
的《大众歌
声》



拳头要捏牢；大家一条心，造个新世界，吃着睡觉勿会再苦恼！”“女工夜校的同学们对进步歌曲非常热爱，她们在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后来到夜校，有些还饿着肚子，但只要一开始教歌，她们就会提起精神唱起来，《新女性》、《女工歌》、《工人歌》等歌曲她们唱得非常动人，她们说‘好唱、好懂、好听’，这些歌既是血泪的控诉，也是对旧世界的怒吼，我们教歌的老师也深受感染。”

谈到《义勇军进行曲》时，孟老有些激动，他说聂耳是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创作了《卖报歌》、《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进步歌曲，是我国革命音乐的开拓者。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在百代唱片公司，为田汉、夏衍编写的电影《风云儿女》配的主题歌，孟老说他们当时也绝不会想到它会成为我们新中国的国歌。

“但那时我们在示威游行中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与敌人斗争，确实是悲壮、振奋、热血沸腾！记得我参加在1936年的‘三八’节、‘五卅’、‘九一八’纪念活动，及10月23日为鲁迅送葬等游行中，女工夜校的同学和全市的学生、罢工工人、店员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迎着国民党政府荷枪实弹的军警、水枪的冲击和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呼喊口号，进行抗日宣传，《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此起彼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为便于录像，孟老为我们连续唱了两遍《义勇军进行曲》，抑扬顿挫，一字不差，我们不得不暗暗佩服老人的作曲家功底和记忆力。

“沪西是出了不少地下党领导，女工夜校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妇女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孟老就此打住了话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孟波在文艺界从事地下斗争，以后进入新四军，任新四军抗战剧团团长；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到了延安后，中央调派孟波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解放后曾历任天津、广州、上海等地文化局的领导。

作为沪西“巾帼摇篮”——女工夜校的师生一部分继续留在上

海坚持地下斗争，许多人都奔赴抗战前线或大后方，如被称为沪西红色娘子军的胡瑞英、任秀棠、金敏玉、李亚芬、张定堡、龚琦玮、郑惠珍、李祥梅、柳秀娟、秦秋谷等参加了由胡兰畦任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后来分批去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殷素琴、李雪芙、孔湘桂、魏曼华等参加了歌协国内宣传团及其他抗战团体离开上海，她们又把女工夜校的革命精神和歌声带到了祖国各地，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的战斗。

积极人世救护 弘扬爱国志向

——记玉佛禅寺抗日救护队

普陀区玉佛禅寺以玉得名。原寺建于江湾,后几经迁移。1918年,玉佛寺的主持可成法师募得槟榔路(今安远路170号)地基7000平方米,新建寺庙,历经10年,1928年竣工,佛殿、楼庑、斋厨、浴室等相继落成,并将由缅甸磨琢刻镂的坐、卧玉佛供奉于新寺。因可成法师属禅宗临济宗,故寺改称玉佛禅寺。新寺建筑古朴幽深、飞檐斗拱、殿宇巍峨。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租界的玉佛禅寺已没有往常的香火鼎沸,日军的烧杀抢掠,将禅寺搅得不得安宁。

1937年发生“八·一三”战事,日机对真如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真如寺、暨南大学和百姓民房被彻底炸毁,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量难民从战区涌向沪西等租界,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难民大多是工人、店职员、农民及其家属。租界当局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涌进上海,多达70万人,大量难民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



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赵朴初,曾组织僧侣救护队



中国佛教会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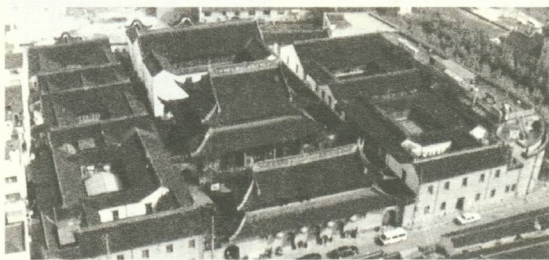
1937年8月14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率先组织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以佛教界和慈善界老前辈许世英任主任,屈映光和黄涵之任副主任,设收容股、给养股等。赵朴初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以仁济善

堂为主要活动场所,开展救济难民的工作。

11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租界内的难民因饥饿、疾病,每天死亡数百人。赵朴初组织部分难民返籍归乡,其余难民则在租界空地上搭建棚舍。至1938年上半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建立200个收容所。上海沦陷后,仍有难民25万,一些临时收容所经合并调整,建立50多个有相当规模的收容所。

面对日军入侵,生灵涂炭,佛教爱国人士在上海“慈联会”的领导下,弘扬佛法积极救世的精神,鼓励佛教界人士投入抗战,决定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紧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区各寺庙派出僧徒青年200人,到上海玉佛寺报到集训。僧侣救护队共分为3个大队,分队长、队副、队员全部是僧侣和佛教徒。下设总务、队务、救护3个组。

坐落于普陀区的玉佛禅寺



队员待遇微薄,总队长尽义务,副队长每月津贴20元,队员8元。队员中三分之一是知识分子,是全国各地佛教学院的优秀人才。僧侣救护队经过简单的训练,奔赴前线,昼夜救护。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出入吴淞、大场、刘行一带战区,救护受伤

官兵和难民。据“慈联会”1938年报告书称:在沪战3个月中,玉佛禅寺僧侣救护队共救护伤兵、难民8272人。

当年冬天,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四郊战场尸体遍地,中国士兵及难民遗骸无人过问。上海佛教界组织玉佛寺、法藏寺、关帝庙等寺庙僧侣和香工,建立掩埋队,1938年2月至5月结束,总共掩埋尸体1万多具。对此,每天报纸刊登有关消息,宣传他们的事迹。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次年,玉佛禅寺主持远尘法师隐退,将主持禅让给诗僧震华法师,并出任中国佛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他有爱国志向,同情抗日志士。1944年,江南地区诗人组织陶社,积极抗日,其成员在抗战期间遭到日本特务的追杀,避难于上海。震华法师应陶社成员陈季鸣等人所请,冒险借寺内精舍数楹作为陶社社址,并于当年浴佛节在寺内复社,出刊物《槟榔浴佛集》等,成为上海佛学界一段爱国抗日的佳话。

万里宣传抗日 奉献火红青春

——记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抗日战争期间，何香凝领导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以全国妇女抗敌慰劳总会上海分会名义组织了一支随军战地服务队，以沪西女工夜校进步师生为主。3年内，她们跨越苏、浙、皖、赣、湘、鄂、豫、闽8省，行程2万里，为抗战献出了火红的青春。

1937年9月中旬，何香凝委派胡兰畦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夜校联系，挑选10名学员组成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工作。

在校学生、共产党员任秀棠和原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胡瑞英各自向上级组织汇报，夜校党支部支持任秀棠报名。共青团省委临委书记陈国栋指示胡瑞英，挑选一批思想觉悟高、不怕苦、不怕死的共青团员参加战地服务团，胡瑞英自告奋勇地配合学校组队。

9月底，由1名教师、9名纺织女工组成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了，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19岁，其中有1名共产党员、7名共青团员，她们大多来自沪西等地的工厂女工。

何香凝指派胡兰畦为战地服务团团长。出发前，胡兰畦率领全体成员到何香凝寓所辞行，上海妇女界知名人士史良、沈兹九、罗叔章等为服务团举行欢送会。10月5日出发时，上海《妇女生活》杂志和上海各报都发表消息和照片，以示欢送。

10月6日清晨，10名姑娘身着戎装，在团长胡兰畦的带领下，正式到嘉定前线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队工作，她们的任务是：唤起民众，侦查汉奸，慰劳战士，纠正军纪，查考地方公务人员工作实况。这批特殊的女兵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部队官兵和战区民众的欢



女工夜校学生，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战士李亚芬烈士

迎和信任。1个月后,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第二批队员前来报到,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扩大到18人。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所到的前线战事十分激烈。她们经常冒着敌机轰炸、机枪扫射的危险,在青竹林的掩护下,演抗战戏、唱抗战歌,慰问抗日将士,激励军民同仇敌忾,向士兵宣传抗日就是保国卫民,切莫违反军纪的道理,消除老百姓对军队的恐惧心理。沿途,她们还起早摸黑到老百姓家中,宣传抗日;帮助群众抢收抢种,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抬伤员、运弹药、送粮草。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里的共青团员都由胡瑞英单线联系,每个党员、团员都十分清楚自己的职责,在前线工作主动、积极,队伍团结、纪律严明。

11月中旬,前线战事吃紧,淞沪前线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遵照党组织指示,服务团随罗卓英部撤退。沿途屡遭敌机轰炸、扫射。她们忍饥挨饿,跋涉千里,双脚底磨成血泡,双肩被压得红肿,但没有一个叫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绝不能辜负党和团组织的嘱托,一定要抗战到底。她们随军撤退,一路宣传抗日,鼓动大家万众一心抗敌。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大家终于到达南昌。

此刻的南昌,已集中南方八省的红军部队,叶挺、项英、陈毅等都在南昌筹备成立新四军。陈毅与胡兰畦早年都是北伐时的战友,获悉胡兰畦已到南昌,陈毅立刻赶到服务团驻地。经胡兰畦的请求,陈毅给全体服务团成员作了报告,讲述抗战形势与八路军平型关大

捷,要求服务团全体成员进一步宣传“抗战必胜、敌人必败”的真理。

共产党员任秀棠和共青团员胡瑞英各自找了个空,悄悄地向陈毅要求,“我们有个要事向您个人报告,请告诉地



女工夜校师生组成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于1937年10月5日出征合影

点。”陈毅心领神会地说：“好！来月宫饭店。”这天晚上，任秀棠、胡瑞英又相约团员郑惠珍一起去月宫饭店，与陈毅会面。任秀棠说：“到南昌后，我们心急如焚地找党组织，找不到组织，像失掉了娘的孩子，都快急死了。”她把服务团内的党团员名字及工作表现向陈毅作了汇报。“好！把党团员名单留下。”陈毅鼓励大家说：“你们服务团工作做得很好嘛！现在国共合作打日本，国民党地区的广大民众需要我们去发动，你们能在友军里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要很好地工作下去。”

两天后，陈毅派李志高参谋到服务团，再请任秀棠等三人到月宫饭店。陈毅高兴地向她们宣布：“我同上海党组织联系过了，你们的组织关系问题解决了，10名共青团员都可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支部可以设支委3人，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提名支书由胡瑞英担任，任秀棠任组织委员、郑惠珍任宣传委员。因为你们是在罗卓英部队工作，不宜与地方党发生关系。”接着又说：“当前我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党要求共产党员站在抗日的前线，你们就是在前线！你们工作的对象是士兵与民众。在友军中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你们要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党所提出的争取胜利而坚决奋斗。”临别，陈毅又说：“新四军就要成立了，不久我们要去皖南。我们已得悉，罗卓英部也要去皖南。你们的事可直接找我联系。”服务团正式建立了党组织，由陈毅直接领导。

女工夜校
学生演出
《放下你
的鞭子》。
导演 徐
韬，化妆
崔嵬

1938年初，服务团随部队到皖南歙县，驻城外棠樾村。1月底，在城东饭店正式秘密召开了支部成立大会，选举了支委会，传达了陈毅的指示。服务团的支部大会没有通知团长胡兰畦参加，因为组织上并没有给支部介绍她的党员身份，根据组织原则及白区纪律，不能通知胡兰畦参加支部大会。

胡兰畦原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生，大革命失败



后,她去德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在那里坐过法西斯的牢,出版了反法西斯的书,在文化界和妇女界里是著名的斗士。在服务团里,她领导有方,但从不暴露身份,也从未暴露过自己真实的政治面目。

由于服务团的工作太多,人员不够,团长胡兰畦去上海、武汉,补充了两批团员。1938年3月,服务团已扩大到36名女战士,随罗卓英部队辗转于皖、浙、赣三省10多个县开展工作。她们白天行军,夜晚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她们演独幕剧、多幕话剧,唱歌跳舞,编演歌颂抗日英雄的京剧《大战东林寺》,深受士兵和群众的欢迎,观众有时多达几千人。

1939年7月中旬,胡兰畦去重庆担任了党政委员会第三、第九战区少将指导员,10月初,才返回服务团。为了加强领导,服务团在团长之下增设一个队长,由胡瑞英担任。1940年春,胡兰畦患病去重庆治病,再也没有返回服务团,该团由胡瑞英负责,继续战斗。

1939年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服务团的抗日宣传受到限制,民众工作遭到监视。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特务企图把服务团溶化为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地下党支部认为再留在罗卓英部队工作已毫无意义,只有到延安或新四军工作。

这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黄道已在战斗中牺牲,服务团党支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经研究决定由任秀棠以治病为由,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请示。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批准,命支部率领党员和积极分子、老团员妥善撤出。同年6月任秀棠根据党的“妥善撤离”的指示,党支部决定采取老团员战地服务工作已3年,集体请假回沪探亲的办法,撤离了罗卓英部队,分批奔赴皖南新四军和革命圣地延安,从而结束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历史使命。

出生入死留绝唱 龙华桃花又一春

——记老革命张恺帆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上世纪50年代，作家萧三曾将这首刻在龙华监狱墙上的诗篇，以《狱中题壁》为名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曾误为烈士遗作。其实，此诗作者是张恺帆。萧三写信给张恺帆致歉。张恺帆回信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把握能活着出来，把它当作烈士作品，也未为不可。”

1990年6月，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成员去安徽合肥拜访张恺帆，了解他曾任沪西区委书记的有关情况。张恺帆作了一番回忆，还亲笔写了“龙华千古仰高风”一诗，给来访者留念。

张恺帆(1908—1991)，原名张昌万，安徽省无为县人。早年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六洲人民暴动”等。1933年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吴淞区委书记、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抗日战争中，任无为县抗日自卫总队和巢县黄山抗日游击大队政委，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大队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5支队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前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淮南矿区警备区政委，安徽省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等职。

1933年春，党内执行王明“左”倾错误方针政策，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上海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张恺帆受党的委派，相继在吴淞区和沪西区进行组织恢复和区委重建工作。10月，中共江苏省委调张恺帆担任沪西区委书记。同月23日，他到吴淞取行李，顺便去看



原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张恺帆

望一下时任吴淞区委组织部长的王厚芳时，被守候的叛徒和特务逮捕。

在长达半年的监禁审讯中，敌人施用各种酷刑，把张恺帆吊在房梁上，不停地用鞭子抽打逼供，直至昏迷才放下。泼上冷水，张恺帆醒来后，又上“老虎凳”。张恺帆浑身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数次昏死，但是，他咬紧牙关，坚决不吐露党的机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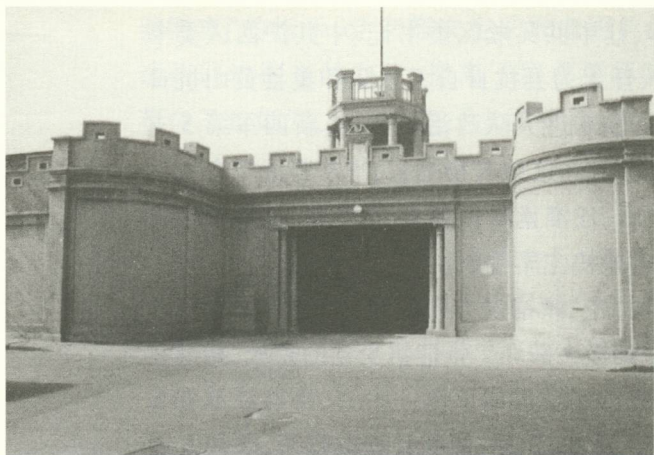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张恺帆作为共产党嫌疑犯移送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将监狱作为磨炼革命意志和学习的大学校，与其他许多政治犯一起进行绝食斗争，还与几名政治犯组织了一个“扞虱社”，以诗言志，互相激励，抒发革命情怀。为纪念何孟雄、李求实、殷夫、柔石等 24 名烈士牺牲 3 周年，创作了“龙华千古仰高风”的千古绝唱，并用笔书写在牢房的墙壁上，以示后人。

1934 年 3 月底，张恺帆被押送上海漕河泾监狱，以“危害民国罪”判刑 5 年，还被上了脚镣。在狱中，张恺帆和其他难友坚持斗争，设法怠工，破坏机器，用藏匿的铁钉钻透墙壁与邻室互通消息。1935 年 8 月，为抗议非人的虐待，近 200 名政治犯举行了绝食斗争。狱方气急败坏，竟称政治犯要“暴动”，指认张恺帆是为首分子，施以踩杠子等酷刑，从清晨 8 点折磨到夜间 11 点。张恺帆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决不屈服，决不复食。敌人恼羞成怒，给每人加上一副铁镣。难友们不为所惧，坚持绝食斗争。经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各方努力，绝食斗争进行到

第 4 天，狱方怕事情闹大，不得不答应改善条件。

绝食斗争的胜利，使漕河泾狱方极为惊恐，1936 年 10 月将张恺帆等 50 人解送苏州军人监狱。在那里，张恺帆被残酷折磨，还差点死于伤寒病。1937 年抗战爆发，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经党

原国民党
淞沪警备
司令部大
门，张恺
帆曾被关
押在内设
的监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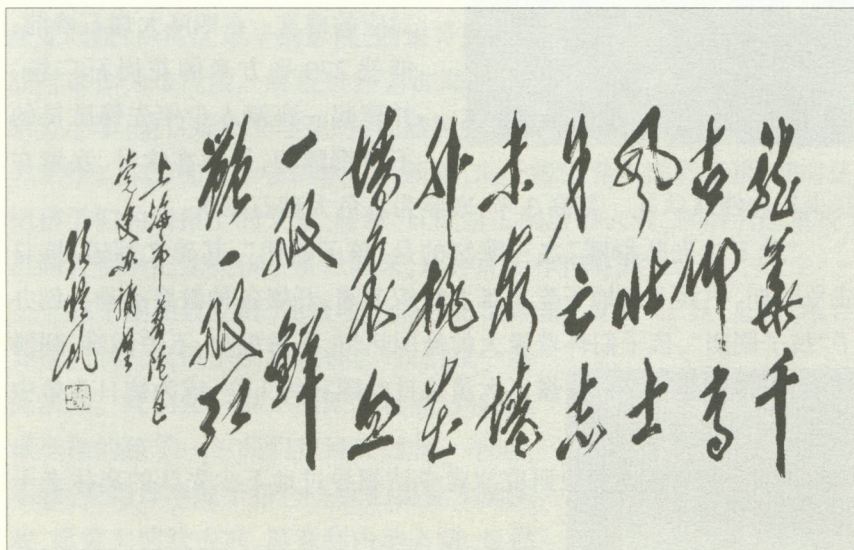


组织营救,张恺帆获释回家乡,参与领导无为和巢县抗日游击队,任政治委员;之后又编入新四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59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肥东、肥西、巢县、无为等县检查工作,据实向省委汇报,提出停止蛮干、分粮到户、解散公共食堂等应急措施,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转机。张恺帆曾百感交集,奋笔成诗:“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

然而,张恺帆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之首,1959年9月19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纠正部分过“左”政策,经中央监委批准,张恺帆恢复党籍、职务和名誉。“文革”期间,他再次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等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和经济改革。

1991年10月29日,张恺帆因病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他曾留下遗诗:“亲朋不必过多情,世上能无不老人?寸土寸金宜爱惜,丧仪概免不堆坟。”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张恺帆为普陀区委党史办补题龙华诗

演唱演戏演讲 抗日烽火成长

——记上海“孩子剧团”

在长风公园的中央草坪上有一组“地下少先队群雕”，是由市总工会等 32 个单位赞助，市儿童和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主建的。群雕占地 523 平方米，一旁的巨大花岗石上刻着康克清题写的“地下少先队群雕”七个大字。



孩子剧团的团员们

在花岗石平台上建起四座高低错落的大理石墙，正面为红色，分别镶嵌着一组钢质浮雕，反映了上海解放前 4 个历史时期儿童的革命斗争活动；各个大理石墙背面是与每组浮雕相对应的碑文。在四座大理石墙前，铺就 270 平方米的花岗石广场，并建起一座双人少年先锋队员的不锈钢雕塑，男童在吹号，女童在

行少年先锋队队礼。其高 3 米，底座为红色大理石砌筑。

“地下少先队群雕”之三雕塑的是“孩子剧团”，其碑文写道：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把难童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创办了“孩子剧团”，孩子们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到群众中去演唱、演戏、演讲，做了大量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成为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

为此，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曾专访领导过地下少先队的离休老干部吴新稼。

1936 年，吴新稼担任中共国难教育社沪西分社书记，当时名叫吴甫生，参与组织领导沪西、沪东的上海日商工人大罢工，1937 年 2 月，到沪东工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市先后共有25万难民涌进各个难民收容所,其中绝大部分是惨遭战祸洗劫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等,在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抗日热情。中共江苏省委十分重视难民工作,同年12月专门成立了难民运动委员会(简称“难委”),并规定了发动组织难民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的七项任务。随着广大难民的思想觉悟提高,有不少人秘密加入共产党,有20个多个难民所成立了党支部,党员从三四十名发展到300多名。

各收容所把难民分成儿童组、妇女组、壮丁组,教师们自编教材,把抗日的政治教育贯穿于文化教育中,儿童教材的第一课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到难民所去宣传抗日救亡的就有“孩子剧团”(当时儿童界的救亡团体有十几个:儿童界救亡协会、孩子剧团、我们的儿童剧团、孩子歌咏团、难童剧团、难民小先生普及教育团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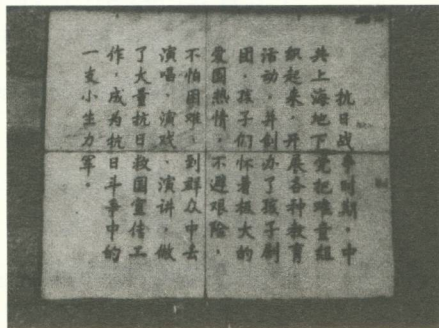
“孩子剧团”成立于1937年9月3日,隶属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由王洞若、吴新稼、许翰如等先后任团长,主要成员有许之明、张莺、张宗元、郭宝祥、张浣青等。

“八·一三”战火蔓延后,杨浦区临青学校部分师生避居法租界恩派亚戏院(卢湾区最早的影院,西班牙建筑风格,以上演地方戏为主,抗战时曾作为难民所。解放后曾为淮海中路85号嵩山电影院),再加上绍芳小学、余日章小学学生等,在难民收容所里不怕困难,坚持学习,努力工作。作为临青学校的教师吴新稼,向上级领导王洞若汇报,同时还把孩子们的墙报上的文章、诗歌、日记给王洞若等人看,从而引起重视。王洞若要求把这些孩子组织起来,认为此工作很有意义。

孩子剧团成立时,还吸收了部分流浪难童。9月11日,上海《救亡日报》刊登了《孩子剧团宣言》,“我们是一群流浪儿。我们是一群不愿跟着爸爸、妈妈逃难享福的孩子……我们曾经发过誓:不逃,不躲、要同日本鬼子拼……我们愿意永远演戏,愿意上前线去演,愿意到内地去演,也愿意到受难的同胞里面去演。”

起初孩子剧团设在恩派亚戏院,同年10月搬迁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国际救济

地下少先队
群雕碑文



于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的历史，唐克明同志为了帮助同志，当会前人大委员长董必武同志于少共工部协调委员会名誉主任王德安参加红墙的四座大门时，大群上红墙者，一片欢呼，几百副的千面旗，五颜六色的气球在空中，许多儿童敲着锣鼓，唱起了《共产儿童团歌》、《国际歌》等歌曲，用艺术的方式庆祝了为期十天的少先队员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斗争胜利。

市委常委刘成忠正在海基桥上讲话。他带着整个红墙的儿童们接受少先队员的队旗，队旗在风中飘扬，以小时数、分钟数、秒数报知时间，团结着、激励着他们，时刻准备着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在约八时半会上，本市有四百多少先队员

开一个座谈会。上海各救亡团体发起“保卫大上海运动”期间的一个星期日,正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0周年,他们请来沈西苓等先生演讲。同时扩大讨论的范围:为战死的将士致哀,讨论联络各儿童团体的办法,报告北伐时期儿童团体的活动情形,报告九国公约开会等。还决定由孩子剧团傅承漠(陈模)执笔写信给苏联最高领导及苏联的小朋友:

苏联的先生们以及我们最知道的史太林先生、莫洛托夫先生、加里宁先生,以及全苏联敬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国家成立二十周年的一天,我们以十二万分的敬意而羡慕你们……听先生说,你们读书是不要钱的。你们大家有得玩、住、吃、做事……我们现在为我们生存,与世界大众的敌人——日本军阀拼命!我们在这当中,求得我们的生路……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在王洞若的安排下,吴新稼率领20余名8岁至12岁的团员,分五批撤离上海,其中有王洞若从山海工学团介绍来的许翰如、徐治平、徐祥仙等。

孩子剧团先在南通集合,经徐州、郑州,前往汉口。在途中孩子剧团艰苦行军,经常挨饿、受冻、生病。但他们坚持宣传演出,其主要剧目有《帮助咱们游击队》等。1938年春,孩子剧团抵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了欢迎会,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叶剑英、叶挺、邓颖超、郭沫若等出席,周恩来说,长征时,有的“小八路”是靠大人抱过来的,“可是他们(指孩子剧团),一个大人也没有。从上海出发,突破敌人的封锁,在敌人的炮火下,跑了几千里路,沿途还做宣传工作。硬是跑到武汉来了,真是不容易啊!”根据剧团孩子们的表现,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

由于孩子剧团领导工作抓得紧,因此团员的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求知欲望强,学习进步快;组织纪律性强,既民主,又集中;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艰苦朴素,不怕吃苦。剧团不愧是革命的熔炉,培养人才的学校。

孩子剧团被收编到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剧团扩充为60人,创作并演出《不愿做奴隶的孩子》、《孩子血》、《为了大家》、新歌剧

《农村曲》(冼星海作曲),都获得了出色的宣传效果。1941年春到1942年,孩子剧团演出了石凌鹤编导的六幕儿童剧《乐园进行曲》、五幕童话剧《秃秃大王》(石凌鹤、张莺改编),标志着剧团的戏剧艺术活动走向演出大型舞台剧的成熟阶段。

1942年9月,孩子剧团被迫结束了遍及8个省市和几十个农村集镇的抗日宣传活动,一部分团员被送往解放区。

“孩子剧团”在艰苦的环境中演戏,宣传抗日,这是地下少先队的少年儿童群雕中的历史原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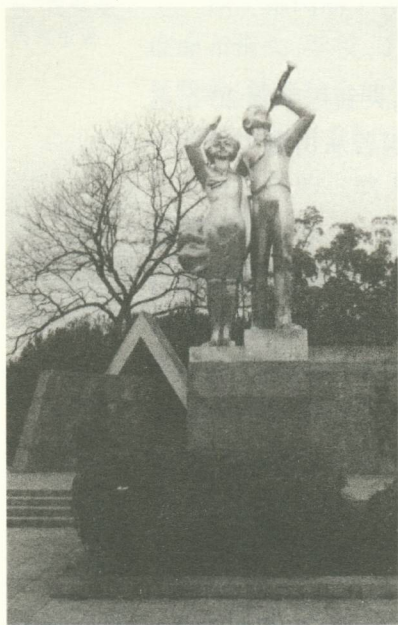
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有少年儿童革命活动足迹。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了“劳动童子团”。当时全市5个区共有1200人参加童子团,沪西小沙渡有600人,他们在子弟学校读书、唱

歌、演戏,快乐生活。同时在共青团领导下,跟随革命者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示威游行,直接参加了五卅运动。后来因童子团负责人胡南山被敌人逮捕,失去领导组织而失散。不久,重新组织起的童子团,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赤色童子团”,积极投入抗日革命活动,以小先生的身份,向工人、伤员宣传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相继创建了“孩子剧团”,创办了“少年报”,建立了“地下少先队”。孩子们跟随革命者,到街道、弄堂贴标语,探敌情,长大后继续参加革命。

坐落于普陀区长风公园内的地下少先队群雕



秘密组建队伍 惊险地下斗争

——记沪西地下军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活跃着一支地下军，由中共华中局组织和领导。南京、苏州等地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军，打击日军和汪伪反动统治，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占领沪宁一线的大中城市。

上海沪西、沪东、浦东、龙华、吴淞、徐家汇等都曾建有地下军。为此，普陀区党史研究室成员采访了当年上海地下军领导人张承宗、张祺和沪西地下军负责人高骏、倪宏胜。



沪西地下军负责人高骏

1944年下半年，中共华中局城工部分批调集上海地下党各系统负责干部到根据地，举办整风学习班，计划组织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进攻城市。以后学习班扩大范围，参加学习的以工人为主，还有职员、学生、警察以及上层统战工作干部，其中有沪西的老工人倪宏胜和张书宝。

新四军城工部参加整风学习结束后，城工部部长刘长胜、张承宗找高骏谈话，要他回到上海后，组织工人地下军，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第二天，高骏脱下军装，换上布衫，打扮成工人模样，从苏北六圩渡江，跟着跑单帮的人群，回到离开半年之久的上海。当天下午，到沪西的朱品芳（后任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委员）家中，与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张祺接上关系。组织决定高骏在朱品芳家中住下，熟悉情况，再开展工作。

不久，地下党安排高骏到铁路局上海麦根路火车站（原上海铁路局东站、现上海火车站）当扛煤工，在工人中以“新四军之友”的名义，团结工人，秘密集会，发展工人加入“新四军之友”。1945年2月，张祺在沪西召开地下军会议，张祺以“新四军驻沪代表”

身份，向与会人员介绍抗日战争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建立地下军，配合新四军打垮敌伪，为接管上海出力。会议决定高骏以“新四军特派员”的身份参与组建地下军。

地下军队员倪宏胜（日商内外棉五厂工人）住在小沙渡路，周围都是三轮车、黄包车、塌车工人和失业工人。为了养家活口，他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军和汉奸设置的重重关卡，从郊区背米进城贩卖。高骏、倪宏胜等人商量开一个茶馆，设在倪宏胜家附近的西康路、草鞋浜的转角处。每天的生意很好，他们把附近的穷人拉进茶馆，交结朋友，发展了30余个队员，又在他们周围团结了四五百人的基本群众。

不久，倪宏胜引起日军注意，被抓起来，关进监狱，日本宪兵对他严刑拷打，逼他招供，但是，他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倪宏胜被关了3个月，释放后，党组织秘密送他去淮南解放区休养。

倪宏胜被捕后，沪西地下军以高骏、张树人、刘志荣等为领导，继续工作。

沪西地下军主要分布在西康路、澳门路一带，还有几处分散的活动地方。蒋家弄有20余个队员和二三百名群众；石灰窑有10名队员和一二百个群众，出没在郊区的有20余个队员，总共有地下军骨干60余人，团结周围群众几百人。高骏与张祺商量，一旦上海发动起义，沪西将以60余人的骨干为第一线突击队，周围群众和一些“新四军之友”的成员为第二线，夺取敌人武器和打巷战时投入战

斗；其余一些同情和支持我方的群众，可以担任救护、后勤工作。

地下军组建时，高骏等人设法搞武器和子弹。队员小湖北胡凯成，在麦根路车站日军运输的中转仓库里搞到两挺机枪，

沪西地下军领导成员倪宏胜（建国后摄）



直接送给高骏，高骏与浦东游击队调换了手枪，后又买到一支“白朗宁”旧枪。不久，从张承宗处领到两支手枪，弄到八颗手榴弹，这是沪西地下军的武器装备。

为了使地下军队员学会使用武器，由专人负责定点训练，解决枪少人多的矛盾。在敌人眼皮底下转运训练的枪支比较危险，他们决定先由杭惠兰、毛家华两位女同志化装掩护穿街走巷、熟悉地形。早晨五六点钟，她俩装着外出买菜，将手枪放在篮底，高骏负责护送，相距约20米。如果发现情况，高骏两手一背示意，后面她俩立刻绕道而行。有时混在工人放工时带出手枪。队员们在安全地方试练射击，但子弹来之不易，所以没有进行过一次实弹射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里应外合解放上海的时机到来。根据上级指示，沪西地下军积极制定方案，准备一旦条件成熟，立即攻占沪西地区日伪警察局。当时沪西地区有沪西、普陀、静安三个警察分局，拥有长短枪2000多支，武装起义，首要任务是夺取武器。大家考虑，起义先占领一个工厂据点，再扩大起义区域。刚从解放区养伤回来的倪宏胜也投入战斗。最后因局势发生变化，地下军起义计划被紧急中止。

这时，上海滩的汉奸惶恐不可终日，纷纷暗中转移或隐藏搜刮来的财物，准备在国民党接收大员来沪之际，用重金贿赂，求得庇护。当时有个日本财团派驻上海的代表，伙同一个沈姓的汉奸，秘密把2500两巨额黄金秘密转移到一个姓王的奸商家中，准备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达上海时作为见面礼。他们后来又怕不安全，偷偷地把这批黄金转移到一个认为最可靠朋友的嫂嫂家里隐藏起来。

这“万无一失”的藏金窟，恰巧是地下党员浦作之家。他当机立断，立即将内情报告吴学谦（中共上海学委委员），吴深感事关重大，立刻转报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承宗立刻找到张祺，要他采取果断行动。张祺把这个任务交给高骏。高骏当即与提供情报的浦作联系，在新乐路、襄阳路口东正教堂附近接头，商定行动方案。然后，高骏到现场勘察，仔细分析情况，向张祺提出，单靠地下军队员，恐怕难以叫开大门，时间一长，事易败露，是否增加两个女同志进行配合。高骏又找到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范小凤配合行动。

一个智取黄金的行动计划迅速形成，行动的前夜，大家进一步明确了行动的具体细节，作好充分准备。

8月27日清晨，早起的市民出门买菜。这时，地下军分成4个战斗小组，出现在新乐路永利村附近。范小凤、毛家华打扮入时，烫发，身穿旗袍，脚蹬高跟皮鞋，手拎提包，酷似阔小姐。她俩上前敲门，说是找三楼人家有事，房主人一听婉转的女人声音，解除了警觉。里面作内应的浦作把住在三楼的人叫下来开门。

房门一开，范小凤、毛家华刚进门，高骏、丁祖宪、刘志荣和黄金玉两组人迅速冲进门，躲进房内，门外留下朱品芳、顾文丰守卫望风和接应。进门后，高骏等人先控制电话机，切断内外联系，同时上楼封锁制高点，随后下到二楼，把作内应的浦作和他舅父一家人赶进底层房间，反锁房内，以后即使出了问题，他们也好脱干系。根据浦作的暗示，高骏等人在二楼的保险壁橱里取出那批巨额黄金。这次成功的行动，前后只花了20分钟。

敌人发觉后，立刻进行侦察。不久抓获了丁祖宪。敌人施以酷刑，妄图追回巨额黄金，但是，丁祖宪坚强不屈，受尽酷刑折磨，没有吐露党的机密。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党组织设法把他营救出狱。

紧急下令中止 枪声未能打响

——记沪西工人武装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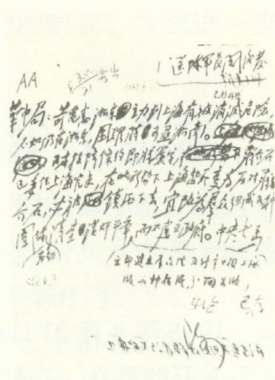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23日清晨，沪西莫干山路僻静的街道上，突然出现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呼“我们要饭吃”、“我们要上工”口号，还有许多人涌进附近的信义机器厂，厂内厂外人头攒动，人们都在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可是，到了傍晚，人群突然四处散去，这里恢复如常。

这是临时紧急中止的以沪西地下军为骨干的工人武装起义。

1944年10月，上海地下党根据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的指示，在上海工人集中和聚居的沪西、沪东及市郊龙华、杨行等地区，着手组织工人地下军。并由从淮南参加学习回沪的工委书记张祺，从上述地区的地下党员中，选送一批同志到新四军根据地学习，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华中局城工部陆续选派一批能文能武的干部到上海，积极展开活动。1945年初，诸敏接受刘长胜、张承宗交代的任务，到上海负责建立上海工人地下军。诸敏到上海杨行镇后，与陈坤金等开了一个杂货铺，作为交通联络站。其中，沪西地下军由高骏等人秘密组建，其他地区也先后建立地下军。组建上海地下军负责人之一的周克积极筹集枪支弹药，并开展斗争，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武装地下军。

1945年4月，上海地下军开始在市郊开展军事活动，周克与淞沪游击支队取得联系，为地下军到青浦集结整编做准备，同时在那里举办干部学习班。

1945年8月8日，延安电台发出电讯，公布苏联对日宣战。10日，中共中央电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告各区党委，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准备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所有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



毛泽东终止武装起义的电报文稿

通要道。华中局接电后，立即部署，新四军两个师向上海两翼运动，淞沪游击支队向上海南郊逼近，准备进攻上海。新四军城工部一批干部奉命立即返回上海，发动群众，准备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新华社华中分社公布了刘长胜为市长的任命。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敌人还未放下武器。

上海地下党决定在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以及各界人士中，成立庆祝抗日胜利筹委会，很多工厂贴出“欢迎刘长胜任市长”、“欢迎新四军”的标语。17日，在中共沪西“纱委”、“杂委”的组织下，以纺织、机器等行业为中心，在中山北路朱家湾平民村召开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并成立工会的筹备机构——庆祝抗日胜利筹备委员会。

19日，上海地下党“工委”根据华中局关于占领一二个工人区，再推广到全市，形成全市武装起义的电令，决定将沪西莫干山路信义机器厂作为起义指挥部。该厂为日本军工生产原料，附近有戈登路警察分局，起义时，可以在内应配合下夺取枪械库的2000支枪，及时武装工人。21日，华中局命令上海地下党组织现有力量，占领工人区，武装群众，举行武装起义。

23日清晨，沪西地下军60余人奉命集合，带着武器，按照预定方案，守候在信义机器厂附近待命。沪西纱厂、机器厂和其他各厂的党员、群众约7000余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了工厂，阻断交通。在“没收汉奸财产”、“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声中，地下军带领

群众冲进厂内，设立了起义指挥部。占领工厂的起义群众秩序井然，集中在厂内外，等待下一步行动的命令。

但是，正式起义的命令迟迟未下达。下午4时左右，上海起义总指挥张祺赶到信义机器厂，向沪西起义指挥部领导成员宣布，“刚才接到中央命令，决定改变计划，暂不占领上海，你们赶快撤走队伍，群众分批撤离。”全体在场的指战员愣住了，但命令如山倒，立刻执行，突击队先撤。群众排成队，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工”口号，转为上街示威游行，四处散去。

原来当天午后，上海起义总指挥张祺才接到中央停止起义的命令。中央下达停止起义命令在21日已发出，连发3次急电。当时上海地下市委没有电台，一切电报往来都通过青浦淞沪支队电台转发，由于交通的阻塞和时局的变幻，所以中央的急电才迟迟到达上海。

这时，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开始空运全副美式装备的汤恩伯部队进驻上海，对市区和郊区交界地区进行严密封锁。因此，上海地下党本着“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果断采取相应措施，作了妥善安排。

这次起义计划临时改变了，但沪西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经受了一次锻炼。4年之后，沪西地下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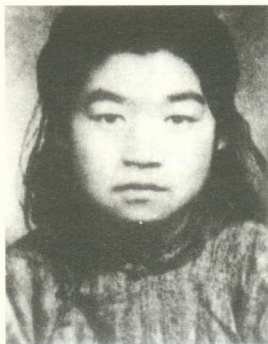
现已改成
M50的信
义铁工厂



面对带血刺刀 前仆后继斗争

——记申新九厂“二·二”斗争

1948年1月30日至2月2日，全国最大的民营棉纺织厂——上海申新九厂7000余名工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坚持四天三夜震动全市的罢工斗争，史称申新九厂“二·二”斗争。



申九“二·二”斗争中牺牲的蒋贞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1947年底比1946年上涨了26.6倍。而工人生活费指数所计算的工资收入，只及物价指数的49.4%。这时，官僚资本企业中纺公司和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竟然规定1947年底的年奖按照1946年标准打八折，分两期发放，而且不按当月生活费指数计算。申新九厂工人除了年奖受到损失外，还被国民党政府

征去4个月的所得税；连续5个月没有领到配给米和煤球；同时，资本家制造各种借口，不断

开除工人。厂方不履行1946年纺织业十八条劳资协议，越到年底，开除工人越凶，目的是为了省下一笔年奖。女工怀孕后，面临开除的威胁更大。十八条协议中第9条规定，女工分娩前后，

应停止工作共8个星期，停止工作期间，工资照给。但是，申新九厂有些女工的产假期得不到保证；或者产假期已满，身体不好，不能继续休息，不上班就作旷工；旷工三天，就要被开除。贫困不堪的工人面临飞涨的物价，



申九“二·二”斗争中牺牲的朱云仙



申九“二·二”斗争中牺牲的王慕楣

面对开除的威胁,实在难以生存下去,纷纷表示要为生存而起来战斗。

中共申新九厂地下党组织,决定顺应工人群众的要求,在1948年春节以前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党组织派党员毛和林先去布机间了解群众对罢工斗争的看法。1月28日,毛和林有意识在布机间车弄旁当着很多工人的面询问车间主任:“米和煤球到底几时发下来?”女工们很关心这个问题,纷纷围上来探听消息,于是许多布机都停下来,形成了一次试探性的罢工关车。消息传出后,工人们要求罢工的呼声愈来愈高涨。党组织决定在30日举行全厂性的罢工。30日上午,申新九厂气氛异常紧张,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受到资本家亲信和黄色工会人员的盯梢监视。中午12点半,中共地下党员杨光明首先指挥铜匠间先关车,其他各车间工人在共产党员带领下纷纷关车。5分钟以后,全厂机器全部停止了转动,罢工开始了。资本家派出亲信监视阻止工人罢工的企图失败了。住在厂集体宿舍内的夜班工人,闻讯纷纷集合起来。资本家亲信企图阻挠夜班工人进车间,关闭了宿舍区的铁门。共产党员戚怀琼勇敢地站出来,指挥夜班工人冲出宿舍,冲开铁门,涌向车间,全厂长日夜、甲班、乙班的7000余工人大会师,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投入罢工斗争。

为了准备同资本家谈判,全厂共选出工人代表140余人,中共地下党员都当选为代表。在工人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同资本家谈判的七项条件:一、如期发放配给物品;二、年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补发;三、年底前被开除的工人一律无条件复工;四、取消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厂规,所有厂规要有劳资双方协商才能有效;五、女工产假期满而身体不好的仍可继续休息;六、补发“五一”劳动节工资;七、反对征收工人所得税。

当天深夜,以中共地下党员杨光明为总代表同资方代表进行谈判。为了保护谈判代表,100多名工人代表都进入谈判场所。当工人代表提出第一条关于如期发放配给米和煤球的要求时,资方代表蛮不讲理地说:“今年无锡、常州收成不好,等明年丰收再发米……”,“现在只有一个煤矿在南京,正在开采,等挖出煤来,修好公路,就可以发给大家了。”工人代表对资方代表毫无诚意的谈判态度,十分气愤。这时在谈判场内,发现了两个冒充新闻记者的陌生人,在工人代表的追问下,才



申九女工用
身躯抵挡国
民党装甲车

知道是国民党普陀警察分局派来的密探，他们的丑恶面目，当场被工人揭穿。

罢工进入第二天，国民党社会局和市党部派了两人到厂调查罢工情况。他们同混进工人代表中的黄色工会人员密商平息罢工的计策，企图破坏工人内部的团结。第三天，这两人同工人代表 100 余人谈判，根本毫无诚意，还向工人施加压力，对工人代表威胁说，“小榔头”敲不下来，要用“大榔头”来敲。致使谈判一直陷于僵局。

申新九厂连续 3 天的罢工斗争，使国民党当局惶恐万状。与此同时，上海市连

续爆发的同济大学学潮，市长吴国桢挨打，舞女怒砸社会局，使“学潮”、“舞潮”、“工潮”一起来，国民党当局决定对申九工人实行镇压。2 月 1 日晚上，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召集一帮人，在静安寺百乐门舞厅开会，秘密策划对申九工人罢工实行镇压的具体步骤。

全厂工人在坚持三天三夜斗争，在共产党员带领下，表现出很好的组织纪律性。罢工开始后，迅速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守护交通要道和机器设备，看管保护好棉花原料、棉纱线、布匹等成品和半成品，防止敌人破坏以嫁祸于工人。共产党员组织工人印刷传单，书写标语，贴到厂内每一个车间、科室、宿舍。青年女工王慕楣等人带着标语传单，走出厂门，把标语贴到街头、贴到电车上、汽车上、三轮车上。工人还组织了歌咏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配给品》、《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工人们在一块麻袋布上写了“工人团结起来”六个大字，作为旗帜插上屋顶最高处，还把《告上海工友书》等印刷品从屋顶散发到马路上去。

2 月 2 日清晨，一批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工厂。资本家指使门警打开大门，军警很快占据了工厂的第一道、第二道铁门。工人闻讯后，纷纷跑出车间，涌向第三道通往车间的门口，纠察队用铁链锁住第三道铁门，守好其他各道门，手挽手筑起一堵堵人墙，顶住铁门。共产党员带领工人在饭厅屋顶上筑起防御工事，把砖块、竹片、木棒、桌

凳、碗、铁棍、油桶等搬到屋顶,还接上消防龙头,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军警看到后大叫:“你们要造反啦!”工人们回答:“你们不开枪,我们也不打。”戚怀琼带领大家呼喊口号:“我们要配给物品!”“警察、工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工人们还对着军警,高唱:

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别人家配给物品都已发,
只有你,只有你,囤积在家里,
只管你发财肥自己,
工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不发煤球、不发食油、不发食米的都是你,
你的良心和煤球一样的!

中午,国民党警察局长俞叔平带来了一帮大小头目陆续来厂,还调动了装甲车、消防车、马队、囚车和 1000 余名武装警察,策划决定先把罢工领导人和工人骗出去逮捕,然后驱散工人。他们一些大小头目轮流站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向工人喊话,叫代表出面去谈。工人们知道他们的阴谋,齐声高呼:“我们要(与)资方谈判!”“答应我们的合理要求!”“警察退出去!”这时,国民党特务对着罢工队伍不断地偷拍照。

下午,俞叔平用喇叭气势汹汹地对工人喊:“你们好好听我话,要是不回去开车,就会弄得大家都不好看,没有几天要过年了,你们要好好考虑。”工人们在共产党员带领下,继续高呼:“退出军警,解除武装!”“我们要(与)资方谈判,答应我们的条件!”

4 时左右,军警开始对工人下毒手了。他们先用大钳子剪断了门上的铁链,把铁门朝外拉,呼啸的装甲车突然出现在工人群众面前。管妙福等许多女工走到铁门外,站在装甲车前,大声喊:“用在战场上的装甲车用在工人身上,我们不怕,你们开过来吧!”装甲车不得不停下来,军警抓了几个女工,铁门还是被工人们关上了,继续用身体顶住铁门。不幸的是,女工王慕楣被挤压倒地,当场牺牲。守在饭厅屋顶上的工人,看到军警这一暴行,怒火冲天,他们把砖块、铁棒、碗片、桌凳,冰雹似的砸向军警。敌人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

5时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赶到现场,下达了向工人施放催泪弹、开枪杀人的命令,并调动了重型装甲车,再次向工人进攻。工人们从厂区内开出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共产党员许泉福开卡车,顶住了铁门。这时,国民党军警吹起了冲锋号,施放催泪弹,工人们在烟雾中头昏眼花,看不清反击目标,逐渐后退。军警从宿舍屋顶上、地面上疯狂向工人开枪射击,装甲车将铁门连同水泥柱子一齐撞到,卡车上弹洞累累,玻璃被打得粉碎。女工蒋贞新、朱云仙不幸中弹牺牲。共产党员何宇珍在饭厅屋顶上左腿中弹仍坚持战斗,勇敢地从三楼脚手架跳下,前额撞出个大窟窿,后仍被军警抓走。女工俞月琴的手指被枪弹打断。敌人冲进车间后,手提冲锋枪,抓到工人后,用枪柄乱打,特别是男工,都被拳打脚踢。直到晚上9时枪声才停止。

工人们为了求生存,开展了正义的斗争,寻求同资本家通过谈判来达到最低的生活要求,可是,却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3位女工王慕楣、蒋贞新、朱云仙英勇牺牲,100余人受伤,其中40余人受重伤。有236名工人被捕,后来,国民党法院又强行判处其中26人徒刑,中共地下党员、工人总代表杨光明被判无期徒刑。有365名工人被厂方开除。

申九“二·二”斗争,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内规模较大的一次工人罢工斗争,虽然暂时遭受了挫折,但这次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工人的狰狞面目,促使工人阶级更加团结,勇敢斗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积极发动群众 夺取最后胜利

——记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汤桂芬

1948年8月,上海纺织系统工运领导人之一汤桂芬以上海工人代表团团长身份准备前往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

一天清晨,汤桂芬头包一块花布,身穿蓝布衣裤,脚穿黑布鞋,与徐明哲共同乘坐一辆黄包车,来到十六铺码头。先见到打扮成商人的交通员大学生沈智,后又碰到统益纱厂钱瑞华,以及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两位学生小王和小陈。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们分散上船,听从交通员从远处发信号行动。汤桂芬、徐明哲、钱瑞华化装成三姐妹去苏北探亲,故意往人群中挤,把汤桂芬夹在中间。上船后,汤桂芬装病,躺在船舱里,左右有徐明哲、钱瑞华坐在身边照顾。船上三次搜查证件,都有惊无险地应付过去了,终于顺利到达苏北地区。

到了苏北游击地区,时有武装敌人出没,还有隐蔽的敌人。没有车、船可坐,只能跟着交通员行走。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她们选择每天夜晚上路,要走50里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泥泞小路、田埂。遇到下雨天,经常摔倒,一身污泥也顾不上擦洗,爬起来继续走。每天累得满头大汗,脚底都是血泡,还是要拼命赶路。走了2000里,才到达华中地区二地委所在地灌云县。

由于敌情和交通封锁,汤桂芬等人住了一个月,而后,地委书记陈丕显安排一个连解放军护送她们。6月下旬,到达山东中共中央华东局所在地,休整几天。7月1日继续上路,与准备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代表团成员张琴秋、丁玲等一起,化装成老百姓,经莱阳、到俚岛,从海上闯过封锁线,到达大连。登上苏联海轮,绕过黄海、日本海,从朝鲜罗津上



全国第六次“劳大”上海代表团团长汤桂芬

岸,乘火车两天两夜,7月25日,终于到达老解放区哈尔滨,全总领导人陈云、李立三、李颀伯等到车站迎接。

8月1日至22日,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期间,汤桂芬在大会上多次发言,介绍了上海女工英勇斗争事迹,很多代表感动得流下热泪。大会通过东北代表《关于全国解放区职工增加义务劳动一天,以其工资作为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及人民斗争基金》建议时,汤桂芬激动地站起来表示:“大会的决议和解放区职工的革命情谊,一定会极大地激励和鼓舞国统区的职工。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把斗争坚持下去,直到最后的胜利!”

1918年,汤桂芬生于上海沪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父亲汤志忠在日商内外棉四厂做打包工时,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曾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他懂日语,拒绝为日军效力,遭到汉奸恐吓,忧愤致病,含恨而逝。母亲林希珍是纱厂工人,生有两男两女,生下长女桂芬后,失业在家,生活非常困苦。汤桂芬的大弟汤桂根被送往抗日前线,一去无回,为国捐躯。

汤桂芬9岁起挑起家庭生活重担,先后在内外棉五厂、十四厂、统益纱厂、永安三厂、大康纱厂、同兴军服等厂做工。1939年,她在永安三厂做工,报名进入女青年会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在中共党员钱琴和黄纫秋老师教育帮助下,她逐渐提高了思想觉悟。同年12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永安三厂爆发了为争取年奖的三天三夜罢工斗争,汤桂芬勇敢地参加,表现特别积极,参加宣传鼓动,与工友们一起冲进经理室同资方评理,资方以“聚众闹事”为借口将她开除出厂。不久,她再度进沪西统益纱厂做工,上级党组织向该厂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毛经赐详细介绍了汤桂芬英勇斗争的情况。经毛经赐考察培养,1940年汤桂芬加入共产党。1941年4月,毛经赐调任中共沪西华商纱厂委员会工作,汤桂芬接任统益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1年底,日军侵占了上海租界,统益纱厂关闭。按照党的指示,汤桂芬到沪东大康纱厂(今国棉十二厂)协助余敬成(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工作。当时汤家住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大旭里,上班路途甚远,为了能有更多时间接近群众,她搬到简陋的工房里,与工人姐妹挤在一起,很关心工人姐妹。她省吃俭用,每次回家不乘车,从沪东到沪西,

来回步行,省下来的钱接济揭不开锅的工友。她与妹妹汤桂珍在一个厂做工,与妹妹合吃一份午饭,另一份送给生活更困难的工友吃。

汤桂芬心灵手巧,经常帮助工人姐妹缝补,裁剪衣服,织毛衣。厂休日,帮女工洗衣烧饭、倒马桶。她还发动群众开展互助活动,使大家深受感动。她秘密宣传新四军抗战事迹和党的政策,使大家增加抗日必胜的信心。她日夜操劳,长期积劳成疾,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并感染上伤寒症,无法继续在沪东开展工作,经党组织的安排,她回沪西老家休养治病。

1943年初,日军将原同兴纱厂改为同兴军服厂,开工之初,汤桂芬按照党的指示,考入戈登路(今江宁路)的同兴军服厂做工。汤桂芬技术水平高,在该厂车间内担任了第二班班长。进厂后动员女工到女工夜校读书,积极发展党员,并担任该厂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汤桂芬利用自己的班长身份,积极设法为许多失业的女工夜校同学介绍工作,把朱月华、陈素英、张金凤、张菊宝、杨善、胡月仙、李根宝等20多名女工夜校同学介绍进同兴厂做工。她们团结在汤桂芬周围,成了该厂的骨干力量。当时全厂有40多名女工在三和里夜校读书,经过女工夜校培养,许多女工同学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该厂有党员20多名,全厂30多个生产班,其中三分之二的生产班长是党员,三分之一的生产班长是积极分子,成为沪西日本工厂中的坚强红色堡垒。这期间,汤桂芬发动群众多次开展各种斗争,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拖延军服生产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日本资本家在大门口张贴了停工布告。汤桂芬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发动群众向厂方索要“停工遣散费”;又组织几个护厂小队,日夜在工厂四周巡逻,防止日本人破坏机器、偷运物资。一天夜里,护厂小队果然发现日本资本家正在搬运布匹和缝纫机,汤桂芬闻讯后立即组织数百名工人赶到厂门口拦截,许多工人奋不顾身地躺在厂门口的马路上,阻止卡车出厂,工人立即跳上车去,把卡车开回厂。

复工斗争胜利后,汤桂芬利用年关物价飞涨之际,带领工人开展反对开除工人代表、争取年奖的斗争。1946年1月14日,汤桂芬首先在党员较多的布机间发起罢工,各车间也随之关车,很快形成了全厂大罢工。统益纱厂工人斗争和全市工人争取年奖斗争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中



汤桂芬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合影（后右1）

共上海市工委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了一场很有声势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2月28日，汤桂芬等人迫使资本家签订了18条协议。其中包括增加工人工资底薪，工资与生活费指数挂钩，女工产假56天（工资照发），每天工作10小时，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及改善职工

福利等保障工人利益的条款。这是上海纺织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生活改善，是纺织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各业工人纷纷仿效，也签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的劳动条款。汤桂芬在纺织业乃至整个上海工人群众中崭露头角，“汤姐姐”的名声开始在各行各业逐渐传开。

复工斗争胜利后，各棉纺厂逐步恢复生产。同兴厂的党员有的原是各棉纺厂的骨干，各厂复工后，她们进入各棉纺厂去工作，又动员了许多姐妹到女工夜校读书。

抗战胜利后，汤桂芬担任沪西（三区）工会领导。1946年6月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动组织各界5万多群众到北站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汤桂芬参加了全市的欢送大会和大游行组织领导组织工作，还担任了沪西区游行总指挥。

1948年1月30日，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2月2日遭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国民党当局为了逃避罪责，竟宣布不许带黑纱，以“谁戴黑纱谁就是共产党”，恐吓群众。汤桂芬勇敢地带领全厂工人佩戴黑纱，以实际行动悼念申九死难烈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总工会成立筹委会，汤桂芬担任党组成员、女工部长。1950年7月，全国纺织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汤桂芬当选为中国纺织工会副主席兼上海纺织工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上海总工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54当选为上海市和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2月18日，45岁的汤桂芬不幸病逝。

谈判促使起义 挥师解放沪西

——访罗维道将军

2007年8月，普陀区委党委研究室人员专访93岁的罗维道将军，想了解解放军攻入上海，争取国民党刘昌义部起义和解放普陀区的情况。罗将军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听力有些背，但仍然能回忆起当年情形，说着一口江西话。



93岁的罗维道将军

1949年5月24日，我们27军从松江进入市区，占领了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机场。25日天刚蒙蒙亮，部队在进攻苏州河造币厂桥时受到盘踞在对面的国民党军顽抗。根据上级的命令，为了保护上海这座城市，战斗中不得使用重武器，部队伤亡很大；在激战中路边的电线被打断，我们的战士触电倒下，北方战士不懂电的知识，一个拉一个，结果伤亡好几个，后来找来电工师傅剪断电线才算完事。

我们81师临时师部设在第二劳工医院（今西康路）。天亮后，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等同志（事后知道他们的身份）来到师部与我和师长孙端夫联系，我说中央指示我们，要‘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建设上海，不能用重炮和炸药’，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最好进行政治攻势解决对面的敌人。田云樵马上想到联系人王中民，讲王曾任国民党少将部员，与对岸51军副官处长刘凤德较熟，现兵临城下，争取军长刘昌义投诚是可能的。随即安排参谋送其过河。我用电话将情况向聂凤智军长作了汇报。

“上午，我们又接待了王关昶、施惠珍等地下党同志，王是沪西人民保安队的负责人（事后知道，当时也没有介绍信）。我请他们为部队找30名向导，以帮助部队向江湾地区挺进。”事后我们知道，当时81师师部所在地劳工医院也是沪西人民保安队的联络点。

经过一番周折，中午前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兼 51 军军长刘昌义偕刘凤德、王中民、参谋等几个人乘坐吉普车通过造币厂桥来到我师部。刘对我讲，汤恩伯跑了，让他当副总指挥代军长，还对桥北的部署情况作了介绍。我讲你一小时内不投降，我们就彻底消灭你！他跟我谈了一个来小时，讨价还价，到底是改编、投诚还是起义？他要保留原来的编制、武器，我说绝不可能，只有放下武器，同意算你起义。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谈妥后双方在文书写的协议书上用毛笔签了字，对协议中‘保留原来的编制、番号’一句，我毫不客气地划掉了。

因为签了字，气氛比较轻松。看吃饭的时间已到，我请刘昌义吃顿饭，四菜一汤：青菜、豆腐、萝卜和一点小虾加清汤。他可能嫌差不想吃，问我平时也吃这些菜吗？我说还没这么好。

“饭后刘昌义提出要见陈毅司令，我说找不到陈司令（其实陈老总已在中山公园），你可以同聂凤智军长谈，刘略有不满，但还是听从了我的安排。于是我带着刘昌义、王中民等坐车前往虹桥路的 27 军军部。为确保安全，我派一辆架着机枪的卡车在前面开路。在军部，我们受到聂凤智军长的接待，刘昌义表示了起义的决心，聂军长笑着说：‘我听罗政委在电话里谈起，已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并说，对刘的安全，解放军绝对予以保证。至于待遇问题，对刘军长等贡献较大的国民党人将给予特别优待。刘听了连说‘谢谢’。”

我们在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以及刘昌义的回忆录中知道，为了贯彻协议，双方又商定三项具体内容：

一、刘昌义命令 51 军在 25 日夜 12 时前将造币厂桥防地（包括大场）交给解放军，51 军集中到江湾体育场，并配合解放军打击顽抗的国民党部队（刘提出时间来不及，后同意推迟 4 小时）；

二、命令国民党 21 军、123 军向大场集中，把苏州河以北所有防地、仓库、物资移交解放军；凡有违抗的，都由人民解放军解决之；

三、命令国民党所属部队在撤

普陀区委
党史研究室
人员采访
罗维道
将军



离中,要确保交通、通讯、水电等设施完整,不得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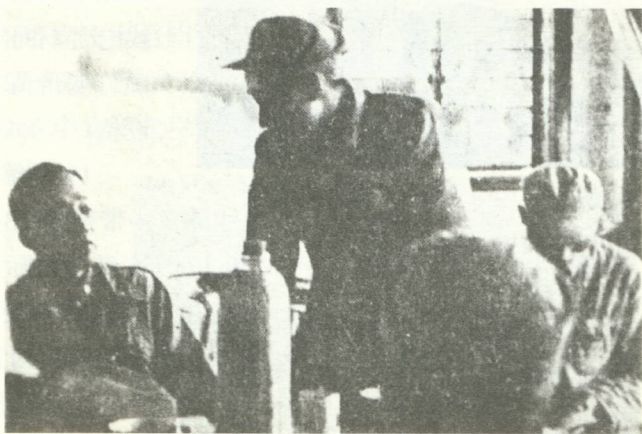
聂军长和刘昌义在协议上签字后,大家分头行动。刘昌义等返回北岸,让军法处长魏震亚留在81师师部,负责双方联络。

“26日清晨,我们81师顺利地造币厂桥等桥上通过,接管了刘昌义51军的所有防地,解放了整个沪西地区并向江湾地区进发,扫清残敌。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罗老浓重的江西口音到此告一段落。

考虑到罗老将军的身体,专访结束了,真诚地祝福他安享晚年,健康长寿!

罗维道将军,1915年9月生于江西泰和县一户贫苦农家。1929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4月加入共青团,1932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苏南战斗和黄桥决战、涟水和莱芜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战斗。曾在1930年反围剿战斗和1947年莱芜战役中两次负伤。历任江西军区万泰独立团连指导员、湘赣红五团营教导员;新四军团政委、苏南第四军分区政委兼中共郎广地委书记;华中野战军第16旅政委、旅长;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6师师长、第27军81师政委;建国后任空军华东预科总队长兼政委、防空军一军政委、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福建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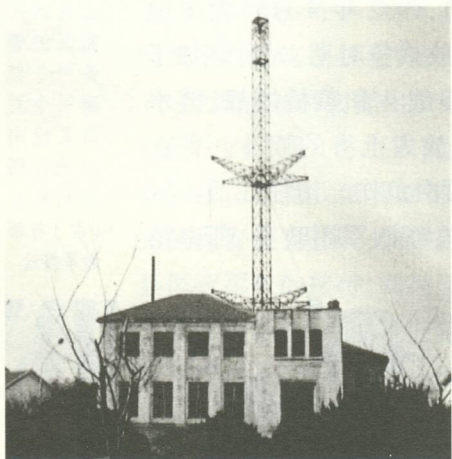
上海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投向人民,图为刘昌义(左)与解放军接洽



历经风风雨雨 终归人民手中

——记真如国际天线电发讯台

真如地处交通要道，邮政电信事业起步较早，明初即设真如铺（旧时驿站）。1871年4月，我国开始出现国际通信业务，由上海的



国际天线
电台真如
发讯台

丹麦商人开办的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和美国太平洋水线公司等外国人长期经营和垄断，在电讯业务中每年掠夺百万财富。1918年，孙中山先生曾提出，中国要设立自己的国际电台。1928年8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责成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负责在上海筹建大型国际无线电台。同年11月开始筹建工作，向美国订购价值17万美元20千瓦短波发讯设备。

1929年8月，在杨家桥以北、桃浦河东侧（现真大路1号桥）一带征地13.3万公顷，开工建筑，1930年11月竣工。1930年12月6日，国际无线电通信大电台揭幕典礼在真如发讯台举行。另在市区枫林桥设发报台、在刘行设收报台，在上海外滩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内设中央控制室和营业处，形成完整的收发报及营运系统，同属国际电台，隶属国民政府交通部，担负国际电报业务，正式与欧美各国通报。历时两年，共用美金40万7千元，国币54万元。

1931年2月，改名国际电台，简称“CGRA”（英文全称为Chinese Government Radio Administration）。张承祜任管理工程师，负责管理电台。1933年卢宗澄调入国际电台工作，任工程师，后任管理工程师，负责电台的全面工作。两年后，开启电路13条，包括

欧、亚、美三洲 12 个国家和地区；有发讯机 11 部。国际电台为中国当时唯一由国家经营的国际电信通信机构，其直达电路数一度占世界第四位，亦曾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国际发报台。

开通与美国的电讯业务时，宋庆龄与罗斯福总统夫人通了话，虽远隔重洋，但语音清晰，使得国际电台的信誉日隆，业务量激增，超过外商三家水线公司的总和，进一步显示了无线电通信的优越性。至 1934 年，年收入高达 400 万元。与此相反，丹商大北电报公司、英商大东电报公司 and 美商太平洋流电线电报公司的业务则一蹶不振，被迫放弃营业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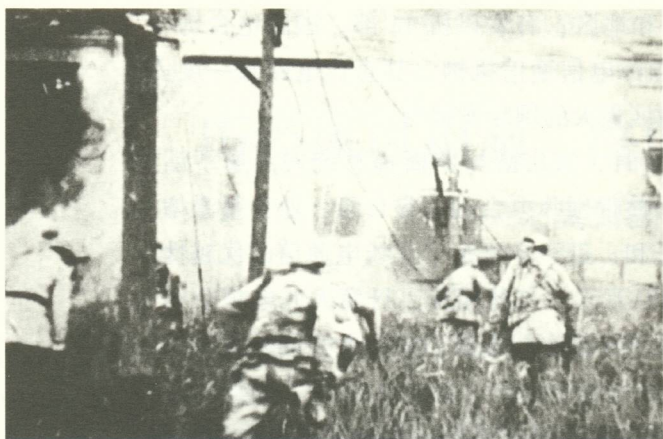
“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战争，真如国际电台均是侵华日军轰炸与破坏的重点目标。沦陷前，电台大部分设备、人员迁往成都、重庆。发讯台被日军占领后，加以扩建，主要设备有日式等短波发讯机 28 台，天线 55 副。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国民政府接收，恢复发讯。1947 年，可与亚、欧、美、澳、非五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通讯。

为了迎接解放，保卫真如国际电台，1948 年 9 月，地下党大场分区委先后派刘期颐 and 薛耘，将家住电台附近的 30 多个电台工人组织起来，办了夜校，学习革命道理，启发政治觉悟。并先后发展了沈大根、魏宝泰等 7 名工人和 6 个青年农民入党，组成两个党小组，实现了地下党打入电台的计划。不久，真如分区委成立，电台党小组由该区委领导。

电台党小组长魏宝泰等提出了“人在电台在”的口号，誓与电台共存亡，并相继开展了团结工人和技术人员、绘制电台方位图、摸清周围碉堡群位置数量、行政人员政治表现、设备设施情况等工作。经过地下党小组的宣传和发动，职工们决心与电台前途共命运。

1937 年
10 月 27
日，日军
在真如国
际电台





解放军猛
攻真如国
际电台

在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之后，电台正式成立了留守小组，由技术员黄振禄、总务陈锡荣和地下党员魏宝泰、孟宝祺、积极分子杨友根、周伯兴、张福庆组成，掌握了留守小组的领导权。为了避免电台设备毁于战火，党小组沈大

根、何德祥同志带领工人职员利用转移刘行物资的机会，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借来30辆军车，利用到真如台抢运设备物资之际，将电台重要物资装车分散到北苏州河路、泥城桥、河滨大楼等处隐蔽起来。

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隆隆炮声临近，一批国民党交警中队的士兵带着汽油等燃烧物，要动手烧毁电台。行政负责人黄振禄出面搪塞，说是要破坏也要请示上海总局。大家递烟、送茶，同士兵软磨硬泡，拖延时间。解放军的冲锋枪子弹越来越近，士兵为急于逃命，把汽油倾倒在电台门口的木桥上，点燃后匆忙逃跑。留守小组的人马上勇敢地冲了上去，迅速扑灭了火焰。为了保证解放军的安全通过，迅速追歼顽敌，地下党员还切断了发报台周围高压电网的电源。

5月25日下午3时，人民解放军攻占真如发报台，电台报务员用简便公电“Xa”率先向世界各地发出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同时收到不少电路发来回电，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月27日，上海人民沉浸在庆祝解放军的欢乐之中。在中共真如分区委的领导下，真如发报台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周围农村的党员，共同组成了人民自卫队，日夜守护着电台。

解放后，真如国际电台举行护台庆功会，900多名职工中有342人立功受到表彰，管理工程师卢宗澄荣获护台特等功。

黎明前的战斗 迎接上海解放

——记地下中共沪西区委

为了解解放前夕地下中共沪西区委等情况,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91岁的施惠珍,她曾任中共沪西区委委员、宣传部长。

1937年11月,她就读中华女中,参加了该校“学生协会”。次年3月,该校老师毛道逊介绍她参加共产党,下半年任“学协”女中区党团委员、书记。1940年冬,任女中区委委员、书记。1948年4月至6月,她受党组织派遣赴香港学习,学习班总负责人是刘晓、刘长胜、钱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主要学习了毛主席1947年12月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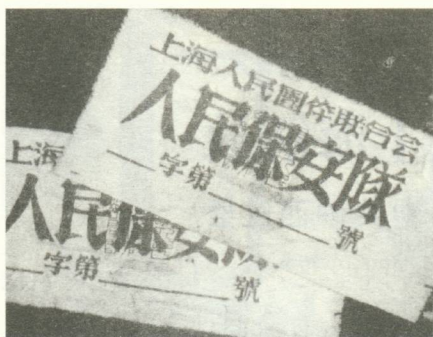
同年10月,施惠珍到沪西区委工作,任地下党民营棉纺委员会委员。区委领导机关地址在江宁路1353弄泰来坊某号二楼,这是一个朝南的石库门楼房,普陀区至今唯一保留下来的地下党区委机关所在地。

施惠珍经组织介绍,与沪西区民营棉纺委员会书记周小鼎、委员钱希均(原毛泽东弟媳)夫妇接上组织关系。不久,正式成立沪西区委员会。夏明芳为区委书记,周小鼎任副书记,施惠珍、王关昶为委员。上级领导人主要是马纯古(张祺曾短期领导)。不久,周小鼎被人盯梢,上级决定放弃泰来坊办公地点,换了好几个地方,安排周小鼎和钱希均到浦东去工作。

为了重建区委机关,上级在小沙渡路(现西康路)药水弄买了一幢二层楼房子,施惠珍和王关昶为夫妻,王关昶以小老板的身份出现,为了合法掩



位于原戈登路泰来坊16号的中共沪西区委旧址。(右一为原区委书记夏明芳,左起为区委委员王关昶、施惠珍)



沪西区委
组织的人民保安队
袖套

护,马纯古决定将施惠珍母亲接来机关住,并让她照顾家庭和帮做家务。后来上级还调来一个年轻女党员,担任区委保卫工作,对外称保姆,从而组成一个合法家庭,掩护区委机关。后来陆续增加区委委员安中坚、李德鸿,5名区委委员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为迎接上海解放,沪西区委开展了大量工作:

一、积极慎重地大批发展党员和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当时人心向往共产党,形成沪西党组织大发展时期,经过基层斗争和实践的考验,到上海解放时,沪西区发展党员 1194 名。同时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工厂里,吸收具备条件的工人参加“工协”;在学校里,成立“新青联”;在居民区里,发展“贫民团”,约有 1200 余人;在职员中发展“职协”,在中纺系统中高级职员中发展“小纺协”,在教师中发展“教协”等等。

二、配合解放军,里应外合迎解放。针对敌人垂死挣扎的图谋,如拆迁机器,搬运物资,转移资金,破坏工厂等,区委对策是揭露他们的破坏阴谋,发动群众,提出“反对拆迁机器、反对搬运物资、反对转移资金、反对破坏工厂”的口号,要求护厂、护校、护店、保护地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各项斗争,以完整地保护上海,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这是最好的“里应外合”。

三、摸清敌情,开展社会调查。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全面调查,如敌警备司令部在沪西第一稽查大队配备的装甲车数量、全区的伪警察局、武器装备数量,敌产和重点设施、官僚资本企业以及交通要道、桥梁地图等,以利于我军行动。还对军、警、宪、特等机关人员和动态进行调查。区委将所有调查资料,全部交给上级,转给解放军参战部队。

四、建立人民保安队,配合解放上海。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的指示,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副书记马纯古决定设立地下武装总指挥部,建立地下人民保安队。为了统一指挥,建立了人民保安队沪西指挥部,王关昶任区总指挥,下属 50 多个大队,约有 2 万人民保安队员(包括人民宣传队)。人民保安队员仍以护厂队员的名义,进一步加强护厂、护校、护店、保护重点设施,以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为加

强对苏州河北地区的领导,区委决定成立浜北分区委,顾松盛为分区委书记(兼任人民保安队第五分区政委),委员陈宝明、杨汉品和何其友,负责浜北地区工作。人民保安队员做了大量工作,如保护设备,分化瓦解敌人,搜捕残敌流氓,争取资方人员,向导带路,宣传救护等。

施惠珍回忆,当时解决苏州河北的部分残敌的战斗,惊心动魄。盘踞在大隆机器厂内的国民党残军团长,几次企图烧毁和炸

毁造币厂桥,以阻止解放军过河,均因宜昌路消防队的瞭望塔和上海啤酒厂屋顶上解放军密集的子弹封锁了整个桥面,使得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

厂地下党支部认为,如果国民党残军继续顽抗,眼看大隆厂要变成战场,将要回到人民手中的宝贵财产也会毁于一旦。党支部决定利用暂时停火之机,对国民党残军进行劝降。地下党员戎绍增、夏振球、李锦海等人找到国民党敌军团长,向他指出,上海市区已经解放,你们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顽抗是一条死路,只有投降才是唯一出路。敌军团长见大势已去,只得缴出自己的手枪,并下令投降。

戎绍增等人见状,立即把值班室内的白被单扯下,用竹竿挑出去。此时,驻厂敌军乱作一团,四处逃窜,大肆抢劫一墙之隔的中央造币厂仓库内的银圆。大隆厂的人民保安队紧急出动,从敌人身上搜出无数银圆。敌军士兵在厂里抢夺工人的自行车,准备逃命时,保安队趁机拿出工作衣和旧衣服,换取敌军士兵手上的武器,很快结束战斗。中纺二厂、同兴被服厂、福新面粉厂等许多苏州河沿岸工厂都发生过类似的战斗。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大家都在热烈欢迎解放军,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施惠珍等又开始新的工作,领导沪西人民维护社会安定,反敌特假接管,恢复生产等。1950年7月她到中共江宁区委任区委委员、宣传部长,1952年底调任中共上海市纺织局党委委员,1954年调任上海市纺织工会任副主席、主席,上海市总工会生活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文革”后任上海市仪表局党委顾问。



原区委成员走访位于药水弄 138 号
原沪西区委遗址附近的群众

迎接曙光战斗 热血遍洒故土

——记解放前夕沪西牺牲的烈士

1949年5月初,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沪西的一批革命志士在黎明前的夜幕下,怀着对党崇高的革命信念,秘密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有的置身龙潭虎穴,以各种方式与敌人周旋,保护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有的奉组织之命,潜伏敌特心脏,进行策反工作。胜利曙光来临之前,许多同志不幸被捕,大义凛然走向刑场,以年轻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首悲壮诗篇。

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

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钱凤岐、刘家栋进入普陀路警察分局。钱凤岐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以警员身份秘密搜集情报,传递给党组织。刘家栋以监察文教和社会秩序的警察身份,秘密从事保护民众的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钱凤岐以拉胡琴、唱京戏的方式,把警员吸引到自己的宿舍里,传播国民党在前方惨败和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中共上海警委从电台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后,立即油印2000多份。



钱凤岐烈士



刘家栋烈士

钱凤岐、刘家栋接受分寄任务,迅速将布告附上警告信,寄到警官和特务分子家中,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在警察局内部引起极大震动。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暴跳如雷,连续下达几个训令,责令迅速破案,并在警察系统内疯狂搜捕。5月13日,敌人找到

地下党发信的破绽,当晚逮捕了钱凤岐、刘家栋,同时被捕的还有潜伏在杨浦分局的中共党员钱文湘、进步青年蒋志毅。毛森连夜主持审问,一周内接连审讯几十次,轮番严刑拷打。钱凤岐等人宁死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5月20日,解放军的炮声传到上海,钱凤岐等人却被杀害于闸北宋公园,被称为“警委四烈士”。

深入虎穴的沪西“余则成”

1949年秋,中共华东联络站为解放上海对敌斗争工作的需要,选派江苏省宿迁县农会主任、宣传部长徐海峰到上海,配合江华、扬帆搞地下敌工工作,秘密从事对敌策反工作。徐海峰先后在沪西被服一厂、三厂、袜厂等单位做工,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他多次叫爱人方秀珍到国民党军官家里当女佣人,以便获取敌人机密文件。



徐海峰烈士

徐海峰通过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的人际关系,搞清了国民党江苏省的组织情况,保存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重要档案20余箱。他在敌人内部积极进行策反和瓦解工作,赶到杨树浦找国民党连长叶叔友谈话,动员他带领全连官兵起义。

上海解放前夕的5月13日,徐海峰、方干卿、方云卿和樊锡瑾等一些地下党同志以搓麻将为名到杨树浦开会,被策反的国民党连长叶叔友也在场。正在开会之际,他们的行踪被敌人侦破,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其施尽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火烫等酷刑,他们咬紧牙关,视死如归,坚决不吐露机密。5月20日,丧心病狂的敌人将他们全部杀害在闸北宋公园。

抵制搬迁,保护工厂

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拆迁中纺一印染厂先进机器设备,运往台湾。地下党组织利用中纺公司发给各厂进行护厂的通知,争取护厂合法化、公开化、群众化,抵制搬迁,保护工厂。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秘密利用厂里印染设备,印制了“上海人民保安队”袖章。上海市

区解放时,上海人民保安队戴上此袖章,保卫上海,维持社会秩序。

第一印染厂党组织地下斗争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5月23日上午,国民党普陀警察局指定第一印染厂工会理事长杨善去谈话,她机智地甩掉敌人的纠缠。下午,警察局出动“飞行堡垒”及近百名便衣武装特务包围第一印染厂,搜捕杨善,没有得逞。特务们痛骂下属连一个共党也管不住,闯到工厂一印加工场,逮捕了19名工人。沪西解放之前,5月24日,凶残的敌人杀害了地下党员、工协会负责人孙方璟和工会积极分子张如松、李阶平。

郭教授坚贞不屈

大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郭莽西,思想进步,积极抗日,反对国民党官府的腐败。在大夏任教期间,担任京沪铁路局警务处专员,在路警中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揭露腐败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被国民党特务视为眼中钉,重点控制的对象。

1949年5月10日,郭教授在寓所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接连遭受酷刑,他坚贞不屈,以死抗争,5月20日被杀害于宋公园。

保护家园的好战士

陈仲信是省吾中学学生党员,参加人民保安队,担任副大队长,泰利机器厂工人党员鲍雪根任大队长,该大队由爱群夜校联系的工厂职工所组成,担任中山公园至周家桥一带的社会治安任务。

陈仲信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暗藏在碉堡里的残敌枪弹击中,鲜血渗透了外衣,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经受生死考验 诞生监狱之花

——出狱合影的故事

1949年5月，解放上海的战斗硝烟还未散去，一批革命志士走出提篮桥监狱，留下了一幅珍贵合影照片。不久，刊登于首期《人民画报》。1988年，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也选用了这幅照片。

2000年，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纂《巾帼摇篮》时，访问了照片中后排右起第2位的杨杏轩。当时，她是沪西工足袜厂地下党支部书记，1948年2月被捕。回忆这张照片时，她说：“这是补拍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后，“我们这些政治犯很快就被党组织甄别解救出来，走出监狱大门。很快，陈毅市长知道我们已解放出狱，但当他得知我们出狱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照片，立刻命令补拍，必须留下我们走出监狱获得解放的新生和革命者的豪迈气概，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来也能从照片上看到革命先驱者的苦难，分享从敌人魔爪中解放的欢乐。我们都是从监狱到家的革命者，当组织上要我们立刻回到提篮桥监狱拍照，我们是特别的高兴和兴奋，有的怀抱在狱中生的孩子，有的拎着狱中衣服网袋，就这样，作为出狱的难友代表，我们大家合了一张影。”

接着，杨杏轩又谈起

在陈毅市长的安排下，走出提篮桥监狱的革命同志合影留念



当年被捕一事。

1948年初，短短5天内，上海连续爆发学潮、舞潮、工潮。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加紧镇压民主运动。

3月20日，因叛徒出卖铁路系统党组织，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委员王中一被捕，敌人从他家中搜出党的文件和党员名单，如获至宝，断定王中一是共产党重要干部。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急电蒋介石称，破获“共匪”工运机关，搜出有关名单、组织计划。21日深夜，进行全市大逮捕，由于有少数人自首，敌人又乘机扩大范围抓捕。

杨杏轩说：“我是丝织业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是敌人重点搜捕对象，就这样被抓进去了。现在党史公开了，我知道在21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从警委系统得到王中一被捕的消息，情况严重，立刻告诉工委书记张祺，张祺没有停留片刻，立刻紧急通报工委成员，决定当即搬家、分散隐蔽，同时紧急通知工委所属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员暂时躲避，不要在家过夜，作好应付敌人突然袭击准备。

就是在如此紧急的疏散中，还是有156人被捕，不久又波及王孝和被敌人枪杀的事件。这是抗战初期地下党组织重建以来遭受最惨重的损失。我和许多被捕人员关进提篮桥监狱，受尽迫害。”

“这张照片上出狱的人，大多是沪西工厂的难友，几十年后，我还能记得一些同志名字，前排右起：王文娟（沪西丝绸厂工人）、张银花（亚美四厂工人）、徐惠芳（镗大袜厂工人）、俞玉燕（大诚绸厂工人）；后排右起：刘翠英（大统被单厂工人）、杨杏轩（中共工足袜厂地下党支部书记）、华玲珠（大统被单厂工人）、郑玉敏（电话局职工）、徐喜娟（中共亚美九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赵金妹（大统被单厂工人）。解放后，照片上的我们，有些同志担任了领导干部，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是《文汇报》的报道



陳市長訓示舊人員各安職守辦理移交

國民黨反動政權滅亡 上海人民市政府成立

（本報訊）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已於十八日開始接收舊上海市政府、國民黨反動政權，已滅亡，上海人民市政府即日正式成立，市長陳毅，副市長曾山。潘漢年、章詒，均已到職視事。二十八日下午二時，陳毅市長召集舊市政府各廳處長及各局局長各處長等開會，到三廳處長。陳市長指出：上海市的解放，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捩點，幾十年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上海，今天已成爲人民的城市，希望大家各守職守，服從命令，辦理移交，協助接管，并繼續政府業務。會後副市長潘漢年、章詒接見舊市政府各局處長聽取意見。現各局處之接收工作，正在有秩序地進行中。

有的做了教师，不少同志已离休，有的已经病故。”

关于照片上徐惠芳怀抱的孩子一事，杨杏轩回答说：“可怜啊，这孩子是生在监狱，他到世界的第一站就是人间的地狱，睁眼看到的第一眼，就是铁窗牢笼。其实被捕抓进监狱的孕妇不止照片上的一位。”杨杏轩推荐一位难友龚文新，请她介绍狱中生子的情况。

龚文新原是沪西章华毛纺一厂的地下党员。1948年初，被党组织调到沪东章华毛纺一厂工作。她说：“我先被关进福州路市警察总局，被关的女牢只有10多平方米，此时已关押20多人，我是被硬塞进去的，几无立锥之地。关押的人员很复杂，有像我们的政治犯，也有窃贼、流氓。人们只能轮流睡觉。第10天，敌人审讯我，问是否是共产党，我说不是，就遭敌人一顿拳打脚踢，还上电刑。后来我被关进提篮桥监狱，又陆续抓进几个，其中连我在内，共有4个孕妇，另3个是镔大袜厂徐惠芳、工足袜厂俞祥宝、亚美绸厂卫星贞。这里条件比警察总局稍好些，每人有一张破铁床，每天吃两顿，上午薄粥汤，下午霉变石屑黄糙碎米饭，小菜是臭咸菜、萝卜干，同样是吃不饱、饿不死。在监狱里，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终于有一天，肚子开始疼痛。我因是第一胎，对生孩子很恐惧。监狱里没有医生来接生，同牢的姐妹与我一样，也是第一次怀孕，都不懂接生。最后，我还是自己艰难地把孩子生出来。这孩子骨瘦如柴，头顶心凹陷如碗口，连第一次哭声都是微弱无力。因我受敌人的酷刑，严重缺乏营养，没有一滴奶水。这时被我们感化的监狱牢工产生恻隐之心，悄悄地找来一块破布，把瘦骨嶙峋的婴儿包裹起来，在厨房里偷偷地熬些骨头汤代替奶水供婴孩充饥。我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蜷缩在破床上，孩子拉屎撒尿没有水洗，也没有尿布可换。没几天，孩子生了褥疮，我也染上了疥疮，可是我们是在监狱里，没有医生来治疗，靠的是我们难友相互关心，共渡难关。”

亚美绸厂的卫星贞与我是差不多时间生下孩子的。她与我一样是生的男孩。为了永远不忘这苦难的日子，我和卫星贞决定要将在监狱里的孩子起个响亮的名字。经过再三斟酌，卫星贞的孩子起名叫志刚，我的孩子名叫志强，用意是立志革命，为了我们的事业要勇敢刚强地奋斗到底。在狱中，我们立下誓言，要教育我们的下一



上海人民夹道欢迎解放军游行部队

代牢记血泪仇，长大后，继承我们的革命传统，做一个意志刚强的革命战士。后来，徐惠芳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叫理黎，以表示为真理而坐牢，迎接黎明前的战斗。俞祥宝生的一个女孩叫监花，以纪念苦涩中的监狱之花。

“我们在狱中，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临近最后覆灭之时，我们也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的杀害，曾经密谋越狱，只是形势错综复杂，未能实行。后来大概过了2个月，敌人的特刑庭又对我进行审讯。我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法官恼羞成怒吼叫道：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要判你的刑。结果，我们几个孕妇都被判了刑，俞祥宝因病出狱不久就病死，她的女儿也随后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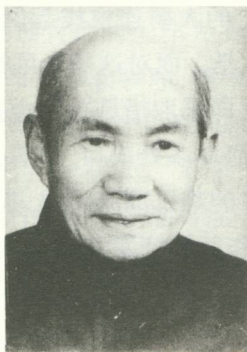
龚文新的回忆，很快整理成文，题为《狱中生子》，编入《巾幗摇篮》一书。现在，再次翻看那张珍贵的出狱合影照片，令人感慨万分。

齐心稳定治安 加紧恢复生产

——记解放初接管普陀区

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多次专访原普陀公安分局局长董镇，了解解放初接管普陀区的情况。

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沪西地区按原上海市行政区划分别设立了普陀、江宁两个区接管委员会。1949年5月28日，市军管会任命赵虞为接收国民党普陀区公所接收专员。



普陀区接管专员赵虞 区公安分局接管专员董镇

当天下午，国民党普陀区公所区长

郑步樾，副区长沙恩溥在玉佛寺将区公所印信上交赵虞专员。6月3日，市军管会正式宣布普陀区接管委员会成立，由赵虞、范国章、董镇三人组成。任命赵虞为接管委员会主任，范国章（驻军代表）、董镇（区公安分局局长）为委员。接管委员会作为全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秘书室、民政股、文教股、调解股、户政股，直接处理和接收本区的行政事宜。接管委员会办公地点在槟榔路（今安远路）玉佛寺佛学院内。

1949年9月24日，区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区委书记吴亮平传达了市委规定的区委基本任务，并根据本区特点，确定了工作方针、重点。即依靠工人阶级，团结贫民、学生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联合民族资本家，孤立瓦解敌人，打击首要分子，使广大群众能稳固地在我党领导下，完成党的各项工作。

齐心协力 克服灾情

上海刚解放，灾情严重，难民较多，政府经济困难。1948年因农村

遭受水旱灾害,以及皖北、苏北因战争而逃来上海的很多难民都住在位于苏州河两岸的普陀区。为了解决难民问题,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曾邀请了全市公益团体举行会议,商讨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问题,最后决定发动社会公益团体捐助款项救济难民,以使他们能早日返乡生产。遵照市军管会的指示,普陀区进行了捐助救济和疏散难民的工作。当接管委员会同志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不料一场大台风加暴雨日夜袭击上海,苏州河水迅速上涨,长寿路西康路水深过膝,许多人行道上的大树连根拔起倒地,导致车辆无法通行,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面对这场台风暴雨的袭击,市军管会非常重视,指示各区接管会立即采取措施抢险救灾。当时黄浦江和苏州河水上涨,阴沟倒灌,郊区海堤多处决口,接着台风暴雨又袭击了苏皖等地,使原来已经疏散回乡的难民倒流回沪,普陀区难民陡然剧增,情况相当严峻。于是,接管工作就围绕发动群众,进行互相抗灾,抢修倒塌房屋,使灾民有所栖身进行。同时,区委组织干部不分昼夜深入到棚户和苏州河两岸的船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虽已发动一些公益单位进行捐助,但社会救济和疏散难民的经费仍是严重不足。同时,上海治安问题也比较严重。区接管委员会立即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领导当机立断,指出:问题非常严重,必须设法解决社会救济经费不足的大问题,决定动员社会力量解决救灾问题。把本区的大、中型工厂的老板邀请来开一个座谈会,发动他们捐钱,以解决社会救济问题。座谈会如期举行,区委书记吴亮平亲自到会,他在会上饱含深情地对到会者说:“我区这么多的灾民,白天乞讨,夜晚露宿,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冻死饿死。今天请大家来是要求大家慷慨解囊踊跃捐助,救济一下我区的灾民。”吴亮平言简意赅,话音刚落,新裕纱厂凌东林带头捐出一笔数字可观的巨款。在凌东林的带动下,申九、统益、安达、达丰、福新等一些大厂老板都相继捐出巨款,随后中型厂的老板也纷纷捐了款。这样,一次精心组织的社会救济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使我区没有一个灾民冻死饿死。

肃清匪特 稳定治安

普陀区是上海的边缘城区,社会治安情况十分复杂。刚解放时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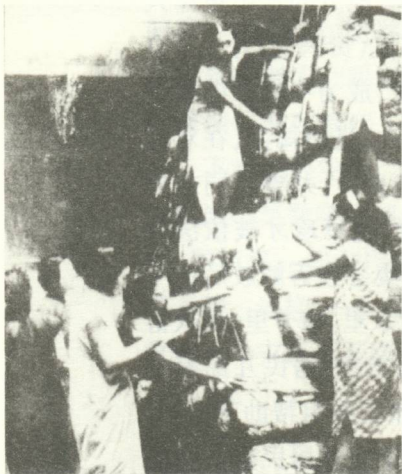
会上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况,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敌特分子,有的公然冒充政府接管部门或党的组织来行骗。普陀区为了解决治安和稳定的问题,组织了地区贫民团,他们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如为解放军带路,配合解放军肃清匪特,抓人、缴枪等。贫民团、人民保安队人数很多,后来不少被吸收到公安部门,成为公安干部。吴亮平还亲自出面与部队联系,把贫民团的积极分子输送到九兵团、十兵团等部队中去。药水弄有一个大恶霸朱启桢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当地老百姓提起他,既痛恨又害怕。于是接管会的工作人员准备到药水弄走访大恶霸朱启桢,要他协助接管会维持社会秩序,搞些社会福利及救济工作。走访前,赵虞和范国璋两位领导对接管会的同志交代:“不能一人进药水弄。要去,得叫几个便衣与你们一起去。”后来,接管会的同志带了一名叫朱光祖的干事,此人是朱启桢的一个远房侄子,陪同去了药水弄。去后,朱启桢把接管会的同志作为上宾接待,并令其徒弟在住宅周围警卫。我接管会同志向他交代了任务后就告辞了。回到接管会,赵虞、范国璋听取汇报后十分高兴。赵虞对接管会同志说:“你是第一个进药水弄的,我们要趁热打铁,找药水弄的地下党商量一下,把药水弄的社会渣滓清理出来,把群众发动起来。”

1949年6月,接管委员会在药水弄建立了第一个普陀区接管专员办事处,紧接着又建立了三个办事处。接管办事处建立后,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好老百姓的用水问题。当时,有些地方的水站被坏人把持着,老百姓反映强烈。1950年的上半年,东京里(贵华里)有一个自来水水站的霸头叫赵亭珍,他欺压百姓,贪污水费,成为一霸。办事处出面查账,他纠集了社会上一批残渣余孽二三十人,进行捣乱,在对其查账的过程中,还公然到市法院状告办事处工作人员,办事处同志开了介绍信前去出庭应诉,向法院如实介绍了情况,赵亭珍才被依法收监。1950年1月8日,安远路锦秀里3千多居民集会控诉解放后仍不悔改的旧甲长勾结敌特势力欺压居民。附近的东京里、梅芳里、石灰窑等居民群众也纷纷起来进行反霸斗争,里弄开始组织“居民互助筹备会”、清洁卫生及冬防小组,废除旧保甲制度。在市工作组帮助下,1951年6月8日,梅芳里居委会成立。这是全市第一个建立居民委员会的里弄。

克服困难 维持与恢复生产

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旧上海,是一副烂摊子,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由于国民党长期统治的掠夺和破坏,造成了生产停滞,物质匮乏,资金短缺,工厂倒闭,商业凋敝,全上海市失业工人、店员连同其家属达42万人,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另一方面,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对上海口岸实行海上封锁,空中轰炸,企图切断运输线,断绝粮煤及工业原料的供应,炸毁电厂,造成“车船不使,电灯不亮,机器不动”,从经济上窒息新生的上海人民政权。能否迅速恢复生产,这是关系到能否冲破敌人的封锁和轰炸,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大事。根据中央的正确决策,上海的接管工作吸取了接管沈阳、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成功经验,贯彻了“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方针。沪西地区作为工业重地,积极响应中央的政策,至6月16日,沪西地区私营纱厂有55家,很快恢复了生产,加上正确执行了党的“劳资两利”政策,工人工资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工人满意,情绪稳定,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各私营厂从原来日产约1930件,增加到1970件。纱锭数和生产率均超过解放前水平。解放初期,全区棉纺织业在全市棉纺织业中的比重,纱锭数占42.8%,织机数占40.9%。面粉业生产能力占全市面粉业的80%。全区

工人清点
物资,协
助人民政
府接管



职工9.27万人,其中纺织职工6.64万人。国家接管了13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起第一批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在整个接管过程中,中共沪西区委实施了强有力的领导,加强了对党员、干部教育,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士,克服困难,共渡难关,以夺取生产建设的胜利。

由于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才使得解放初的普陀区尽快走出困境,为上海的整体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改善人民生活 巩固新生政权

——记解放初首任普陀区委书记吴亮平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8月6日，市委决定市区建立9个区委，吴亮平奉中央之命，到上海沪西，9月2日，正式被宣布任命为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书记。1950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以行政区为区域重新调整区委，吴亮平出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直至1951年5月离任。



吴亮平曾工作过的原沪西区委旧址

吴亮平在沪西和普陀一年零八个月的任职期间，培养出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并带领全区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为全区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所呈现内涵极其丰富的执政能力、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为我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有历史的借鉴作用。

打一场恢复经济的人民战争

吴亮平初来乍到沪西，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克服困难，安定人心，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沪西是上海经济命脉的大工业区。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美国即指使国民党蒋介石公然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妄图把新生的上海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当时上海重要工业生产原料大部分依赖国外，沪西是工业区，棉纺织业所需原棉60%靠进口，毛纺织业全部靠进口毛条维持生产，面粉原料全靠洋麦，造纸业完全依赖进

口纸浆，卷烟业半数以上的烟纸、烟丝是进口的，甚至全市人口赖以生存的粮食，50%-60%靠洋米、洋面来维持。美蒋的封锁、轰炸和暗藏的敌人破坏，给工业生产带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全区 860 家大小工厂（其中 30 人以上工厂为 200 多家）原料短缺、销路呆滞、资金匮乏、供电不足，特别是占全区工人总数 80% 的私营厂，工人生活已陷入难以为继的程度。申新第九棉纺织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纺织厂，有纱锭 13 万，5400 名工人，半年时间亏损额竟达折合棉纱 2000 件。崇信纱厂资本家出走香港，生产全

线停顿，2000 多工人生活无着。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敌特分子借机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吴亮平坚决执行中央、华东局和市委的指示，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士，以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和清醒的头脑、灵活多样的策略，打一场恢复生产的人民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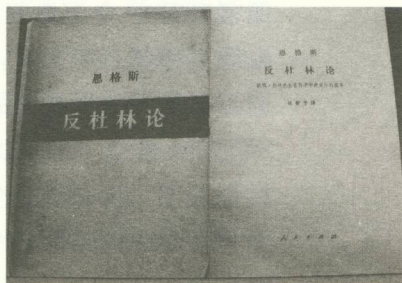
沪西地区党员 85% 在工业系统，为此，吴亮平与区委其他领导成员决定在支部委员一级办学习班，统一全区干部思想，又在夜党校连续举办 3 期有 2700 名工厂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培训班，为发动全区人民生产自救准备了干部队伍；同时，派出工作组到基层建立工会和青年团组织，为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准备了战斗指挥部和战斗员；多次举办职员学习班，团结、教育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让他们与第一线的工人站在同一条战壕，为经济的复苏献计献策；团结教育资本家，鼓励他们为维持生产多作贡献。在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生产开始恢复、社会秩序得到整顿、民心趋向安定。1950 年 10 月，抓住棉花秋收后农村市场出现的机遇，积极推动已停工的纱厂恢复生产。到 1951 年 3 月，吴亮平离任前，全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已出现了新局面，为全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亮平
与夫人
杜凌远
在解放
区

理论联系实际 加强队伍建设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加强党的队伍建设是吴亮平戎马一生的宝贵经验。吴亮平到沪西后，重点抓的是建立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干部队伍。吴亮平上任伊始，注意对全区干部的组成和思想状况作深入调查。区的干部大多数来自沪西地下党，他们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不足之处是许多同志没有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缺乏执政的领导工作经验；区里还有一批来自随军南下的干部，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考验，视野宽广，但对本区人文历史和社会风俗习惯了解甚少，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都有各自不同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和生活习惯，如何把大家在工作上、思想上凝聚在一起，这是吴亮平深思的大事。他要求区委领导成员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和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共同战斗。针对干部思想实际，他强调，干部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而脱离群众。为了教育干部，能把大家思想拧成一股绳，吴亮平不辞劳苦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大会报告、小会辅导、个别谈心，在全区培养了一支作风好、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其次，吴亮平身先士卒，深入实际，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建国初，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任务异常的艰巨和复杂。吴亮平身负区委书记的重任，时刻牢记党的中心任务，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到区的大街小巷、工厂学校实地调查研究，注重在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点带面，指导工作。在部署全面工作时，反对照本宣科的空泛教条主义，要求区委领导成员和广大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他率先垂范、夜以继日地与大家个别交换意见、促膝谈心；针对干部和群众思想实际，精心准备，多次亲自给同志们作形势和任务、党风建设的报告或上党课，他的理论联系实际做法深受大家的欢迎。



吴亮平翻译
的反杜林论

高超出色的领导艺术

吴亮平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以深邃的哲学思维，观察每个历史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善于从纷繁杂乱的现象中，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筛选最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剖析，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他的这种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出色的领导艺术的结合，在沪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胸怀全局，高超的领导能力。1950年6月，美国突然发动侵朝战争，10月，我国政府毅然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务、匪徒谣言蜂起，一度在市民中造成思想混乱。“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很多人存在的焦虑，害怕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会“惹火烧身”。面对大敌当头和人们的疑虑，吴亮平从教育入手，精心部署全区抗美援朝宣传的教育工作，亲临统益纱厂大礼堂为广大干部群众作形势报告，组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青年学子作控诉美国侵华种种罪行的演讲，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广大党员群众纷纷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在全区掀起了抗美援朝、报名参军和发起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大家对区委书记吴亮平的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非常佩服。

二、注重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吴亮平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干部的思想工作。有位干部在谈心中袒露自己有“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的缺点。吴亮平对这个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个人的本领再大，也不及人民群众的力量大。你一定要目中有人，切不可狂妄自大、自由散漫。至于不拘小节，不一定是坏事，拘泥于小节的人往往会谨小慎微，办不了革命大事，成不了好战士。但是不拘小节要以不损害别人的、集体的利益为度，否则就是大节。”字字珠玑，言简意赅。他既给人以教益，又从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锋芒毕露。他的谈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也不强求于人，而是耐心细致地做团结

教育工作。他凭其坚定的信念、明澈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说理和自己的模范行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沪西许多工厂的旧职员是企业的管理层，其中技术干部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代表厂长对工厂实行管理，也是工人的直接管理者。上海解放后，国家对他们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里，旧职员代表资方压迫工人，长期以来劳资矛盾尖锐，工人群众从思想上、感情上不愿接受旧职员对工厂的管理，对立情绪相当大，这在沪西已成为普遍的问题。吴亮平以求实精神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教育工人要做工厂的主人；同时，又紧紧抓住对旧职员的思想教育，要他们真心实意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再教育。但他们思想顾虑重重。吴亮平加大对旧职员的思想教育的力度，多次为他们举办学习班，请专家给他们上课。吴亮平也亲自给他们作报告，在统益纱厂礼堂召集全区范围内各工厂的职员大会，对他们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宣传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强调工厂职员必须重视自己的学习，自觉改造，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来管理生产、管理工厂。吴亮平针对职员的思想实际，严肃地批评职员中存在的“一分行情一分货”，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雇佣思想。在这同时，他高度重视落实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会上他代表区委宣布：“你们过去是资本家的工具，今天已成为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要坚决地同工人群众站在一起。”吴亮平的报告切中职员思想要害，振聋发聩，反响很大。许多原来思想顾虑重重的旧职员说：“这些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一定要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做工厂的主人。”吴亮平的报告争取和团结了职员，既教育了广大旧职员，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又改善了工人与职员的关系，推动了后来的工厂民主改革，加强了企业管理。

四、博采众长、虚怀若谷的开明风度。吴亮平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但为人谦虚谨慎，注重自身修养和形象。在区委，他从不包打天下，而是充分发挥一班人和全区党员干部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领导班子里，他是领导，但不做家长，书记和委员是平等关系，实行民主集中制。对副手和部下，按照分工，充分放手，但又不放任；

执行任务，态度坚决，但又反对照搬照套。建国初，沪西需要大批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岗位，他坚持到战斗的基层第一线去蹲点，发现苗子、培养干部。他特别重视在工人中选拔干部，坚持重才更重德。在吴亮平的积极努力下，经过培养和磨练，沪西区人才辈出，为全市、全国输送了大批干部，他们在祖国各地的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性修养和人格魅力

长期以来，吴亮平自觉地注重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提升了他坚韧不拔的忍耐力、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襟怀坦荡的人格魅力。

吴亮平曾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早在 20 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因坚决抵制王明拉帮结伙的宗派活动，多次遭到握有党内大权的王明的打击和迫害，但吴亮平始终坚忍不拔地与王明作斗争，同时又顾全大局，积极为党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翻译了被毛泽东称赞为“功不在禹下”的《反杜林论》；继续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在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讲马列主义理论课，发挥了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克己奉公、把自己一切献给党的模范作用。1940 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同志作平反谈话，推翻王明强加的一切诬蔑之词，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恢复吴亮平一切领导职务。延安整风后，毛泽东

考虑要加强干部学习理论，但是很多马列著作还没有翻译过来，曾与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商议成立一个马列著作编译部，请吴亮平出任部的负责人。但是吴亮平一再表示，要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他先到晋西北，后来又

吴亮平
与家人



全国解放后，吴亮平服从中央的安排，到上海最需要干部的第一线沪西区委工作。在沪西，他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以其特强的党性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沪西的老同志怀念吴亮平，颂扬他的伟大寓于平凡之中，赞美吴亮平在沪西以自己特有的人格魅力呈现了他那高度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的风范。

人们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丰功伟绩。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党员干部的身份与同事打成一片，倾听别人意见，即使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也宽厚相待，以理服人。

不少人认为他是区委“一言九鼎”的大干部，而与他相处较久后，才知他是个温文尔雅的“大官”，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好官，他与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情同手足，人们喜欢与他为伍，同工作共战斗，称颂他具有从善如流、朴实无华的品格。

人们赞美他是知识渊博，诲人不倦的长者。吴亮平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但仍勤学苦练，在百忙之中还重新校译出版《反杜林论》，满足科研单位和读者需要。他十分关怀工人渴求文化的要求，特设区委职工教育组，指导工厂组织工人文化学习班，组织班组读报会。他善于运用切中时弊的语言，号召人们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进行自我改造，“修身养性”。

吴亮平离开普陀，又先后在党和国家许多工作岗位上披荆斩棘，为祖国出色工作，但他又几遭磨难，死而复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是垂暮老人，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时，还情系沪西，四次到普陀区给老战友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新政；他奔走祖国各地，给历次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抚慰伤痛，落实党的政策。大家盛赞这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道德高尚、永葆青春的革命者。

1986年10月3日，吴亮平病故于北京。中共中央评价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人生多彩，留芳永久。

普陀人民选举 深情寄予厚望

——记陈毅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

1954年7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在普陀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摘要。陈毅市长说:“我首先要对我这次在普陀区被选为市人民代表,表示

感谢。我感谢全体代表对我的信任。这种信任,并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今天取得了普陀区全体人民代表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是我们党的光荣,也是我个人的光荣。这种光荣,表示着人民交给我们的责任加重了,我个人应尽的义务也增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在接受人民的信任和人民所给的光荣的时候,感到责任重大和我们应该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应当向你们保证,我将坚持不懈地坚决完成各位对我的委托。”



时任上海市
市长的陈毅
在大会上作
报告

这是难忘的日子,也是普陀区人民的光荣。1954年7月,普陀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陈毅市长被提名为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普陀区市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这也是以后部分市委领导作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放在普陀区选举的开始。1956年选举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陈毅市长又一次由普陀区人民代表选举。此时,陈毅市长已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上海市市长。这一届区人代会大会除听取区政府工作报告等议程外,还要选举普陀区出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7月12日，大会议程是选举市代表。区人代会的会场设在刚落成的普陀区政府大礼堂（今普雄路29号）。当天大会执行主席是张敬焘（中共普陀区委书记、后担任山东省副省长）、毛和林、张一雷、祖张琪。下午3时整，张敬焘宣布选举结果，陈毅等42位同志当选为普陀区出席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张敬焘接着说：应大会的要求，现在欢迎市代表进场与大家见面。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健壮威武的陈毅市长，头戴军帽，身穿草绿军装，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证章，与其他市代表一起进入会场。陈毅市长被请上主席台，张敬焘请市长讲话。陈毅神采奕奕，面带微笑走上讲台，向大家行军礼，会场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毅市长说：“我们国家正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人民有权选举和撤换自己的代表，代表应该对自己的选举单位和选民负责。任何一个人民代表，在当选以后，就必须代表选举单位和选民的意志，参加管理国家事务。这是一个权力，又是对人民应尽的义务，我被各位选举为市人代会代表，就必须根据普陀区全体代表和全区人民的意志，去出席市人代会会议和参加管理本市的工作。我深信：在全体代表和全区人民的支持下，我有信心将完成你们的委托。”

他接着说：“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全体选民和选举单位对于每一个人民代表，在选举代表以后，对代表还有监督的责任。今天我当选市人大代表，我要对选举单位的全体代表表示：我将竭诚欢迎各位对我

1954年7月15日
《解放日报》
关于陈毅同志在普陀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讲话的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陳毅同志在普陀區人民代表
大會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illegible]

的监督。作为一个当选的代表，特别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负责人，我更应当保证，不但我自己，而且要本市所有的共产党与市民对于代表全民意志的宪法草案，采取积极的拥护的态度，并在正式制定后坚决执行。”

陈市长在讲话中还对区人民代表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市政建设、安全生产、文娱设施等许多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问题代表了广大选民的意见和要求，有许多问题应该在最近期间有计划地来加以解决。

他指出，在工业卫生安全生产问题上，代表们反映出某些工厂不重视工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情况。这说明过去这方面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私营毛纺厂、脚踏车厂和公私合营的纱厂等单位，曾连续发生过集体中毒事件；私营纱厂和私营电器厂，由于缺乏高空操作设备，以致发生工人跌伤的事件。这是不符合与违反人民政府劳动保护政策的，同时也是不能提高工人群众生产积极性的。这种情况极不合理，必须很快改变，不能允许继续存在。代表们提出许多改进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我一定将你们的意见提交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来改进这一方面的工作。

“在市政建设方面，代表们反映：自从去年建成长寿路桥后，给市民很大的便利，对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也有很大好处。代表们建议建造武宁路桥，这一意见也是很好的。这座桥的建成，将给浜北浜南的市民、特别是工人同志更多的方便，我已经批准建造武宁路桥。这项工作，我已责成市人民政府工务局负责筹划，督促他们早日完工。”

最后，陈毅市长强调：“我们要为人民做的事很多，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就是我个人认为应该立即付诸实行的。但是确实还有许多具体问题，由于我们的国家刚开始经济建设，需要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因此办事要分轻重缓急。有些问题因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求得解决，例如本区失业工人的就业以及小学毕业生转入生产劳动等问题，这是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应尽很大力量去解决，一方面也只能按可能采用逐步改善的办法，要完全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希

望全体代表要了解这个问题，并且希望通过你们向普陀区全体人民讲清楚，使大家都能发扬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积极劳动，努力生产，逐步改善，服从国家计划的领导。”

陈毅市长的讲话感情丰富，针对性很强，提出具体意见，着重解决实际问题，他的讲话不时被阵阵掌声所打断。他作为普陀区代表，在这期间，为我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实事，政绩有目共睹。

最近，在全国革命遗址普查资料中看到许多材料，其中在四川“陈毅故居”大门两侧，镶嵌着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撰写的楹联：直声满天下，勋业炳世间。这是对陈毅元帅一生的高度评价。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3年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工农红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红六军、红四军政委，红二十二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一书记，上海市第一、第二、第三届各界人民协商会议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外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共中央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

深入基层抓典型 领导全区掀高潮

——记解放初普陀区委书记张敬焘

1951年11月下旬，张敬焘由泰安调往上海工作，一干将近9年。1952年7月至1956年6月，他担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还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沪西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上海市委委员兼市委副秘书长等职。



时任中共博山县委书记的张敬焘

1952年2月底，上海市委将全市157个工厂，按区域、隶属关系和行业系统等具体实际情况，分别成立沪东、沪西、市直属、纺织、五金、钢铁、公用等7个产业党委、由上海市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张敬焘被市委派往市委沪西产业委员会工作，杨士法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沪西的38个工厂工作。按照中央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和市委的部署要求，积极领导“三反”运动。沪西产业委员会一班人正确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市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和规定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原则，经司法部门审判，使真正的贪污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达到了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目的。

同年，根据全市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和更好地管理城市的要求，市委又对部分行政区的区划和党政领导班子作了新的调整。沪西产业委员会管辖的38家企业划入普陀区，7月初，张敬焘被调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转入主管一个行政区的全面工作。

张敬焘与区委一班人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依靠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组织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国营、公营的工商与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比较深入地开展了思想、组织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对广大党员进行了登记、审查处理，

使全区广大党员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加以分析、批判、挖根，不仅进一步增强了相互间的团结、政治上的相互关心，也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同时进行定编和建章立制，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其中制度建设的中心是民主制度，重点是建立党内外民主生活与制度。

1952年11月，全区各级机关和各行各业都建立起了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制度，以及工作、生活、学习及监察和检查等制度，不断推进全区的各项工作。

7月底，普陀区委成立了由张敬焘兼任主任的区委民主改革补课委员会。在此前后，按照市委的组训计划，从各工厂和区直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工人和部分党团员，组成了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190余人工作队，他们分期分批参加了市委组织的集中轮训。这批人员受训后，在市委和区委的领导下，成为推动全区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骨干力量，逐渐成为干部，有许多同志走上了基层的领导岗位，使当时严重缺少基层干部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8月初，区委决定在全区30人以上的206家私营工厂，分四批展开民主改革运动。首先选定申新九厂、统益纱厂、阜丰面粉厂、天一印染厂、环球铁工厂等厂，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进行，约4500名工人参加。抽调190余人工作队队员，经市委集中轮训后派往第一批试点厂工作。每批的民主改革，基本上均参照国营企业的经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发动准备、全面交代、民主建设。

其中第三阶段民主建设，主要是改革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等方面的建设性工作。在普陀区第一批试点的私营工厂中，有的还保留了“拿摩温”和“保单、搜身、监工”等不合理的旧制度。按照市委作出的规定，工作队通过劳资协商，取得资方同意，然后召开工人大会，由资方正式宣布废除“拿摩温”等旧制度。9月中旬，市委发出《关于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建设阶段以建党为中心工作的指示》，普陀区第一批试点的各单位，在工作队的组织领导下，党团组织在这些试点单位有了新的发展，共发展新党员61名，团员119名。

组织第一批试点时，为了抓典型，张敬焘亲自带着几个人的工

作小组，到荣毅仁办的申新九厂蹲点。这个厂时有 6000 多名工人，在全国棉纺行业中是屈指可数的大型棉纺厂，也是荣氏家族办的最大的一个纺织厂。进厂后，根据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的指示，请荣毅仁参加该厂的民主改革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张敬焘任主任，一起参加三个阶段的民主改革，使全厂民主改革顺利开展。荣毅仁的出色表现，被毛泽东称赞为“爱国的红色资本家”。

9 月下旬，普陀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结束，区委认真总结经验，认为较好地达到市委提出的目标要求：一、运动中，通过组织发动广大工人诉苦，控诉、清理思想、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二、理清了职工内部的政治情况，纯洁了工人阶级队伍，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三、改善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发扬民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四、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通过考察和培养教育，发展了一批党团员，进一步壮大了党团组织的力量；五、改选了基层工会，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到工会任职，有力充实了工会组织；六、在棉纺厂废除了“拿摩温”制度，建立了协税小组、政治保卫委员会，订立了治

安保卫制度；七、通过不断与资方等人员的民主协商等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基层的统战工作；八、民主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生产，做到了民主改革与生产两不误。

全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结束后，9 月底至 12 月，区委组织安排了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1953 年初，完成了全区 30 人以上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同年春，完成了全区 30 人以下的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通过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不仅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纯洁了工人阶级队伍，有力发展了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近

1950 年张敬焘与家人的合影



1400名，还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使全区工业企业在政治和生产上都呈现了新的气象，生产与经营获得迅速发展。

全区民主改革胜利完成后，区委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的部署要求，在学习、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推动下，逐步展开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分为四个阶段：宣传教育、落实试点、分批推进和进入高潮。

10月初至11月下旬，通过学习、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组织展开广泛深入的社会教育。全区10万余人参加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会、座谈会等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其中有近6万名产业工人。这进一步增强了全区干部的工作信心，鼓舞了全区广大群众和各阶层人员的生产工作热情，使全区近1000家工业户和2900多家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情况，都比1952年有了显著的转变，被许多上海资本家称为“难忘的1953年”。

1953年11月下旬至1954年2月下旬，通过试点、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制定计划方案、继续深入教育等步骤、方法与措施，为不断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创造条件打基础。进入这个阶段时，区委开始着手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选取了统益纱厂、新裕二厂、崇信纱厂、江南造纸厂、中华书局印刷厂等5个私营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的试点工作。在总路线公布以前，全市私营金融业和65个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为全市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经验。

12月25日，区委召开会议，传达了市委副书记谷牧在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上作的专门报告精神，听取了对统益纱厂、江南造纸厂等4个私营厂近一个月来公私合营的试点情况。根据谷牧副书记的报告精神和先期实行公私合营单位提供的经验，会议结合试点情况和本区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与特点，研究确定分行业制定方案，采取试点等措施，抓典型，树榜样，为今后不断推进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做好准备。

抓好试点的同时，区委部署对于全区工商业的组织领导和对广

大党员与工人、职员继续教育。提出全区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必须保证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任务的顺利进行；保证和监督国家生产计划和加工订货任务的完成；坚决贯彻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继续大胆大量提拔干部，做好干部的调配、提拔、培养、审查工作；坚持“积极慎重”的方针，继续巩固地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密切结合中心任务建党工作，计划全年接收 2300 至 2700 名新党员。



1995 年
张敬焄重
访博山县
委

为此，全区各级党组织展开了极富有成效的工作，重点抓了“空白点”工厂党的组织建设，其工作经验受到市委的重视与肯定，在全市积极推广。1954 年 5 月 20 日，市委组织部批转了普陀区委组织部关于《空白厂建党总结》。

进入 1954 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大力加强私营工商业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搞好生产经营等工作，还根据市委的指示要求，结合全区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加强对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1 月上旬至 4 月底，先后对 1800 多机关干部和 150 多名基层脱产干部以及 56000 多名产业工人和 7000 多名店职员分两批进行教育。4 月底，又开展了以党的基础知识为主的教育活动，至 5 月底结束。

采取以上措施，也有力促进了对统益纱厂等 5 个私营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试点工作。特别是江南造纸厂的试点，工作小组与厂党支部组织工会、团支部的班子成员，一同认真学习中央和市委对资改造的方针政策，加强对全厂工人总路线和对资改造方针政策的学习。利用多种形式，把党的总路线和对资方改造的方针政策讲深讲透，不仅消除了许多人的种种顾虑，还促进了思想转变。特别是该厂资方的主要人员，多是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的负责人。如该

厂总经理戴焕堂是民主建国会的成员，不仅积极带头提出该厂实行公私合营，还主动做好另一资方主要成员刘孟靖的思想工作，在行业里成为首家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厂家。该厂另一资方主要成员詹守成，主动向该厂党支部提出，将他的另一个造纸厂益中造纸厂并入该厂，一起实行公私合营。

区委认为江南造纸厂实行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1954年2月初，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江南造纸厂实行公私合营。同时进行试点的其他4个工厂，也相继经市政府批准实行合营，试点工作即告结束。

1954年2月至10月底。在推进全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区委批转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中财委关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中财委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并根据市委作出的在全党工作上准备加大力量，“积极慎重，稳步前进，以稳为主”的部署，在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有计划的分批推进。2月下旬，制定了本区第一批对私营工厂的公私合营计划。3月4日，区委决定以中华珐琅厂、天一印染厂为派员试点厂。相继组织了180多名干部，分两批派到350多家私营工厂，7月中旬顺利完成改造工作。随后，第二批13家私营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10月底基本结束。为进一步打好全区各私营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础，区委针对这些工厂生产中存在的浪费和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1956年伊始，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1月10日下午刚上班不久，张敬焘正在一家工厂蹲点了解情况时，突然接到市委副书记陈丕显的电

张敬焘
(左)在
博山刘
家台革
命纪念
馆前的
留影



话，说是毛主席马上去申新九厂视察，要他马上赶去迎候。张敬焘穿着工作服赶到了申新九厂，不久，毛主席在陈毅、陈丕显等市委领导陪同下来了，受到了全厂工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向大家亲切致意后，与荣毅仁握手交谈，荣毅仁曾去北京开会，几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当毛主席将要与张敬焘握手时，陈丕显作了介绍，毛主席听后高兴地握着张敬焘的手，上下打量一下，看到他衣着有些不整、胡子拉碴，就说：“不要介意，领导干部的工作下到工厂，深入生产第一线抓情况，领导工作就扎实。”

毛主席视察时，张敬焘多次回答了毛主席提出的问题。毛主席在申新九厂视察结束后，对陪同人员说：我到上海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一是你们厂民主改革做得好，二是你们荣老板去年10月在北京开会时要我来看看。接着他又对大家讲，对资本家我们采取的原则是逐步改造的办法，这是根据我国的国情，不宜实行硬性政策拿过来。现在的问题是公私合营后，我们怎样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巩固发展？在我看来，要把工厂办好，还要发挥资方代理人懂管理的作用，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的经理是光荣的，过去是为资本家办事，现在是为工人阶级办事。毛主席还说：要教育工人学习和掌握政策，像荣毅仁这样的大老板，愿意把工厂交出来，是进步的，要处理好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一定要把工厂管理好。

毛主席还视察了江南造船厂，接见了部分文化、教育和工商各界的代表人士，进行了座谈。这时，北京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消息传到上海，引起强烈反响。全市各行业的广大工人和许多资本家，要求像北京一样进行，说“万事俱备，只缺一‘批’（批准）”。在市委的组织与号召下，全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即掀起高潮。

1月14日，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北京的先进经验，决定加速对资改造，准备按行业一次批准全区行业的公私合营，6天完成。会议决定成立11人组成的区委对私营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张敬焘为组长。下设工业、商业两个组，抽调3468名干部参加这一项工作。

1月18日，在统益纱厂礼堂召开全区2000多人的手工业劳动者

大会，副区长杭惠兰作了合作化政策教育的报告后，并当场批准全区手工业劳动者为区手工业劳动者合作社社员。全区时有手工业 427 个行业，1913 户，3548 名手工业劳动者。会后，开始分批分行业建立合作社，于 4 月上旬完成全区建社工作。对于私营工商业，1 月 20 日，由市委统一批准实行公私合营。其中普陀区工业 813 户，职工 23444 人；商业 3969 户，从业人员 8691 人。至此，全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全市的统一行动全部结束。同年 2 月，张敬焄被调任市委副秘书长，还兼任 4 个月的普陀区委书记。

张敬焄 1914 年 12 月出生，山东省淄博人。1935 年末，加入和建立民先博山队部，193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博山特别支部，任宣传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共博山县工委宣传委员、四支队一团五连指导员等职务。1938 年 6 月，奉命回到博山任县委书记。1939 年 9 月，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1 年 10 月，任中共益临工委书记，1944 年 8 月任尼山地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淄博特委书记兼淄博警备区政委，泰山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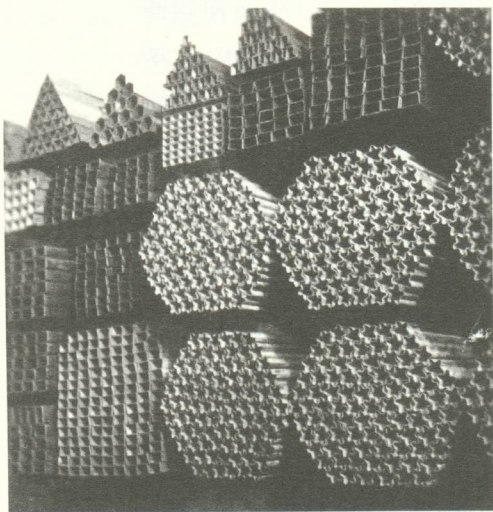
全国解放后，1951 年 12 月调上海工作，先后任中共上海市沪西产业区党委副书记、普陀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兼市委副秘书长等职。1960 年 10 月，调回山东工作，历任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省委常委，政协青岛市委委员会主席，济南市革委副主任、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市委副书记、书记，省革委副主任，1979 年 12 月任山东省副省长。

1983 年春，张敬焄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被聘为省政府顾问、特邀顾问，《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和《中共山东地方党史》编审委员会特邀顾问，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等职。

草窝创奇迹 放飞金凤凰

——记潘阿耀等试制无缝钢管

1950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美蒋飞机的狂轰滥炸，使上海的工业生产面临严重困难，陈毅市长下达全市争取自力更生的指示，引起广大工人的热烈讨论，其中就有原上海慎昌五金制造厂的潘阿耀等工人。



永鑫无缝钢管厂生产的各种优质无缝钢管

潘阿耀，浙江象山潘埠人。解放前离乡到上海谋生，为七星铜厂老工人。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积极参加护厂斗争，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厂里，潘阿耀积极肯干，敢于创新。

上海慎昌五金制造厂是苏州河畔药水弄内一家很不起眼的私营小厂，在厂工会的领导下，成立了潘阿耀等五人攻关小组。他们利用报废的旧设备，废寝忘食地搞起了生产无缝铜管试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耗费了不

少材料，老板知道了不高兴，潘阿耀就自己掏钱去买材料。经过3个多月努力，30多次反复试验，1950年的7月5日，穿孔机上终于吐出中国工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根无缝黄铜管，潘阿耀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劳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这位普普通通的工人受到了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接见，毛主席在与潘阿耀亲切交谈中，鼓励他再接再厉，进一步试制出我国自己的无缝钢管！

无缝钢管被人们称为工业“血管”，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可谓举足轻重！旧中国由于工业落后，缺乏生产的设备和技术，一直无法

生产，依赖进口。上海刚解放，经济形势严峻，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钢管材料更为紧缺，严重影响了经济和国防事业的发展。

潘阿耀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开始了试制无缝钢管的艰难历程。1950年12月，潘阿耀和同事利用做夜班的机会，从废旧材料中截取一段直径76毫米，长30厘米的元钢，用穿铜管的穿孔机进行试穿，经过3次试验，初级产品穿出来了。第二天，潘阿耀拿着样品向老板报喜，并要求支持他做进一步试验。然而，这位私营厂的老板目光短浅，只满足既得利益，无意再投资搞无缝钢管，试制陷入困境。

这时，上海永鑫五金号老板张裕仁响应政府号召，欲抽出部分资金建厂，求助于潘阿耀帮忙。经潘阿耀的建议，张裕仁办起了永鑫五金制造厂（后改为永鑫无缝钢管厂）。由于潘阿耀关系仍在慎昌，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到永鑫厂继续试验。没有热轧穿孔机，他就利用自己在慎昌穿孔机上成功的经验，与负责设备制造的技术工人戴富宝及其徒弟石圣珏一起，刻苦攻关。终于在这20多人的小厂里，成功地设计制造了国产第一台热轧穿孔机。

1957年下半年，为加强技术攻关力量，市委决定把潘阿耀从慎昌厂调到永鑫厂。一个偶然的机会，潘阿耀从煤球炉烧水铜壶烧不化这一日常生活现象受到启发：穿孔机顶头顶杆如能通水，能否产生同样的效果呢？然而，怎样通水，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1957年10月至1958年初，永鑫厂先后派出厂长金圻奎、俞恩千和参与试制的石圣珏，赴鞍钢无缝钢管厂学习考察，带回了苏联援建的“140机组”



永鑫无缝钢管厂试制成功一种用途很广的异型钢管——油条型钢管

小口径的无缝钢管在上海轧制成功

小口径的无缝钢管在上海轧制成功了。第一批直径35公厘、26公厘和21公厘的无缝钢管已经运到广东省的机械工厂去应用。

这种无缝钢管，是由一家原来制造无缝钢管的公私合营永鑫五金制造厂试轧成功的。上海工业中应用很广的小口径钢管，原来是用钢板焊成的，耐压力很低，不能作为锅炉管等必须耐高压的钢管，以后就把鞍钢和进口的无缝钢管加工拉细，很不经济。

去年年底，永鑫五金制造厂接

受有关部门的委托，职工们开始研究利用制造无缝钢管的机器试轧无缝钢管，但因穿孔机的顶针耐热度低，穿钢材只穿到一半就变形卡住在钢材的内部。以后改用钨、钼合金浇钢做顶针，穿孔成功了。钢材经穿孔后，再经过拉长等工序，就制成小口径的钢管。制造的成本比加工大口径钢管低得多。

目前小口径的无缝钢管国内很需要。上海市第二重工业局和有关的专业公司正在筹划添置设备，准备正式投入生产。（新华社）

1956年4月2日《解放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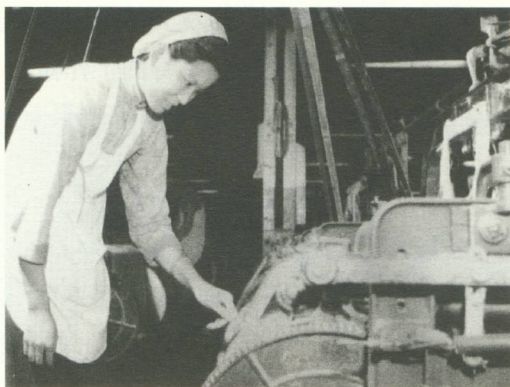
关于小口径无缝钢管的报道

苦干巧干大干 纺织光荣旗帜

——记全国劳动模范杨富珍

“我是国棉一厂布机挡车工，去年我们小组一年中产量按月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次布比行政指标降低 0.16%；我个人也按月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质量方面从去年到现在已经连续 14 个月没有出过次布。”

“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学习，我认识到我们工业要很快赶上去。今后我要学习国棉十七厂张根



全国劳模
杨富珍

弟的操作快的经验，做到三不慌、三清洁、一预防。”“我个人保证到 1957 年底不出 1 只责任坏布，产量按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1956 年 4 月 6 日，召开上海市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杨富珍受到表彰，作了发言。第三天，她的发言稿刊登于《解放日报》。

1951 年 5 月 1 日，杨富珍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出席开幕式。从 1953 年起，杨富珍第一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以后至 1965 年，连续七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56 年、1959 年两次评为全国劳模，光荣地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

1954 年以来，杨富珍所在的生产小组年年保持劳模集体称号，被命名为“杨富珍小组”，也是“五一织布工作法”创造者之一。她被选入全国纺织战线 8 位技术能手，在青岛的国棉六厂与其他劳模共同总结“五一织布工作法”，到全国各地循环表演、交流。

刚解放时，杨富珍并不是织布能手，她过去是一个纺纱工。那

时候，她看到挡车工织出一匹匹白布，非常羡慕，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技能。她摆好纡子，总要到别人车子上去东摸西摸，即使是帮挡车工开一开车，或者接一个纱头，心里也感到高兴。不久，领导调她去做挡车工，她很高兴，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做个好的织布工人。她说：“解放后，我们这些苦难深重的工人翻身感特别强，处处体现了主人翁精神，过去工人进出工厂有一个抄身制度，这是侵犯人权的做法，解放后，宣布废除抄身制时，工人们心情非常的激动，工人可以自由地从工厂大门出入。我是一名工人，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本身的工作做好。”

刚开始，她的技术很差，手脚慢，出了坏布，也说不出原因，非常着急。领导及时向她指出，必须认真学习和执行操作制度，才能解决问题。以后，天没亮，她就从曹家渡家里匆匆忙忙赶到厂里，认真观察别人怎么做的。下班后，别人去梳头、洗澡，她顾不上换衣服，还在车间里，恨不得马上学会技术。有时她帮助别人接纱头、拆花布，加强练习。逢到厂里开经验交流会，她总是很早赶到，别人介绍经验以后，她总是问了再问，回去马上动手试验。因此，有人说：杨富珍学技术是“眼快、嘴快、手快”。

1955年4月，她与厂里同事一起到国棉五厂参观学习。听说有个小组每月只出两三只坏布，杨富珍心里一惊，自己的小组每月要出几十只坏布，差距太大了。进了五厂的布机车间，她盯着挡车工，发现她们巡回工作时，脚步不快不慢，头一高一低地看着车子，不

像自己巡回时随随便便，东张西望。其中有个老女工，正确地执行工作法，已有4个月没出坏布了。原来她们采用“分三段”看布面，巡回时看了布面，回过头来再看轻纱上是否有毛病，有效地防止产生坏布。

杨富珍一回到厂里，就与管理员周桂英商量，马上进行试验“分三段”操作法。起初，兜了几个巡回感到头晕眼花，腰酸溜溜的，手脚很吃

杨富珍在和同事们交流纺织技术



力，放工时，腰酸得直不起来，但是，杨富珍咬牙坚持下去。干了两个星期，终于掌握了“分三段”操作法，从此，不再漏过次布。小组里全面推广“分三段”操作法后，当年底，全小组连续9个月完成质量指标。1955年底，杨富珍已经连续31个月完成个人质量指标，成为织布能手。1956年，她代表上海纺织工人参加在西安举行的经验交流大会，在全国表演操作法时获得好评。此后被称为“五一织布工作法”创造人之一。

杨富珍，出生于1932年，上海南汇人，幼年父母双亡，14岁到中纺一厂（国棉一厂前身）做童工。194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3月至1979年12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任中共普陀区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区委书记，1977年11月至1984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3月任市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候补委员。



杨富珍在向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前来采访的同志介绍当年工作的情况

首个工人新村 早已名扬四海

——记普陀区曹杨新村



“二万户”工房中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

1952年的“红五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工人兴建的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落成了。

曹杨新村位于普陀区东南部，东起曹杨路，西迄杨柳青路，北至南石路，南到中山北路、金沙江路，占地1.80平方公里。解放初，为真如区辖区，现为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管辖。

普陀区是上海的老工业区，也是工人集居之地。解放初期，工人的居住条件很差，大部分人都住在用竹竿、苇席搭建而成的“滚地龙”棚户区里。夏天，不能避暑热；冬天，无法御风寒；雨天潮湿、漏水更是家常便饭。居民饮的是吴淞江（苏州河）水，点的是豆油、煤油灯，走的是泥土路，雨天更是泥泞不堪。那里长期流传着民谣：“吃水不清，点灯不明，走路不平，出门不太平。”“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等，这真实地反映了“滚地龙”工人居住的状况。

1951年，市政府遵照党中央、毛主席要关心工人居住条件的有关指示，根据陈毅市长提出的市政建设应贯彻“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下决心建设大批工人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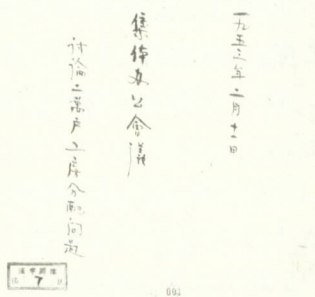
把棚户区从上海消灭掉。当时百废待举，财政经济很困难，市政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9月正式兴建动工。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等领导一直关心工程进度，从新村的选址、建造规模、住宅标准，到配套设施、环境绿化等一系列问题，都一一过问，选择最佳的实施方案。

1952年首批建设的48幢167单元竣工，总面积32366平方米，可容纳1002户居民，优先分配给纺织和五金工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居住，这就是最早建成的曹杨一村。1952年6月29日，陆阿狗、戴阿娜、杨富珍、裔式娟等114位劳模和大批先进工作者、老工人，手捧鲜花，怀揣着市政府发给的居住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乔迁新居。当天下午，市政府专门在新村内召开了竣工庆祝大会，潘汉年副市长、总工会副主席钟民等到会祝贺。



1952年上海市两万户工人住宅开工大会照片——图为曹杨新村建成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1952年8月至1977年，9个曹杨新村基本建成，住宅总建筑面积169.78万平方米。此后，陆续对新村住宅进行大面积改建，拆除初建时简陋的“二万户型”工房，代之以兰花大楼、曹杨华庭、桐柏公寓等高层建筑和多处高级住宅小区。据2010年底统计，曹杨新村街道总面积2.14平方公里，居民46909户，人口110189人，设有居民委员会20个，由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管辖。新村内10余条道路纵横交错，交通便捷通畅；各项公建配套设施齐全，有各类学校30余所，邮政、电信、书店、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游泳池、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二万户”工房分配的会议记录

医院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商业服务网点遍布村内大街小巷,曹杨商城为全市知名的大型商业中心。曹杨新村街道在社区建设中,曾创造全国、全市 28 个第一,获得“中国街道之星”、“全国最佳街道”等荣誉,成为市委、市政府命名的上海市“十面红旗”之一。

曹杨新村是全市第一个全面绿化的新村,绿化覆盖率 34%,在全市名列前茅,曾荣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及优美新村、安静社区等称号。

曹杨新村有公共绿地 700 余处,四季花草茂盛,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环绕新村的曹杨环村风景浜全长 2208 米,水域面积 2.67 万平方米,似一条精美缎带,蜿蜒曲折,穿越曹杨公园、兰溪公园和枣阳苑 3 座园林、11 座桥梁和 7 条道路,形成独特的流水串桥之势。环浜沿岸辟建绿地 2.80 万平方米,种植海棠、月季、蔷薇、桂花、香樟等 10 余种观赏植物;建有满园春色、青枫落羽、碧波观鱼、红桥垂钓、兰溪登舟、秋桂飘香、松柏长青、傲雪咏梅等 8 大景观。岸边有水榭、亭台、石桌、石凳和假山,水面种植荷花、睡莲、菱角等多种水生植物。2003 年,普陀区河道管理所、中科院武汉水生环境工程公司利用高科技与水生植物,在环浜营造“水下森林”获得成功,水下植物群落结构稳定,使环浜水质得到进一步改善。村内 10 余条道路的路名均嵌入花名和水名,清溪秀色,情趣盎然。兰溪路是新村一条主干道,道路二次跨越环浜,路两侧 426 棵梧桐树,枝繁叶茂,俊秀挺拔,蔽荫遮日,蔚为壮观,为全市著名市容景观街和西区主要商业文化中心之一。

沿环浜的花溪路周边绿化率在全市领先,有“花溪绿荫两里街”之称;入夜幽静,恋人们徜徉其间,被誉为西区的衡山路和“情人街”。

自 1953 年起至今,曹杨新村共接待来自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 15 万余人次,其中有国家元首、政党领袖、总理、部长、议员、知名人士等重要外宾。自 1993

苏联及土耳其和平代表团在上海活动照片——代表们参观上海工人住宅：曹杨新村



年起,曹杨新村多次获全国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做一天上海人”是曹杨新村接待外宾极具特色的方式,1992年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旅游观光14条专线之一。来访外宾通过“做一天上海人”,与新村居民“零距离”接触,亲身感受到上海本地的风土人情。曾有一批美国客人,在居民家中吃一顿午饭,吃了3个小时还难以收场,认为这是在中国所有宴会中最难忘和最有意义的。1999年8月21日,500余名日本青年到曹杨社区“做一天上海人”,受到国内外各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的女儿、加拿大作家布朗夫人、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维斯等,先后在居民家中用餐、住宿、采访、摄影、吃年夜饭,受到村民们热情款待。1999年7月24日,美国教育电视台在曹杨新村拍摄了专题片《中国之行》。

知名相声演员、加拿大友人大山曾在中央电视台一次春节晚会上说:“中国有个上海,上海有个曹杨新村,曹杨新村有个了不起的‘老妈妈妈合唱队’”。老妈妈妈合唱队成立于1964年,初建时队员约20余人,现已发展成为合唱、舞蹈、时装、钢琴等综合性演出团队,共100余人。如今,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已85岁,仍坚持演出。40余年来,合唱队不仅自创多首中文歌曲,还学会许多国家的原版歌曲,曾代表曹杨新村接待国外友人近10万人次,歌声、名声一起远扬。1999年2月28日,老妈妈妈合唱队代表上海老年人在上海音乐厅与德国巴登巴市合唱团同台演出,受到中外观众热烈欢迎。

2006年,曹杨新村街道获“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称号,创作节目女子长鼓舞《鼓韵霞光》获市老年舞蹈大赛金奖。每年5月,“曹杨之春文化艺术节”是曹杨新村盛大的文化庆典。艺术节期间,“美在曹杨”文化艺术荟萃、京剧流派演唱、“共建之花”艺术集锦、少儿书画、家庭插花、棋牌比赛等多种文化艺术活动缤纷多彩。截至2007年,“曹杨之春文化艺术节”已连续举办18届,已成为曹杨新村一项知名文化品牌。2002年建成的曹杨社区文化中心,是曹杨社区文化艺术殿堂,是上海市文明办命名的上海市标志性文化中心之一。200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曹杨新村,高度赞扬这里的群众文化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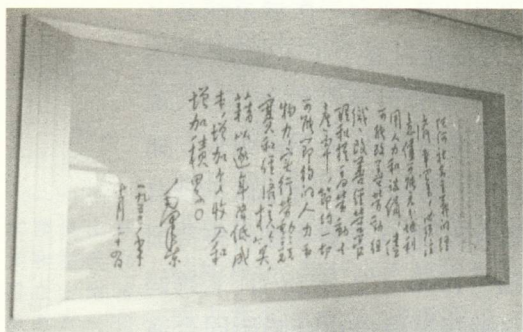
艰苦奋斗办社 发展农业生产

——记毛泽东为李子园写按语

走进真南路 828 号，不远处是李子园村委会的白色办公大楼，其底层大厅的迎面墙上镶嵌着一块黄底红字的精制展板，即 1955 年 10 月，在《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旁，毛泽东提笔写下的“按语”：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

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藉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登上三楼，楼道西侧尽头有两扇玻璃门，上面写着：“按语之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李子园生产队文章写按语影印件

光”陈列室。里面的四周墙上除了毛泽东同志的“按语”手迹和李子园历年获得的部分奖状、奖旗之外，主要挂放着图文并茂的展板，其分为“前言”、“创业篇”、“发展篇”、“展望篇”。在“创业篇”的展板上有一张老照片，即李子园农业合作社第一任主任徐士生，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老照片下面写着短短几行字：“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积肥，是创业时公认的功臣。”在一旁还有一张老照片，那是李子园党支部书记曹立成，下面有一行文字：“座右铭：‘带头人就要带好思想，带好作风。’他是勤俭办社的好榜样。”

李子园位于普陀区西北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李子园合作社后，1958 年为桃浦公社李子园大队，1983 年成立李子园村委会，现归桃浦镇管辖。九十年代，村委会曾下辖 10 个生产队，有 518 户、

1400多人、780多个劳动力，现在这些数字有所变化。

解放初，李子园是有名的贫穷村，人称“赤脚李子园”，村里的小伙子常为娶不到媳妇发愁。但是，李子园干部群众坚信一个信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用自己勤劳的一双手一定能创造幸福生活。当年办起农业合作社后，上级领导就提出“办社要精打细算”。李子园合作社党组织立即开展讨论，最后决定，原来准备造房子的，不造了；要买写字台的，就用一只肥皂箱替代了；要买大木船的，就买小的；即使搭建玻璃棚，也尽量降低费用。在积肥的问题上，大家也转变了传统观念，不再花钱买了。合作社主任徐土生等带头积极积肥，作出表率。

李子园合作社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经验，被董铨、邵健、桂世杭整理成文。此文被审校时，原来的标题中“降低生产成本”被改为“节约生产费用”。此文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册，共有176篇，约90万字。毛泽东直接领导此书的编辑工作，不仅写了序言，还为其中的104篇文章写了“按语”，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为李子园一文写的“按语”，成为李子园干部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日理万机，抽时间为李子园村等农村合作社经验亲笔写按语，有着当年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诞生不久，党中央领导在讨论中国的农业问题，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它们的生产受到市场和交通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个体农民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多数人容易陷入贫困破产，会引起两极分化，出路是发展互助合作。毛泽东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解决农民的问题，开始领导几亿中国农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央提出特别要注意发挥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

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经过国家的努力,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组已发展有800万个,参加农户4536万户,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了3600余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0%。

1954年秋到1955年春,全国由于深入宣传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5年1月,合作社已达到48万个,已超出原定发展指标,出现急躁冒进倾向,引起一些农民恐慌,怕共产,不积极发展生产。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停、缩、发”3字方针。但是,第三次全国农村会议后,情况发生变化,中央提出要大规模发展合作社的计划,此时,党内在围绕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毛泽东大谈所谓“小脚女人”、“右倾”

错误问题,并提出不切实际的设想。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提出1958年春季以前,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可以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近半个世纪以来,李子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级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李子园将继续遵循“按语”精神,进一步发展村级经济,积累集体资产,为老百姓办更多的实事,为普陀新一轮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为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本区党史,派专人到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全国党史学术讨论,看到毛泽东亲笔写的许多按语档案,其中有毛主席为李子园写的按语。后来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协助下,征集到毛主席亲笔为李子园书写按语影印件,而后又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征集到毛泽东书写按语时的照片。回想起往事,区委党史研究室老同志激动不已。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李子园生产队文章写编者按语

争睹领袖风采 老厂焕发生机

——记毛泽东视察申新九厂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申新九厂。

下午4时40分，一辆轿车直驶车间门口，在陈毅等市领导陪同下，毛主席出现了，高大的身材，红润的脸，可亲的双眼，下巴下有一颗黑痣，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穿一双黄皮鞋。毛主席与荣毅仁总经理、吴中一厂长（私方）、杨锐、归素珍（公方）、张贡（私方）副厂长一一握手见面。这时，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闻讯赶来，热烈鼓掌欢迎。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市长陈毅（右三）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清花间是毛主席第一个视察的车间，陆菊珍和马万年正在整理花卷，好让贵宾（没想到是毛主席）走起来更方便些，等回过头来，“贵宾”已经到了面前。定睛一看是毛主席，她俩一时不知道怎样才好，摸摸自己的手，赶紧伸上去和毛主席紧紧地握了一下，据说当时想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却激动得发不出声音。

经过钢丝间，毛主席来到了粗纱间，正对大弄堂挂的是行政布告板，上面写着三件事：1.召开生产会议。2.识字班开学了。3.一个工人旷工一天警告一次。毛主席看得很仔细，转过身来，在12号车旁停下，看挡车工戴可宝做生活。戴可宝听说有“贵宾”要来，把

车子揩得亮光光，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一时间感到有许多话要讲，就是说不出口。市总工会主席钟民拍拍她说：“你和毛主席说说吧。”她才介绍说：“这是粗纱，这是条子，条子下来做粗纱，粗纱下来到细纱，细纱再织布。”毛主席点点头，和她握手。

离开粗纱间，毛主席乘上了陈桂英驾驶的电梯，陈桂英感到今天的任务很光荣，也很重大，屏住气，全神贯注手里的开关柄。陈丕显指着她和毛主席说：“是个女同志。”毛主席伸出手，陈桂英伸出一手和毛主席握手，另一手紧紧握住开关柄。

毛主席走进细纱间，车间主任顾玲娣早就等候在车间门口，她已经打听到来的“贵宾”是毛主席，就想握一握伟大领袖的手，毛主席满足了她的心愿。毛主席还和刚拉好粗纱的高金凤握手，高金凤激动地连声说，“我的手这么脏。”落纱工赵阿小正在干活，看见“贵宾”过来，感到贵宾好面熟，和照片上的毛主席没有两样，可是不敢相信，再仔细一看，真是毛主席，兴奋地拍手跳起来。毛主席亲切地看着她们，招招手，赵阿小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行了一个礼。

原来为毛主席安排的参观车间到此为止，但走出细纱间时，毛主席问：“还有织部吗？”工厂陪同人员回答：“是的，还有织部。”毛主席看看手表，时间来得及，于是转道过去。

到了小包间，毛主席看着一绞一绞雪白的棉纱被熟练地打成一个一个小包，问道：“一个小包多少重？多少小包打成一件纱？”管理员荣月清正在做劳动日报，毛主席走过去和他握手，并且坐到他的桌子旁仔细地看了一番。穿过小包间，就是捻线间，毛主席听到正在纺60支双股线，说道：“能纺这样细啊？”陪同人员介绍说，不久以前还纺过84支。

“毛主席来了！”消息很快在厂里传开了，工人们都知道不能离开岗位，以实际行动来向毛主席致敬。可是还是有许多不是直接生产的辅助工从全厂各处汇拢过来，她（他）们估计捻线间门口是毛主席必经之路，都挤到那里。果然毛主席出现了，人群中立刻响起热烈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站在最前面的工人被认为最幸福的，他们和毛主席握手了。

毛主席在准备间视察高速度的筒子车和经纱车，工人们各自

岗位上热烈鼓掌。看到 478 根纱有序地绕成一个又宽又大的经轴，毛主席站住了，挡车工赵文茵没想到毛主席站到自己身边，心里不会是眼花吧，她太兴奋了，一时愣住了，好像听到毛主席在问话，可是说不出来话。毛主席弯身下去，仔细地看看大经轴，询问怎么从车上拿下来？显然他老人家十分关心工人们的劳动强度。

原来打算让毛主席坐电梯下楼去视察布机间，冯和娣早就把电梯打扫得干干净净。电梯门口挤了不少人，看到毛主席从浆纱间缓缓地走过来，大家一面迎上去，一面拍手，越拍越有劲。冯和娣怎么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就在面前，她使劲地拍手，双手拍得又红又火辣。

毛主席在布机间张秀英的车旁看了好一会，张秀英心里很激动，可是工作法规定眼不离手，手不离布，只能稍稍地瞧了一下。

最后毛主席来到布房间视察，他在 2 号车旁看潘全坤检布。潘全坤想回过头来和毛主席握手，又怕坏布逃过去，紧张得手忙脚乱。

毛主席准备上车时，厂区大道已被翘首企盼的工人挤得水泄不通，其中有闻讯赶来的早班职工，刚刚下班的常日班职工，从床上一跃而起的夜班职工。厂党委副书记在车前开路，欢呼雀跃的人群让出一条通道，目送毛主席的座车通过，毛主席向工人们连连挥手。“毛主席万岁！”在一片欢呼声中，毛主席离开了申新九厂。

毛泽东的视察，鼓舞了 7 千多名职工，老厂焕发了勃勃生机。据统计，申新九厂自 1955 年公私合营到复名（曾为国营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前的 1992 年，37 年间累计上交国家利税 13.7 亿元，相当于固定资产原值 43 倍之多，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作出了巨大贡献。

驻足仔细观看 工人奔走相告

——记毛泽东视察国棉一厂



1957年9月18日毛泽东视察国棉一厂

毛主席身着一身浅灰色的制服，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认真看着国棉一厂大字报。一排排芦席棚专为大字报栏，密密麻麻地贴着大小不一的大字报。毛主席一旁站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穿着浅色制服，脚上是一双布鞋，右手在挠头。厂党委书记夏正言、厂长黄宗林笑咪咪站着陪同看大字报，另一侧有不少职工惊喜地盯着毛主席，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曾刊登于1957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照片下注明：毛主席看大字报。

1957年9月1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抵达上海，当晚召见了中共黄浦区委第一书记陆文才、中共上海锅炉厂委员会书记刘东海、厂长王伟光和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询问了机关、工厂、学校有

关整风和大鸣大放的情况。

第二天上午10点，六辆小汽车驶进了位于普陀区的国营上海第一棉纺厂，车停下来后，从车里走出身材高大、精神焕发的毛主席，在柯庆施和厂领导的陪同下，观看职工们张贴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有批评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也有热烈争辩各种问题的等等。毛主席对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常常驻足观看，不时点头称赞。

毛主席首先看的是老工人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大字报，老工人批评整风中的一些错误言论，要求进一步讨论。毛主席仔细地看了一遍，认为“老工人讲得对”。

在办公大楼和托儿所之间的空地前面，有一幅“百丑图”的大字报漫画，尖锐批评了某些错误言论。毛主席仔细观看，询问漫画反映的情况，得知漫画作者是四位年轻工人时，他说：“这画画得很好，很有说服力。”对于有些破损的大字报，毛主席对党委书记夏正言说：“应该把它们补贴好。”

在托儿所对面，毛主席指着一张革命群众批评厂领导的大字报，说：“这张大字报写得很好。”他谆谆地告诫厂领导：“我们应当更好地接近群众。”毛主席走到食堂门口，看了贴在门上的大字报，内容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工作欠缺。毛主席看完后，厂领导立即汇报了有关情况，表示已组织检查组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

毛主席视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厂，工人们奔走相告，这时早班工人正吃饭休息，大家争先恐后从工厂各处奔跑出来，脸上洋溢着笑容，激动地簇拥在毛主席经过的道路旁，希望能靠近毛主席，看得更清楚，大家高呼口号，热烈鼓掌。

毛主席频频向工人们点头微笑，亲切地握手问好，沿着道路仔细地视察。10点20分，柯庆施请毛主席上车，毛主席向大家挥手致意，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了国棉一厂。

事后，每个职工都激动地回忆起毛主席视察的情景。老女工薛阿妹说：“能看到毛主席，真是最大的幸福。”车间主任许家麟说：“毛主席工作这样忙，还深入到基层来，我们更应该深入群众，联系

在上海深入基層檢查整風 毛主席贊揚大字報

本報上海18日電 記者習平報道：17日下午，毛主席到達上海，晚間，接見了中共黃浦區委第一書記陸文才、中共上海鍋爐廠委員會書記劉東海和上海動力技術學校校長仇啓琴，檢查和了解了基層單位整風和大鳴大放的情況。今天上午十點鐘，毛主席在上海參觀了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國營上海第一棉紡織廠。

毛主席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國棉一廠黨委書記夏正言、廠長黃宗林的陪同下，參觀了貼滿在工廠走道兩旁數千張琳琅滿目的大字報。工人對各種問題進行熱烈爭辯的大字報，毛主席很感興趣，常常停下來仔細閱讀，不時地稱贊有些大字報寫得好。有一幅大的漫畫，有力地批評了某些錯誤言論，毛主席停下來看得很仔細。他說，這張大字報的質量很高。他還贊許了一群老工人寫的一張大字報。在這張大字報上，老工人們對目前廠內某些人發表出來的言論，表示不能容忍，要求黨委立即組織辯論，辨明大是大非。毛主席還指出一些破損了的大字報，對黨委書記夏正言說：“應該把它們補貼好。”

毛主席的到來，給正在整風和生產兩條戰線上熱情地工作的職工們帶來了極大的鼓舞。下了班的工人們熱情地簇擁在毛主席的周圍，不斷地向他歡呼，毛主席也頻頻揮手向越來越多的工人致意。

群眾。”職工們互相勉勵，要把當前的整風運動搞好，促使生產日日提高。

根據當時《解放日報》報道，國棉一廠是上海產業基層中最早開始整風的工廠，2千7百多張大字報貼滿了所有牆壁以及一排排蘆席棚。一個月來，全廠職工提出1萬7千多條意見，其中近一半有關黨員和幹部作風，有關生產管理的占第二位。

1957年9月19日
《人民日報》關於毛主席視察國棉一廠的報道

毛主席來廠看大字報的第二天，廠領導發出以實際行動報答毛主席關懷和期望的三項號召：一、積極投入整風運動，投入大是大非的爭辯；二、努力搞好當前生產，編好1957年第四季度生產計劃；三、遵守勞動紀律，對在整風期間不遵守操作規則，早退遲到，清潔工作不徹底等行為進行鬥爭。各車間、工區、科室也紛紛提出保證，北紡細紗甲班四工區全體工人訂出了搞好生產的具體保證，並堅決投入全廠大辯論，分清是非，提高政治覺悟，做到整風和生產兩不誤。

如今翻開當年的舊報紙，每一段報道、每一張照片都會再次把人們帶到那個全廠沸騰的上午。

攻克世界难题 奋力为国争光

——记试制第一支活性染料

1958年3月23日,《解放日报》头版以重要位置发表《我染料工业跃入新阶段》一文,报道了世界染料工业最新的技术成就——活性染料,已经在本市公私合营润华染料厂(上海染料化工八厂)试制成功,这是我国染料化工工业踏入新阶段的里程碑。同年6月6日,《解放日报》头版又刊登题为《我国活性染料超过英国——短短数月时间跃登世界最新染料技术高峰》一文,报道上海各化工厂活性染料的研究、应用问题、制造方法和质量水平与英国不相上下。

谁也没有想到攻克里程碑式的艰难课题,竟是普陀区的两位青年技术人员:25岁的奚翔云和32岁的陆锦林,他们分别毕业于沪江大学和交通大学化学系。

什么是英国染料工业的最新技术?

1956年夏天,英国老牌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在英国“染色者”杂志上宣布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染料——活性染料(REACTIVE DYE)。其特点是在印染过程中,能与纺织物的纤维发生化学作用,而不是百年来的人造染料只能附吸在纺织物上,因此染色的坚牢度高,不易褪色。这种染料有色泽鲜艳,使用简便,成本低等特点,因此得到国际上的一致好评,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

1957年4月的一天,奚翔云、陆锦林在一位访华德国专家的学

【本报讯】世界染料工业最新的技术成就——活性染料,已经在本市公私合营润华染料厂试制成功。这是我国染料工业踏入新阶段的里程碑。

永不褪色,是活性染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染料能与纤维起一种化学作用,因此,不但水洗、皂洗、日晒、汗渍和摩擦,永不褪色,就是把衣服穿旧,颜色仍然是鲜艳如新。而其他的普通染料,只是附着或者沉积在纤维的表面,只能与纤维成为一种物理性的混合物,颜色就容易褪掉。在活性染料发明之前,世界上没有一种染料是不褪色的。而且活性染料可染棉、麻、毛或者人造棉、人造丝、人造羊毛和各种尼龙,这又是任何普通染料所办不到的。此外,活性染料还具有色泽鲜艳均匀以及能在低温中染色等特点。

活性染料是世界上最新染料。英国在去年九月份才正式颁布国内专利,目前世界上只有英国瑞士能够生产。润华染料厂的青年技术负责人奚翔云,在轰轰烈烈的五年赶上英国工业水平的浪潮推动下,激起了干劲。他感到染料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兴工业,如果一种一样地赶上英国,这要赶到什么时候?“要赶上英国最先发的。”他一直在注意英国发明的活性染料的动向,并打算进行试验。他的打算很快得到了厂领导的大力支持。但是,困难极大。英国虽然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曾在一些杂志上吹大擂,却没有拿出一点具体方面的技术资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觉得自己不应该采取依样照搬的态度。同时,觉得自己又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没有架子,试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他就从仅有的一些资料着手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并且勤跑求能,终于在一月六日在工人葛伯德和徒伍的协助下,支持下,试验获得成功。

两个多月来,他们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到昨天为止,共试制出七种颜色的染料,经过市油漆染料工业公司中心试验室的测定和市染料工业公司的试用,证明质量合乎“活性”标准。现在,润华染料厂正在积极扩产,下月五日起,活性染料就将开始小量生产。(魏天铎)

奚翔云等穷千苦鑽制成「活性染料」

第1版

这种染料能与任何紡織品化合一起永不褪色

我染料工業躍入新階段

克服“老大”思想
出門訪賢獲益

1958年3月23日《解放日报》关于奚翔云等刻苦钻研制成活性染料的报道

术报告中，获悉英国发明反应性染料的信息。该报告中还透露：德国也正在化大力气研究这种新型的染料，但还没有结论。这一信息激发了两位年轻科技人员的勇气，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也能搞！

回厂后，他俩立即向厂技术部门和厂领导汇报自己的想法，厂长张传文当即表示坚决支持。厂部随即组建研究活性染料的班子，并进行了分工。奚翔云重点负责工艺试验和调研，陆锦林重点查阅资料和调研，廖荣华则以技术领导的身份全面负责和参与调研。

研究组的目标对准了反应性染料，即活性染料。现在寻找的是

掌握活性染料的结构

有机化学研究所揭破活性染料最后一張王牌的秘密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全体同志与华东工学院染料教研组协作，经过三夜连续六十小时奋战，攻克了一项具有国际水平的尖端学科难题——三种类型的活性染料的结构，揭破了帝国主义阵营中所谓活性染料制造工业上的最后一張王牌的秘密。

今年春天，活性染料在清华大学染料厂青年技术委员廖荣华及华东工学院等单位努力下先后研制成功。但由于对合成活性染料的结构原理还来全面掌握，因此，在制造与应用上还有一些缺点。当时，有机化学研究所就开始接受这项任务，要求尽快研究出活性染料的结构。可是有些研究人员那时还热衷于天然有机化合物的合成理论研究，对联系实际的课题兴趣不高，加上所内任务繁重，没有重视这项研究工作。

最近，该所研究人员在上海市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大会的鼓舞下，思想上获得很大的启发。同时

正在上海视察的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也要求他们在一星期到十天完成活性染料的结构问题的研究工作。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也支持并要求他们尽早完成这项任务。

在党的鼓励和支持下，全所科技人员信心百倍，决心争取在五天内完成这项研究工作。八月廿午，所内召开了总动员大会，全所人员决定马上进行战斗部署：由所内党委部副部长俞国瑞所长任政委，汪敬湖所主任任指挥员，分组协作，坚决攻克这个堡垒。这天晚上，一百多位科技人员开紧急会议时除了研究工作外，战斗岗位上也展开了战斗。当天晚上，有机化学研究所还将华东工学院联系，邀请“友军”陆静秋教授等三人一起到所里来参加“会战”。

经过日夜苦战，终于在十日的傍晚胜利地攻克了第一个堡垒——研究出第一类型的活性染料的结构。十一日晨五点半，第二种类型的活性染料的结构又研究成功，再过三个小时，又研究成功第三种类型的活性染料的结构。至此，帝国主义向我国染料工业上最了不起的一張王牌——活性染料的结构，已胜利地被我国科技人员所掌握。结构问题的解决，就可以从三个活性染料的结构，合成各种颜色的活性染料。而了解三种类型活性染料的结构以后，要合成其他类型的结构已不是很困难

问题了。通过这次从未有过的全所动员日夜奋战，科学家们表示在党的领导下，青年老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一致，是可以攻克任何科学堡垒的，而活性染料结构问题的解决，也同样证明任务可以带过学科，为生产实际解决难题，同时也提高了理论水平。

现在，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决心再接再厉，不仅要活性染料的研究工作中创造更大成绩，同时也要在其他各项研究工作中作出更大、更多的“衛星”。

政治挂

兒科医院一
李培青思

【本报讯】“政治挂帅，抢救生命”，这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兒科医院抢救暴发性细菌性休克病例中，再一次得到证明。

昨天，上海市卫生局在这个医院召开了现场会议，曾經持續昏迷九天的李培青和徐青的病情，以及五个小孩同时患暴发性细菌性休克王金仙被迅速参加了会议。李培青三天前接受了气管插管，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魏婉月口口声声

达到这个目标的“路”，那么路又在那里呢？寻找和搜集各种有关资料是试验工作中非常重要而又艰难的事情。他们一面到处访贤求能，请教于老前辈、老专家；一面查阅外文专业书刊，研究有关国外活性染料的使用资料，寻找线索。

1957年11月，陆锦林从一本J.S.D.C杂志摘要报道中，查到一条线索：偶氮染料结构上三氯聚氰活性集团，经碱处理后可以固定在纤维上。三人小组讨论后，认为这就是反应性染料，亦即活性染料的基本结构框架。于是

是立即向厂部汇报，厂领导马上批准成立了以奚翔云、陆锦林为主的试验小组，并专门抽调三名操作骨干协助试验。

试验条件之差，设备之简陋，令人难以想象。为了保密，试验的地点选择在染料生产工段旁的一间简陋的阁楼上，通向阁楼的木扶梯只有一尺来宽，上楼时侧着身子走。楼下是个烘房，当时工程师曾与奚翔云约法三章说：楼上人不能多，遇到大风雨要马上离开，使用楼下烘房时要停止试验。他们在锅炉热气的烘烤下钻进了变化多端的化学世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设备实在太差，有些应当在

比赛

及运动员标准

打破了上海市纪录，并且达到了运动健将标准：通过一次，她在三个月内，已经四次达到了健将标准，也是上海市体育学院学生大跃进后出现的第一个运动健将。

1958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关于掌握活性染料技术的报道

密闭设备和通风良好的隔离毒气橱内做的，他们却在露天里进行。在试制过程中，有刺激性气体不断散发出来，常常使得双眼流泪不止。试验中需要加热或冷却用套锅，厂里没有，他们就用砂锅、痰盂、脸盆来代替。

奚翔云、陆锦林等人日以继夜地刻苦钻研，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试验，终于成功了，1958年1月11日合成出我国第一支活性染料——活性红光黄。染料小样送到上海市染料公司中心实验室，鉴定结果：“染料具有活性，与英国普施安牌黄RS的性能极相似。”上海丝绸工业公司应用试验结论：“染色鲜艳异常，性能优良，与国外活性染料相似。”

成功了！人们欢欣鼓舞，自豪地奔走相告。

为了进一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市计委、市化工局邀集全市各染料厂和有关科研机关的技术人员成立了活性染料科研组。经过短短数月的攻关，上海已有润华、中国二厂、中国三厂、上海染料厂、宏兴和泰新等六个染料厂制成32个品种，质量水平完全和英国一样。

活性染料的试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它的问世，既为国内印染行业提供了崭新的染料品种，又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英国、瑞士、德国之后能独立自主地制造活性染料的国家，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1960年6月7日，陈云副总理曾考察上海染化八厂，鼓舞了全厂职工。该厂被同行喻为“中国活性染料摇篮”，此后捷报频传。

1959年5月，国内第一只金属络合染料活性青莲HB投入生产。

活性染料开始成批生产

【本报讯】润华染料厂试制成功的活性染料，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全厂职工的苦钻努力下，第一批中型生产的成品已经在昨天出来了。经过检验，质量全部与原样相符，品种已由原来七种增加到十二种（新增了妃红、红棕、黄棕、橙、蓝）。目前这个厂除继续中型生产其他各个品种外，正积极进行大量生产的筹备工作。（张、周）

1958年4月20日《解放日报》关于批量生产活性染料的报道

同年，在大连工学院协助下开发成功第一只国产乙烯砒型染料活性黑 KN-B。1961 年经中科院有机所和华东化工学院协助剖析结构后，试制出另一只乙烯砒中温型活性艳蓝 KN-R，适用于染色和印花。1962 年创制成功的活性红棕 K-B3R 属一氯均三嗪和乙烯砒基混合型活型染料（即今 M 型结构）。同年活性翠蓝 KN-G 在上海染料化工一厂试制并投产。60 年代后期，已逐步形成一套适用于棉印花和连续轧染的高固色率 M 型染料。

70 年代末，试制出适用于棉及棉混纺织物的一浴法染色的 KE 型染料，其中活性红 KE-3B，KE-7B 主要供应出口。80 年代中期，研制适用于涤/棉织物一浴一步法在中性浴内染色的 R 型活性染料。80 年代末，又开发了高固色率竭染用 ME 型活性染料，保持国内领先水平。1990 年能生产 11 大类 100 余种产品，年生产能力 3815 吨，实际产量 3113 吨。该厂成为当时中国活性染料的重要开发与生产基地。

献花默祷致敬 友谊天长地久

——记周恩来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玉佛禅寺

周恩来的光辉一生，与上海有密切联系。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在上海参加并领导革命斗争。解放后，他对上海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曾多次来上海指导工作，也曾多次在上海接待各国要人。在普陀区档案馆内存放着周总理陪同锡兰（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玉佛禅寺新闻报道的珍贵报纸。

1962年10月，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不得已自卫还击。同年12月，亚非六个国家（锡兰、缅甸、印尼、柬埔寨、埃及和加纳）在班达拉奈克夫人倡议下，召开了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经过3天商讨，制定了拟向中印提出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科伦坡建议”，还决议由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华调解中印边界的冲突问题。

1962年12月31日，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华访问，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几天里，周恩来总理和班达拉奈克夫人就双边关系和“科伦坡建议”举行了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充分肯定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亚非六国为促进中印友好及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做的积极努力。周恩来总理称赞说，班达拉奈克夫人是锡兰著名的政治家，她继承了先夫的遗志，维护民族独立，奉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促进亚非团结和世界的和平事业。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副主席分

新华社上海八日电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今天在上海最大的佛教寺院玉佛寺举行佛教仪式，纪念锡兰故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的六十四岁诞辰。

周恩来总理、柯庆施市长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夫人、中国驻锡兰大使陶克斯和夫人等前往玉佛寺，在锡兰故总理的遗像前致敬。

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上海举行佛教仪式

纪念锡兰故总理班达拉奈克诞辰

周恩来总理等在锡兰故总理的遗像前致敬

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的遗像，供着寿桃、寿糕和鲜果。上午十时许，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抵达玉佛寺，殿上钟鼓齐鸣。她在法师们高诵佛经声中参拜了佛像，接着来到方丈室，向锡兰故总理的遗像献花默祷。

玉佛寺大雄宝殿内今天香烟缭绕，彩幡高挂，有六十四位法师在虔诚诵经。方丈室的正中悬挂着锡兰故总

1963年1月9日《人民日报》关于周恩来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参观玉佛寺的报道

班达拉奈克夫人为纪念锡兰故总理诞辰 昨在玉佛寺举行佛教仪式

【本报讯】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昨天在上海最大的佛教寺院玉佛寺举行佛教仪式，纪念锡兰故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的六十四岁诞辰。

周恩来总理、柯庆施市长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夫人、中国驻锡兰大使谢克西和夫人等前往玉佛寺，在锡兰故总理的遗像前致敬。

昨天，玉佛寺大雄宝殿内香烟缭绕，彩幡高挂，六十四位法师虔诚诵经。方丈室内正中悬挂着锡兰故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的遗像，供着寿桃、寿糕和鲜果。

上午十时许，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抵达玉佛寺，殿上钟鼓齐鸣。她在法师们高诵佛经声中参拜了佛像，接着来到方丈室，向锡兰故总理的遗像献花默祷。

别会见了班达拉奈克夫人及其一行。周恩来总理还专门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了上海。

在上海时，正值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丈夫所罗门·班达拉奈克诞辰 64 周年。班达拉奈克当政期间，周恩来总理曾访问过锡兰，受到班达拉奈克总理的热情接待。班达拉奈克于 1959 年遇刺身亡，班达拉奈克夫人继承他的遗志，在大选中当选为锡兰总理。

为了纪念已故的锡兰前总理班达拉奈克，1963 年 1 月 8 日，玉佛禅寺为这位虔诚的佛

教徒举行隆重的纪念性佛教仪式，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锡兰前总理的深切怀念。

举行仪式那天，玉佛禅寺大雄宝殿内香烟缭绕，彩幡高挂。有 64 位法师虔诚诵经。方丈室的正中悬挂着锡兰前总理班达拉奈克的遗像，供着寿桃、寿糕和鲜果。周恩来总理、柯庆施市长夫妇、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夫妇、中国驻锡兰大使谢克西夫妇等前往玉佛禅寺，在锡兰前总理的遗像前致敬。上午 10 时许，班达拉奈克夫人抵达玉佛禅寺，殿上钟鼓齐鸣，法师们高诵佛经，她参拜了佛像，接着来到方丈室，向她的丈夫遗像献花默祷。对丈夫的思念和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让她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之前，锡兰已成立了纪念已故总理班达拉奈克诞辰 64 周年的筹委会，1 月 8 日也举行佛教仪式，隆重纪念。

玉佛禅寺举行佛教仪式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等到机场欢送，在一片锣鼓声、掌声和欢呼声，一群众少先队员向班达拉奈克夫人等贵宾献上鲜花。班达拉奈克夫人与周恩来总理等握手告别，登上飞机，再次向欢送人群招手致意，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离开了上海。

1963 年
1 月 9 日
《解放日报》关于
周恩来陪同班达拉
奈克夫人参观玉佛
禅寺的报道

后 记

《追忆——普陀历史档案剪影》，历时一年余，在区档案局、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通力协作下，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前夕，与大家见面了。

该书通过大量的口述采访和档案资料，真实反映了普陀（沪西）五四运动到解放初期这段主要历史，不仅具有史料参考价值，更是学习普陀党史的辅助读物。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局、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山东党史研究室李宗元老师的帮助，部分离退休干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又翔实的资料，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市档案馆、市图书馆、区图书馆等相关部门和人员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时间仓促，编者的水平、信息、资料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积极关心，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编者

2011 年 6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忆:普陀历史档案剪影/上海市普陀区档案局,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普陀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6

(上海市普陀区历史回眸)

ISBN 978-7-5087-3588-7

I.①追… II.①上…②中…③上… III.①普陀区—地方史—史料
IV.①K29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102340 号

丛 书 名:上海市普陀区历史回眸

书 名:追忆——普陀历史档案剪影

编 者:上海市普陀区档案局、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普陀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贵红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 话:编辑部:(010)66076941

邮购部:(010)66060275

销售部:(010)66080300

(010)66051698

(010)66080360

传真:(010)66051713

传真:(010)66080880

传真:(010)66063678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135.00 元

追忆

——普陀历史档案剪影

ISBN 978-7-5087-3588-7



总定价：135.00元